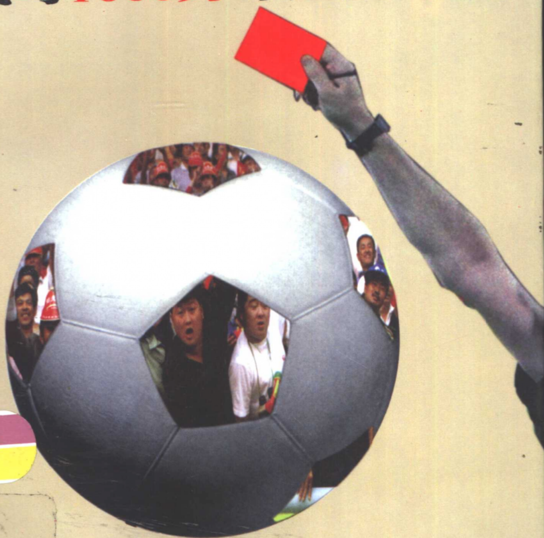
中国文化有什么问题 中国足球就有什么问题

解密足球

我与1000万球迷的对话

李力研◎著



开 启 您 新 的 足 球 智 慧

让 你 多 一 份 痛 苦 的 思 考

如果你是真正的球迷……

中国的足球为何如此步履为艰?

难道只是中国人的技战术不行?

作者不相信这种理论和说法，他觉得还有别的因素制约着中国人在足球上的力度与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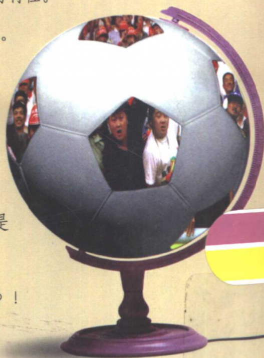
本书从历史的背景，从民族心理的深度，全面深刻地阐释了足球的文化内涵，探索着足球这颗洋种的脾气与特性。

“中国特色的足球”断乎没有任何希望。

世界足球的发展,并不考虑中国人的喜好。

中国文化有什么问题，中国足球就有什么问题。与其说大家读到的这是一本足球书，不如说大家同时读到的也是一部中国人的“足球命运”书。

中国人得了足球狂想症，我们怎么办?!





ISBN 7-5634-1071-6

9 787563 410712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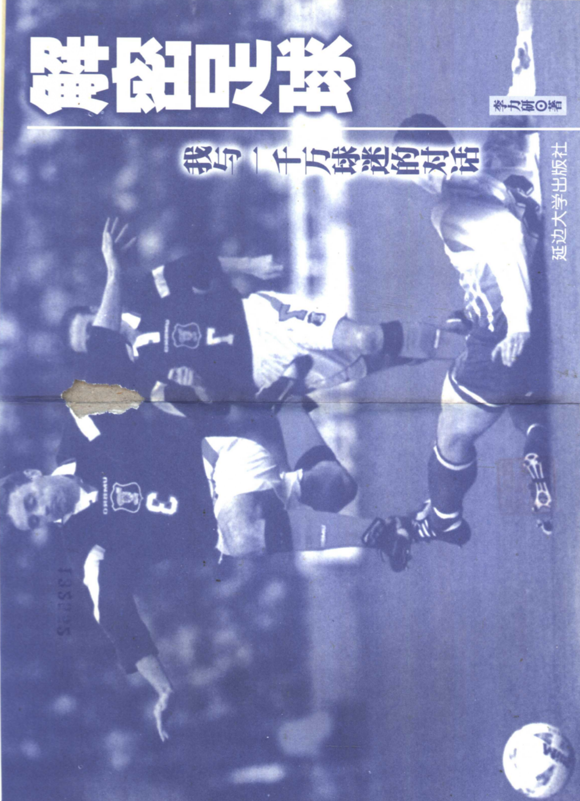
ISBN7-5634-1071-6/C·42 定价：16.80元

解密足球

——我与1000万球迷的对话

李力研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解密足球
我与一千万球迷的对话
李力研◎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

解密足球

——我与1000万球迷的对话

李力研　著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延吉市公园路105号　邮编133002）
新华书店经销
吉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印刷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5　彩插页8　字数:170千字
1998年9月第1版　199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5634—1071—6/C·42
定价:16.8元



“路漫漫其修远兮”中国人踢球必需咬紧牙关。但愿“而今迈步从头越”



徐根宝在申花创了大奇迹。身边有大将范志毅。权当这叫“百鸟朝凤”徐教练心中好得意。

国内比赛的水准的确是低了一些，你看这叫什么技术，动作都变形了。





中国最怕“两市”出事，一个是“股市”，另一个就是“球市”。警察有些警惕，狗却被场上的比赛吸引了注意。今天肯定出不了事。



足球的魅力在于拼杀，球迷从拼杀中寻找自己的“力度”。



中国足球很象这幅图片，道路曲折，充满泥泞，到处是险阻。



雄关慢道真如铁。看了这样的场面即使是输了也觉得是享受。中国人需要的就是这种拼杀力。



中国队虽然没有冲出亚洲，但依旧尽了自己的力量。看多危险!



高峰，英俊的小伙，漂亮的姑娘喜欢他。愿中国的男儿多一些高蜂这样的男儿和喜欢这些男儿的女人。



贝肯鲍尔说，中国儿童的球技是世界一流的。可一到成年就出问题，欲知其案，不妨到书中寻找。



前仆后继！一代代人出不了亚洲，一代代人绝不甘心。可爱的孩子，我们的希望。



小小一个胜利就能赢得“节庆”，孩子们加油吧！我永远期待你们！



男人踢球在于撒野。女人看球则在于寻觅性感，有如此美丽的女人助阵，哪个男人还敢不卖劲?！



这家伙就这样招人爱，这幅照片印证了中国成语—“众星捧月”。中国球迷的祝福在他们心中。



“力扛九鼎”这么多人围着一个马拉多纳，够让人饱眼福的。



国安队的男儿能堵住这个天才的去路吗？我很怀疑，你看马拉多纳手脚并用，神出鬼没的样子。



中国的运动员必需要过体能关。洋人也得跟着快快跑。



足球本身就是意境，我喜欢这样的审美。冲啊!



作者简介

李力研，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著名体育理论家，反伪科学理论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承担者，知识分子健康状况首席研究者。近年来出版多部著作，涉及多个领域，深得读者喜欢。

主要著作有：《竞技运动新论》、《柯云路的新神话》、《超级谎言》、《太乙宫黑幕》（与司马南合作）、《野蛮的文明》等。

足球，是作者少年时的游戏，至今是他的审美对象。他不同意多数足球评论员的说法，才写了自己的足球文稿，这里大家看到的《解密足球》一书就是作者近年来有关足球的独立思考。除此之外，不久的将来，作者将有更好的作品贡献给读者。



责任编辑：贾 锐
封面设计：易 鑫
版式设计：李 芬

目　录

我喜欢他这个有争议的人

——序——

董　华

其实和李力研并没有太久太深的交往，我们能认识并且谈得来，是因为他写了很多关于中国足球和中国球迷的文字，而我是《足球世界》杂志的编辑，需要而且往往盼望着他的这些文字。所以当他请我为这本书写个序之类的东西时，我实在有些惶恐而且很不敢当，但似乎又有些推脱不掉，因为，我总是这些文字的第一位读者。

在我的印象中，李力研是一位勤于研究的人，对一些独特的社会现象都有着浓厚的研究兴趣。而中国足球恰好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中国球迷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社会部落。这自然逃不过李力研那双“研究”的

眼睛。然而，李力研对中国足球和中国球迷的探讨，并没有像许多这方面的文章那样停留在简单的讴歌或鄙视之上，他是用理性的眼光，对这一怪异的社会现象，进行了视角独特的“解剖”，并将其置入现代中国社会的诸多背景之中，从而形成了他对这一社会现象独树一帜而又“证据确凿”的看法。文章中常闪现的理性之剑和智慧之光，让人惊讶，让人见到一种机智，并在真实之中感到一种深刻。

我很佩服这些文字的勇气和功力，因为在“解剖”球迷的同时，难免就会碰到球迷们的痛处，甚至会让有些人难堪。这也是李力研的文章，大都在球迷中引起反响，引来众多争议的地方。更可贵的是，李力研的这些文字，又绝非是那种“仙人指路高高在上”，板着脸孔教训人的东西。他总是将自己和球迷处在同一位置，和球迷进行冷静、平和的对话，因而，许多球迷，在最初的疼痛和不快消失之后，终能感到作者触及到了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从而产生一种深层的交流和感悟。

和视角的独特一样，李力研的文字风格也是别具一格，简洁而明快，沉着而练达，读起来总能感到作者的厚积薄发。尤其是他擅长将相对枯燥、乏味的理论，用生动而又易懂的文字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实在是一种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球迷本身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但他们当中的许多

人，都能读懂这些文字，并且感悟到许多东西，——虽然，他们并不是都赞成李力研的观点。这对于一位社会问题的研究者来说，无疑是一种很高的奖赏。

正因为我自己就很喜欢李力研的这些文字，所以才十分高兴并乐意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1998年4月北京方庄。

（作者：著名足球评论员）

开启新的足球智慧

——前　言——

中国的足球为何如此步履为艰？

难道只是中国人的技战术不行？

本书作者不相信这种理论和说法，他觉得还有别的因素制约着中国人在足球场上的力度与速度。

本书作者，从文化学——哲学的角度，从历史的背景，从民族心理的深度，全面深刻地阐释了足球的文化内涵，探索着足球这颗洋种的脾气与特性。

作者强调，足球是洋种，而中国人及其文化则是这颗种子的土壤。中国人要想踢好球，不在于让种子发生变异，唯一的出路是要改造土壤。

“中国特色的足球”断乎没有任何希望。

世界足球的发展，根本不考虑中国人的喜好。

中国文化有什么问题，中国足球就有什么问题。

与其说大家读到的这是一本足球书，不如说大家同时读到的也是一部中国人的“足球命运”书。

中国人得了足球狂想症，我们怎么办?!

读罢此书，绝不会让你后悔。她会让你多一份思考，甚至是痛苦的思考。

作者祝福每一个读者，开启新的足球智慧。

记住古希腊人的话，在赛场上思考问题的观众，才是真正的观众。

记住鲁迅的话，看人赛跑而自己不笑，才是真正的民族脊梁。

观世界大赛、想中国足球

——趙瑜、李力研足球對話錄

编者按：激动人心的法兰西大决战已落下帷幕，我们在口有余香地回味着世界杯的许多动人心魄搏杀的同时，总是会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足球，总要拿世界杯来与中国足球比况，这是每个热爱中国足球的国人自然的思维转变历程。中国足球的“样子”是明摆着的，骂也好，贬也罢，于事总是无补的。不如静下心来，参照着世界杯，来找一找中国足球那一个始终也解不开的结。我想，赵瑜和李力研正是出于这种目的才坐下来促膝长谈的。他们并没有从技战术这个一贯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话题，而是打了一个过顶长传的身后球，希望从球场之外找中国足球的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如何从世界杯来看待中国足球呢？欢迎来稿参与讨论。

李力研：赵瑜兄，你我都是搞过体育的。体育对于我们来说，仿佛就是生命。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自然会像过节一样，牵动着每一个热爱生命者的心。虽然你我都不是

什么球迷，都也不可能去做年轻人那种浪漫的遐想，但面对法兰西世界杯赛，你我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看法。这几年，我也在一种奇特力量的推动下写过一些足球方面的文章。你已不干体育，而成了职业作家，但你的作品，最叫响的却还是体育，是那人人熟悉的体育三步曲。从十年前的《强国梦》和《兵败汉城》到现在又成热点和焦点的《马家军调查》，完完全全都是体育作品。你写的体育以外的一系列报告文学，除了作家圈内的人们，老百姓知道的就不太多。你喜欢写体育，而且把体育问题写得如此之好，这与你早期从事体育的那个奇特过程肯定是有直接关系。我想更与你我在山西晋东南那个体育大院里接受的体育熏陶和野性刺激，大有关系。所有这些，你在最近为我《野蛮的文明：体育的哲学宣学》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都已做了很好的交代和分析。世界杯大赛之际，我作为体育界和体育理论界中一分子，面对法兰西的狼烟四起，希望你谈点有关足球的看法。

赵瑜：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在世界杯外围赛时，我们的球迷对中国足球投以很大的热情，力图能使中国队走向世界。世界杯开赛以外，我看了几场以后，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理想主义的东西太浓。实话说，即使我们的足球打出去，也不能证明什么。与今天的世界杯水平相比，我们的确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从世界整体水平来看，我们的足球远不能进入世界级的阵营。因此，“外围赛”，名副其实地属于“外围”。打不进去，尚在外面徘徊，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种情况下，我就想到，我们的足球，首先要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并实事求是地看待我们的足球。只有站在一个准确的位置上来看待自己的足球，我们才能取得扎扎实实

的成绩。短期内，对中国足球要求过高，至少是不现实的。就好比一个儿童团要与日本的阪原师团打仗，固然儿童团的精神可佳，愿望很好，但毕竟还需要八路军和正规军。否则，儿童团就会全军覆灭。

如果我们真能实事求是地从中国实际出发，从我们的基础抓起，特别是在竞赛制度和训练体制等多方面多做文章，并符合实际，也许中国的足球才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走向世界。否则，如果太着急，一是心态不稳，二是“欲刺则不达”。说不定还会更慢。

李力研：你的观点，与国家体育总局在有关中国足球的定位上可是不谋而合啊，这里似乎就是赵瑜代国家体育总局言嘛（哈哈）！

赵瑜：（笑）就算不谋而合吧。不看世界杯，并不能有这样的看法，因为世界杯间隔时间长，以往的比赛和水平又容易忘记，每年进行的各种比赛又常常提供一些假相。特别是平时那些外国大牌足球俱乐部来华进行旅游比赛、商业比赛，我们赢上人家几场，总以为自己水平已经接近了世界杯。等到世界杯战火燃起，再看世界水平，那你不得不说，中国真是处于“初级阶段”。

李力研：通过比较才更会使我们看到差距。咱们中国人老有急躁的毛病，也有夜朗自大的习惯，稍微有些成绩，甚至哪怕是“窝里”取得的旅游比赛成绩，他也会发生奇妙的“成功联想”，以为自己真有进步了，自己应该到世界杯上比赛了。咱们中国人在经济发展上有所谓“大跃进”，在体育上就有球迷和某些社会舆论对足球的不恰当估计。

赵瑜：我们看了世界杯之后，更会印证：我们与人家根

本就不在一个水平和层面上。这就和我们在没有改革开放以前一样，总以为自己已经处于世界级的经济大国和军事强国了，因为我们也有原子弹嘛，我们也有卫星嘛，我们也有钢铁嘛，我们也有汽车嘛，我们也有大船和大桥嘛。那时的我们老以为资本主义各个国家真的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打开国门之后，真正落后的却是我们而非人家。看世界杯所获得的足球印象与我们打开国门看到的外国经济状况，道理是一样的，感受也是相同的。

李力研：世界杯是一堂生动的课。她让我们看到许多东西，给我们提出许许多多的问题。比如说，这次世界杯中，亚洲四个队，这在亚洲历史上已属前所未有的"盛况"。然而，就这样一支浩浩荡荡的亚洲队伍，在第一轮的第一场比赛中，全部失败了。韩国败给了墨西哥，日本输给了阿根廷，沙特被丹麦队打败了，伊朗则让南斯拉夫放倒。这就有一个问题，尽管这四支亚洲队都是亚洲的强队或"一流水平"，但它们却不是世界一流。亚洲的整体足球水平，甚至敌不过非洲。尼日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南非都是非洲队，但水平明显要比我们亚洲高出不少。西班牙是世界上诞生最优秀的足球俱乐部的国度之一。像罗纳尔多这样的超级明星都在西班牙效过力，足见其发达。然而即使如此，西班牙还是被非洲的穷兄弟尼日利亚给击败了。我们亚洲足球，断乎目前还没有尼日利亚这种水平。

赵瑜：非洲的足球崛起，应该说，对我们亚洲诸国尤其是我们中国的足球，给予了极好的提示。论经济实力，非洲自然不敌亚洲，尤其不敌东亚和西亚，论大国形象和国际地位，亚洲诸国也大多数比不过中国、日本以及韩国。但亚洲

足球进步的幅度就是不如非洲。这里面一家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问题。由此现象，我们更能看出，由于韩国、日本、伊朗和沙特，在总本水平上敌不过非洲，我们中国倒就更像是“扶贫”对象。如果我们能把自己的足球定位在亚洲“中等”这么一个水平上，我觉得才会更好地进行我们的足球的基础理论建设和基础技术建设。否则，我们老是想打超前比赛，老是急于求成，急于出线，恐怕会为时尚早。

李力研：从世界足协公布的材料来看，中国足球队的总体水平在全世界各国的排名中，处于60多名的样子。这个座次，虽然落后了一些，但较之我们的人均收入、人均资源、人均产值、人均教育经费等等经济指标在全球200多个国家与地区中所处的位置来说，则又明显地处于“先进”状况。也就是说，我们足球的这么一个水平，与自己的经济水平、人均资源等条件相比，已经处在了“超前”状态。人们骂足球，是因为足球天天在比赛。而许许多多并没有直接比赛的内容，如果折算成可以比赛的内容，人们就会知道足球能到今天的这种天地，已经有些非常不易。

赵瑜：是这样的。这就更需要我们有一种平静的心态来对待自己的足球和别人的足球。另外，足球这种项目，它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所有的其他项目，他不像其他个人类的项目，靠着一半个人的天才，就可攀登到“世界级”水平。足球不可能靠个案的突出来代表整体水平的强大。比如中国的田径，由于有一个王军霞，也就有了不少的世界纪录。但中国队的整体水平到底如何呢？我们心中是有数的。可毕竟中国出了一个或多个王军霞这样的个案人物，田径水平也就有了翻天地复的改观。田径如此、乒乓球如此、羽毛球如

此、举重如此、跳水也如此。中国有好多个世界级的跳水皇后和王子，但咱们老百姓又有谁会跳水？这些项目完全是个人天才代表着整体水平。足球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也就是说，足球没有这种便宜，没有这种好事。总体水平不行，足球肯定不行。所以，中国总体水平偏低，但足球水平却已经超过了总体水平，并每回出线都很狼狈和失常。这似乎已有些“强弩之末”的味道。中国队为什么一到出线比赛就出问题？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吧。足球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对每个国家的每个队伍都是严酷的考验。

李力研：足球虽然也有偶然，但它的偶然性大不到超过足球自身必然性的规定。在我的运动项目分类中，足球属于最复杂类项目。它与田径、游泳等简单类项目完全不是一个性质。我在最近的一本足球文集中，专门又把这种有关分类的文章搜集了进来，目的就是让球迷们能稍微知道一些“运动项目”之间的“逻辑联系”。

赵瑜：为什么我们就不能面对这样一个现实，而冷静地对待我们的职业足球？我们必须冷静，必须实事求是，必须将足球的综合性及复杂性与支撑这项运动的国家总体水平联系起来考察问题。否则，我们中国人的足球，就会变成球迷足球，就会成为球迷愿望中的那种足球。而我们球迷的问题，恰恰是不够冷静，想法与愿望都过于超前。

李力研：我们的球迷，心态是超前的，是欧美式的，是拿外国的期望值来看待中国足球的。球迷们一般不会考虑中国人的人均资源状况，也不会考虑自己在世界总体中的位置。相反，他们的足球印象来自于电视，来自于媒体中的欧洲杯比赛，来自于欧洲和南美洲的俱乐部足球比赛，来自于大牌

明星的超凡表演。于是，球迷常常有一种错觉，以为只要我们稍经努力，就一定会达到电视和报纸上的那种水平。因为，那个“最高水平”就在我们眼前，天天就在我们的视觉之中。相反，中国人的比赛和水平状况反倒不在视觉之中。球迷愿看欧美比赛而不愿看中国比赛。因为外国球太好看。

赵瑜：中国的消费超前，也是由于电视和媒体。老在电视里看人家外国人生活，觉得人家什么都好，家中什么都有，于是咱们好些人不切实际，看着人家有车开，自己也要买车坐。其实我们根本没有到达一定要买车的地步，完全是虚假和虚荣导致了中国许多年轻人的超前消费。最起码不少人有着这种超前消费的心理。而且越来越突出。我们的足球，作为一种电视消费，它也被天天晚上的各种直播和刺激吊起了胃口。吊胃口似乎没有什么不好，最起码能让大家知道中国队与外国的差距。但如果观赏比赛不与思考问题联系起来，球迷的期望值就会越来越高，从而害了足球。

李力研：中国的球迷，期望值过高。中国的球迷，常常处于“发烧”状态。一“发烧”肯定是有病，个体有机体如此，社会大集体也如此。由于“发烧”，球迷们对中国队寄托的希望也就过大，而当中国队不能出线或不能令其满意时，那颗发烧的滚烫的心一定让他会发火，他会比较着媒体中的世界级“足球印象”与你叫真。去年年底，球迷们绝望般的“呐喊”，就属于这种类型。

赵瑜：我们的不冷静，表现在许多方面。这对于每一个项目的成熟都没有好处。还以田径为例，人们老早就希望中国的田径有所作为，因为中国人的田径一直处于落后状态。这种心理完全可以理解。人们对马家军的期望就是这样，热望

过高，其实这并不利于马家军的发展。所以，我刚刚写了一个《马家军调查》，而且笔调相当平静缓和，而且它的发表在时间上已经属于“过时”作品，因为它在抽屉里毕竟闲置了三年。但由于社会中有一种过强过高的田径“热望”，于是作品一发，立马炸锅，反响过于强烈。足球也是这样，由于大家都抱着一种过高的期望，反倒足球不好讨论了。你稍不慎，就会遇到麻烦。

李力研：足球如此，中国的气功也如此。本来气功的功效，大家心中都有底，谁也不否论它有某些积极的作用和价值，但一经鼓噪说它是高科技，是“无所不能”的“科学”，是面临21世纪人类大劫难的唯一救星。由于存在着这种类似于足球及田径的“强烈期望”，于是人们也就不好轻易发表看法，稍有不慎，就会引火烧身。

赵瑜：由于期望值过高，由于过于想成功，于是大家的心就开始浮躁，甚至问题也不能讨论。这使我们的运动员常处于狭隘与扭曲状况。急功近利，必然导致足球的腐败，诸如假球、黑哨现象，就与此有 关。运动员必须正确认识足球的价值，这就需要一种宽松的足球环境。我们的运动员承担的社会责任，非常之大，大到了“出线”就是爱国，出不了线就不爱国。这样反倒使运动员经常处于焦虑状态。看起来我们的运动员表面坚强，其实内心虚弱。

李力研：所谓我国足球运动员心理素质不过硬，也是因此引起的。都是因为赋予了运动员过高的社会责任和政治使命。中国足球与世界足球恰恰相反。世界优秀队是平时表现极其一般，平时成绩很不错，一旦进入要命的出线出赛，则大失水准，很有点“义和团”神勇，耍瞒可以，真练不成。球

迷老以为这是运动员的心理素质不过关，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运动员肩负着过重的“家国”使命。我在文章中说，我们的孩子被过高的使命吓成了软蛋。

赵瑜：这一事实倒也让我想到了美国的NBA职业篮球比赛。美国的NBA篮球运动员所以打得那好，出神入化，就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想法，没有什么“家国”使命，只考虑自己如何将球打好。我们从比赛中可以看出，他们似乎只有一个心眼，在场上将自己的所有的本领发挥出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表达自己的个性。在紧张而瞬息万变的球场上，他们没有其他的政治愿望，也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念头。如果是那样，我们就能不想象乔丹还会打球。足球也是如此。通过这一问题的讨论，倒使我们想起了人们对戚务生的评价。我们不去评价戚务生的水平高低，但他执教期间所面临的困境，无疑就是刚才我们谈论的那种被政治使命、“家国”使命和社会使命所层层包围的压力。本来水平就不是世界一流，再加上这样的巨大压力，他能不失常吗？因为他承担着完全不是一个足球教练所能承担得起的压力。戚务生的失败，不完全在于他的水平高低，而在于他的情绪和表情。那他这种情绪与表情又是从哪而来？他那莫名其妙的指挥及其莫名其妙的表情，与我们各种外在的压力总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有一种相对宽松、压力不大的足球环境，那么，我想戚务生总不会老是那种痛苦的表情。我想最爱足球的不是别人，而是戚务生。

李力研：如果我们的总体足球水平很高的话，即使戚务生的水平不高，而且表情不好，我们也能打得不错。问题是我们的足球水平较低，队员与教练又同时都肩负着过重的社

会政治使命，他老人家再着急也没用。与其那样，不如这样，于是威务生的难堪就来了，出线争夺战期间，你看他什么也不说，木挺挺呆坐球场。这种状态下的威务生他不内心痛苦才怪，他不表情难堪才怪，他不疲倦且木讷才怪。

赵瑜：我当时就担心，威务生先生会否因此而积劳成疾和忧郁成疾。一军之帅的教练员，其表情与心情如此痛苦与难堪，就更可知我们场上那些运动员内心的苦痛。这是应该引起大家关注的现实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足球心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心理问题。

李力研：问题就在这里。历届教练都没有什么好下场，都那么难堪，都那么苦痛，都得不到社会与球迷的谅解，这种状况，必然会使那些即将坐上头把交椅的新教练心事重重，并在心理上常常处于焦虑与矛盾之中。我们好些教练从一开始当上主教练，就开始心惊胆颤。因为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球迷并不能宽容失败。

赵瑜：在一个不健康的社会环境中，即使再健康的教练员也都会变得有些神经兮兮，不甚正常。不能将自己应有的水平发挥出来。

李力研：肯定是这样。这才是中国足球的核心问题。中国的足球并不完全是进了几个球输了几个球的问题，也不是转会费多少的问题。而是这些巨大而现实的社会问题。

赵瑜：比如说韩国，相对我们来说，就要好一些，这次世界杯一开始就输了。国内舆论我看也没有怎么着。外围赛时，它也输过。总之，韩国队人家是能赢能输，队员很尽力、教练很卖力。没有什么患得患失。人家的作风硬朗，输了并不表明水平很低，赢了也不证明就是世界最高水平。韩国的

足球，在技战术方面还待于提高，但在心态上我觉得已经进入了世界主流。而在我们身上则有太明显的“盆血”现象。

李力研：中国的孩子和少年，球踢得就很好。这是我老早就注意到的一个问题。我在不少文章中也谈到过这个问题。80年代，我们十四五岁的少年队能把巴西少年队踢赢。去年贝肯鲍尔到中国售书曾经参观过北京的一所儿童足球体校，他一边看一边让记者安静一些，不要干扰练球的孩子，他还赞叹中国的孩子，球踢得很好，甚至比他在德国所见到的孩子还要踢得好。1997年《中国体育科技》第4期上对此有一篇专门报导，很详细清楚。总之，我们的少年儿童足球队，水平并不低。但一旦进入成年，水平马上就降。就和我们的少年科技队一样，小娃娃能拿到各种奥林匹克数学、化学、物理等世界级大奖，一长大成人，就完蛋，不用说诺贝尔奖科学奖与这些孩子无关，国家建设和科技队伍中几乎再也见不到这些少小曾拿奥林匹克大奖的英雄少年。我这里想问问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赵瑜：简要地讲，六个字：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我们中国人，不只是足球运动员，都受着这六个字的压迫。所有中国人的天才，都断送在这六个字上。这种“存天理，灭人欲”使得我们的孩子不能成为正常的人。我们的孩子必须接受“中性人”的教育，因为他首先得接受“中庸”思想。中国人干什么事都要瞻前顾后，你就可知其“教化”的力量。我们的孩子因此而不能成为健康的人、正常的人。足球是一种需要张扬自我个性与肉体力量的运动。这与我们“做人”的价值观念大为冲突。中国的成年人所以踢不好球、关键就在“天理”与“人欲”的问题上给断送了。人的发展不健全，难

以没想足球能发展得健全。期望诞生贝利、诞生马利多纳、诞生罗纳尔多等等足球天才，就更是不可思议了。

一个人所想的问题和他要做的事情，不能真正统一，他天天想着把“做人”与“踢球”调节得和谐，这怎么能把球踢好？我再三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足以毁灭一切足球天才。

李力研：我在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中认为，是“做人”的各种社会标准和心理要求极大地压制了中国孩子们的本能和力度。人的那种自然属性也就因此而无法得到充分展现。中国人（美国华裔科学家除外，属另一个问题）未能在科技中获得诺贝尔将，在体育中足球同样难以达到世界级水平。更何况我们的中国人如同所有亚洲人一样，天然在生物素质方面要比欧洲人和非洲人差出不少。虽然我没有使用“存天理，灭人欲”这样简要的六个字，但意思还是大致相同。

赵瑜：我以为“天理”可存，但一定要灭掉“人欲”则不可思议。因为“人欲”中就包含着人们将球踢好的各种本能类动机和行为。灭了“人欲”，自然也就灭掉了所有踢好足球的中国天才。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转化的问题。总之，我鼓吹中国人踢球的“人欲”。

李力研：我为你的这种“人欲”观加油鼓劲。“人欲”就是包括着踢球、搏杀、利益、爱情等各个方面的自然属性。积极而健康的“人欲”鼓吹得多了，足球的水平可能也就随着提高了。

赵瑜：“灭人欲”的结果，就是“存天理，灭球星”。这个问题应该有个更好的讨论。动辄技战术，讨论来讨论去，实

在是等而下之的次要问题。这场进了几个球，那场谁没有发挥好自己的技术，某某没有贯彻好教练的战术意图，我总觉得有些不着足球核心问题之边际。

李力研：技战术固然是直接支配球场比赛的“办法”与“策略”，但这些东西的来源和思想，则受背后的“文化”因素的制约。一个教练员能否制定出像样的战术，一个运动员能否判断场上的复杂变化并制定出自己的战术企图，不仅需要体力上的支持，而且需要球技上的支撑，有时更需要脑子里的某种思维水平的支撑。技战术问题说起来容易而且痛快，但做起来则很难。你根本就不具备接受目前世界级的足球技战术能力，又何谈什么现代技战术？我举个电脑方面的例子，你是一台286型号的电脑，却有人硬要让你运转586电脑才能运作的软件，这不是勉为其难吗？

赵瑜：在某些单项运动中，似乎个人的天才还可能出现一些偶然的超级爆发，从而引发新的世界纪录。但足球则完全不是这样。它是一种整体的创造活动。它要求运动员在遵守严密规则的情况下，发挥自己的能力。如果你和所有十来个同伴没有整体意义上的创造力，断乎不能有高级的技战术组合与实施。

李力研：足球从来就不是“独行侠”的事业。我们从未听说过某一个天才可以拿下一场足球比赛，罗纳内多、贝利、马拉多纳本事再大，他一个人也打不赢一场足球。再大的足球天才，也需要别人的配合。而中国人则不属于这种“配合”式的天才，他特别喜欢单打单的发挥，比如所有技巧类项目和单人项目，都不错。这是否与中国是一种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农业社会中的小农经济不合作行为有着某种对应？田

径与游泳并不像球类这样需要有机配合，它们属于所有个人天赋相加的总和这么一种项目。唯独体育中的球类，特别是大球，都是集体配合创造成绩的项目。

赵瑜：我们是农民的一庄一户，自己干自己的事都不错。一旦讲究社会有机合作，问题就开始发生。这种“关系”很像马克思所讲的那种农民式的生产关系：即“麻袋里的马铃薯”，在麻袋里看似“有机”，但一剪口袋，土豆则四处分散，实质上它们并没有什么“有机”的联系。这种人际关系及其背景，自然不能踢出优秀的足球。

1998年6月16日

解读足球

——第16届世界杯足球赛观感

编者按：世界杯期间看了一场中国U—23比赛的电视录像，看完之后心很凉。球场如癞子一般的草皮，球员如中学生一般的身材和球技，无不暗示着一个事实，即中国足球离世界杯真的很遥远。

从1982世界杯到今年法国世界杯，整整十六年。对其它项目而言，拿十六年时间换取一个亚洲冠军已经绰绰有余了，而中国足球仍像一个扶不起的阿斗。

中国人为足球付出的精力和心血远非其它项目一样哪怕是在亚洲露出头角。看来，看待中国足球并不能套用其它运动项目的思维，而那种将失败归结于种种偶然的说法更加不能让人信服。足球有它自身的规律，中国足球更是有自身的特色，找出适合中国足球发展的路子看来势在必行。因为中国足球注定要踢下去，中国人的世界杯情结永远不会磨灭。

一个偶然机会，拜读了李力研先生的《竞技运动新论》一书，书中运动了哲学、人类学等等知识对中国足球进行了剖析，是一个很新的视角。从前，我们对中国足球总是局限在运动员的生物属性上，非体力即速度，而没有对足球的社会

属性考虑太多，偶有涉猎者大多有叶公好龙之嫌。约李先生写篇稿，打开中国足球这扇窗，打开心灵的这扇窗，让四面八方的空气流进来，便是本文和后面《解读足球》一文的来龙去脉。

说实话，对待李先生的文章我是以批判的眼光看的，他的观点并不一定就是真理。鲁迅不是有一篇文章叫《拿来主义》吗？敢拿，就意味着进步。

从世界杯看中国足球，这是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各家报刊都在做着。我认为要找中国足球症结就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而不是叶公好龙。

一

老早我就强调，体育运动中，只有足球才是人类民族性与文化性的最高体现。其原因是这种运动最复杂，它包含的“运动形式”最多最充分。

看足球，除了要找那份心惊肉跳的刺激外，还应该解读足球内部的东西。兴许读出了足球的“民族”与“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足球，也才能更好地欣赏和控制足球。

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英国是最早的“现代化”国家。

虽然，足球盛行于世界各地，但它至今仍是“欧洲文化”的浓缩和反映。

即使日本这样的“欧洲国家”（经济意文与现代化水平等多文面的“逻辑”关系），尚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举办许多个足球俱乐部以吸纳众多的世界级足球天才来这里踢球，但它由于是地道的亚洲人种和短小身材，从而足球水平也就只能是世界三流期至更低。韩国虽然颇有些“凶悍”的味道，但

在欧美足球面前，却显得像个不成熟的孩子。西亚各国虽然体力上高于东亚各国，但其足球意识与实际水平则大大逊色于世界顶尖水平。

人类的足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世界上最落后的足球文化区域有两个：一是亚洲，一是北美。

亚洲的足球，其所以落后，我认为它与太早出现“文明”有关。“文明”的过早诞生，使得这里的居民老早就丧失了足球所必须的“力度”与“灵性”。足球除了必须遵守规则这一最基本的“文明”要素外，更多地则以体现“野蛮、凶悍”为主。即使“野蛮”如“武士道”的日本等东方大国，也由于人种上的尺寸太小，力度太差，而不能在欧美人面前表现出风采。中国足球就更不用说了，有时是外表刚强而内心虚弱，有时干脆则是疲软和低靡。几千年孔孟文化的礼让、恭俭不能说对中国足球没有影响。

亚洲足球在欧美足球面前，首先是身材小一号，进而是水平低一档，这是事实。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队亏是没有出线。出了线虽然会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踢一场就回家，着实还会有些败兴的意味。中国的足球会给看客带来足球“愉悦”吗？

二

小组赛中，亚洲队无一例外，全部失败，足以说明问题。

亚洲人目前来说，显然不能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从表演意义上来讲，似乎还没有太大的资格在世界舞台上“卖弄”自我。卖弄太多，就会败兴，就会降低世界足球的格调。当今

卖弄自我的，仍是欧洲各国与南美诸国，甚至是那些极端保留运动天赋的非洲兄弟。欧洲大国中，英格兰虽然败给了南美阿根廷，但其失败却能留给人们以无数个悬念，它败得让人“思念”。十八岁的欧文兄弟，他的足球天赋，让人想到的不只是足球，而是优美的诗歌、散文和运动不居的飘动雕塑。稳健的丹麦人，能让巴西人出一身冷汗，虽败而犹荣，从而让世人好好品尝了一道大餐。原来这是海盗们上演的绝佳剧目。

世界上的足球，虽然有许多派别，但基本上是欧洲一元化的不同表现。即使是南美，那足球的精髓也不是纯然的“地理”概念，而是真正的欧洲东西。足球的流派与差别，只是欧洲文化内在精神的某种差异。差别在文化而非地理。不懂这个道理，就很难读懂足球，就不能从“球迷”的迷狂中解放，就不能从欣赏中获得审美的教益。欧洲的“近代化”进程，必然要创造出“社会化”程度最高的足球运动。足球的核心，在于分工合作。这是一个“大生产”的概念。农业大国很难产生这种东西。十个人需要“有机”配合，才能显出“角色”的分量。再厉害的足球天才，也无法一人踢赢一场比赛。接球、带球、传递、保护、攻击、得分，等等一系列过程，需要全场十多个人的集体努力。天才如罗·巴乔与罗纳尔多者，并不在于自己进了多少球，更在于他们在场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即使一球不进但起到了“核心”角色，同伴的进球中主要得益于他们的组织与传递，足球的真正魅力也就得到充分体现。后期的马拉多纳所起的作用，恰恰就是这种组织学意义上的“灵魂”。

三

亚洲的足球，问题就在于，既缺乏每一个队员的充分天才与过人本领，更缺少像欧美国家中“灵魂”式的“核心人物”。说实在话，亚洲人在足球的这个问题上，就像亚洲人在“现代化”问题上一样，缺乏一种“自觉的“土壤”。芸芸众生，五十亿人口，亚洲就占了三分之二，可这三分之二的人口中就是踢不出世界级的足球天才，这不就是问题？

谈到这里，使人无法不想到这次世界杯上的两个国家，即非洲的尼日利亚和欧洲小国克罗地亚。

尼日利亚，典型的非洲黑兄弟，贫穷国家，人口不多，但却有一百多号优秀选手在欧洲俱乐部踢球。它是近四五年来最优秀的非洲足球国家，**1994** 年的世界杯赛上，它的表现非凡。**1996** 年的奥运会上更是一鸣惊人，击败阿根廷而夺冠。这次标赛同样非凡，一上场就将足球大国西班牙击倒在地。个人技术之娴熟、体力之充沛、运动之流畅，让你看了真舒展。运动员那细长的腿、高提的臀、垂长的臂、尖瘦的脸，简直就像非洲猎豹和热带猿猴，力度灵敏，要什么有什么。就连巴西这种超级足球天才大国，也不敢将之轻视。然而，这样的国家毕竟尚缺乏一种“现代”的文化内涵。第二轮比赛中，就被欧洲中流水平的丹麦彻底击败。非洲人的那种“一盘散沙”问题，“个人单干”问题，终于在个人与集体有机配合的欧洲人面前暴露了出来。天才的黑非洲，天才的运动家，由于缺乏“社会”的“有机”，缺乏足球的“整体”而大比分地输给了欧洲。

然而，即使这样，不也给亚洲各国提供了“示范”？亚洲

的所有国家，能有尼日利亚一国所贡献出的足球天才多吗？没有天才，又怎能接近最高水平？

克罗地亚，一个刚刚从原南斯拉夫独立出来的小国，人口也就**480**万，足球水平却高到了击败德国，进入前四强的状态。如此稀少人中，比不上中国北京市人口的三分之一，足球水平却高出中国的十倍。从单位人口的足球天才贡献率来看，这里又有很大的文章可作。当我看到这支队伍一路冲杀，一路胜利时，不禁想到：巴尔干地区本来就是“运动”的摇篮，那时是古希腊“体育”文化的摇篮之一，那里有古罗马“好武”的遗风，那里是典型的斯拉夫人种，那里是力量型人口的主要代表，那里的男人个子很高，那里的居民在篮球、网球、乒乓球和足球等方面的具有世界级的运动天才。美国的NBA俱乐部中，就有许多南斯拉夫运动员，就有克罗地亚人。你看这次参赛的足球运动员，身高都在**1. 90**米左右。如此这般，仅就身高而言，与其说这是足球比赛，不如说是篮球比赛。中国乃至亚洲多数国家的篮球运动员，也就这么一个身高。一个在身高体重与力量诸方面都占有优势的国家，即使版图不大，踢足球岂能不显天才？凶悍如德国战车者，败在这个蛋丸国家的脚下，又有何奇怪！

足球，虽然处处充满着“偶然”（比如裁判问题，运动员犯规与受伤问题等等），但总的来说它属于文化与逻辑的“必然”运动。如果能用“偶然”来解释足球，那为什么这种“偶然”就总是不能降临在亚洲人身上？在我看来，“偶然”是次要的，“必然”才是主要的。因为欧洲文化圈里，足球就是踢得好。不服不行。

四

德国、荷兰、丹麦以及瑞典，属于沉着、稳健、凶狠、理智的一种足球风范；从这些队伍和运动员身上，会让你读出欧洲人办事认真的特点。

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做人与踢球一样，灵巧、多变、严密和热烈，身上有着一种南部欧洲人的活泼、机智和巧妙。有人将这些国家的足球风格叫做“欧洲拉丁派”，而我则将之称为“欧洲艺术派”。因为这些国家的球队没有什么人高马大，却有十足的欧洲“文艺”气味。

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更多体现着力量、凶狠、顽强甚至有些笨拙的风格。这是一种典型的东欧格调。东欧足球虽然不是世界级的水平，但间或常有不少天才的脚法，同样这是亚洲诸国难以企及与比拟的方面。

人们总是将南美足球理解成了“地理”文化，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错误，最少是一种误解。因为所有的南美队伍中，没有一个真正的“土著人”，没有一个印第安人。踢球的多是高鼻子、深眼睛的一群人马。更要命的是，南美队伍中还有黑人，即使不是全黑，也有许多二分之一黑人、四分之一黑人、十六分之一黑人。尤其巴西队，固然没有一个人是纯粹的黑人，但基本上都是罗纳尔多、里瓦尔多这样一群带有黑人基因的天才。除了贝贝托还白一些，除了邓加还算得上个白人外，巴西的天才们几乎都与“黑色”有关。正是如此，南美才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这里的人说的是欧洲话，不是葡萄牙语就是西班牙语。南美是第一代资本主义的“欧洲文化种植园”。如此这般，你能不说南美的足球就是欧洲文化的异域果

实？我觉得这样理解南美足球才会更加准确。否则，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至今亚洲不少国家在国民经济方面大大领先于南美但足球却大大落后于南美的现实。

用经济现象来解释足球的不足取，就在这里，它得不到充分的文化逻辑阐释。

那里有黑人，那里就会有新的运动生机。

美国的篮球如此，欧洲的足球如此，南美的足球还如此。

足球如果只是白人的运动，那么英国人和德国人无论如何也该回回都得冠军。恰恰相反，在白人的文化基础上，再加上黑人人种及其运动天赋，才会构成当今世界的足球力度。

也许你会说，亚洲足球就没有出路了吗？美国有那么多的黑人，美国有如此了不起的黑人篮球运动，但其足球水平却与亚洲一样低得不可思议。这里必有问题，但非此文可以说清。如果有人愿听，那就等另一篇文章来讨论。

论中国足球

——我的第一声足球呐喊

作为一名理论研究者，却不曾有兴趣讨论过某一种专门的运动技术，即使是最动人且被人们称为“天下第一运动”的足球，亦复如此。然而，我今天却要鼓足理论的勇气，来发表足球意见。至于毁誉，自有天地。

一、缄默与冲动

80年代初，中国足球队在出线世界几成定局的情况下却饮恨狮城。那些摇旗呐喊，为国助威的华侨、留学生和喊破嗓子的所有中国观众的激昂场景，至今历历在目，不忍回味。当时的失败，我虽有某种狂燥和懊恼，但仍然镇静地做了自我克制，希望理性的思考尽可能压制情绪的冲动。

1985年，又是在争夺出线权之际，中国队在京都主场的众目热望之中却输给了平时连广东队都赢不了的小小香港队，酿成了史称所谓“**5·19**”事件。那时的我，仍然紧紧压住自己的冲动，冰冷地注视着这种现象背后的特殊含义。

1988年，中国队出线还算顺利，第一次可以放足到汉城奥运会的世界舞台，但中国队却以未进一球的大辱班师回府。

如此现实，顿然一种莫名的惆怅和失落充满了我的胸膛。那时的我，仍然未发表只字的意见，仍以冷眼寻觅着什么。我只是怀疑，如果中国这样的队，真的有了所谓出线的机会，到世界杯上去比赛，其比赛的结果除了垫底不说，是否还有给足球败兴之虞。

90年代初的1992年，又逢奥运出线争夺。中国国奥队在开赛以来大起大落的艰难情况下，终于杀出了少见的威风，最后一战又是只要拼个平局就可稳操胜卷，足踏西欧，竟十年未竟之业。没想到，就在这个“只要打平”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开场不到10分钟，就让韩国攻入三个球，真是奇耻大辱。这一次，我无论如何也缄默不住，十年的等待和十年的思考逼迫我必须倾刻一吐为快，让理性的审视为中国人的足球游戏寻找某种真切的契机。

不能忘记，那天晚上，我放弃了案头一切本属重要的工作计划，憋足劲欲睹国奥队雪耻之战。但一打开电视，说实话，我一看到中国队身着白衣，韩国队却着装红衣时，心头在零点几秒钟之内起了一连串不祥之念：坏了，中国队此役可能要输，白衣不吉，易为火（红）攻，今晚天不做美，凶多吉少……还没等我去反驳平时我最耻笑的迷信，中国的大门突然被人疯狂地撕开了第一个大口，我抬头望表，开赛时间不到三分钟。霎时，我的心寒了起来，难道中国人最崇信的周易八卦，真要让中国人自己应验？难道这是神乎乎的“特异功能”大师们在背后真的捣了什么鬼，故意用《周易》和“八卦”这些鬼神迷信的东西害了中国队？……10分钟刚过，中国队输就成了定局。

球的确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不能缄默。难以抑制的冲动，催我拿起了笔，草成了这篇足球文稿。

足球必须研究。

因为足球是中华民族的某种影子，是一切体育运动所要表述思想的最大符号。

认识足球，才有助于认识民族；认识民族才会真正有助于反观足球，也才会真正知道中国足球的缺憾所在和努力方向。

二、足球啊，你是中国“近（现）代化”的缩写

圆圆的足球，总是不能在关键时刻滚入他人之门，却总是被人踢进自家门院，而且总是在稳操胜卷，大局已定之际，出现这种令人惊异让人尴尬的局面。这是十多年来中国足球的基本概况。这也许又能算得上中国的某种“国情”。这种局面，既让我看到是实实在在的足球，又让我联想到地球上东半球中华大地近百年的历史。

中国近代的一百来年，有好几次本该踏上民族现代化的机会，却都像这圆圆的足球一般，快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无一幸免地惨败了下来。一次是小皇帝光绪与康有为及梁启超合作的“百日维新”；一次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一次则是由平民知识分子发动的“五四运动”；一次则是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每一次努力，每一次失败，都不能成功。正因为这样，中华民族至今都在为自己的近现代化而苦苦奋斗。她不像日本，一夜之间，便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化大国，立马就向沙俄和中国进行战争。尽管其在“明治维

新”之前，它比中国还要落后许多。

中国的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努力，真正的历史虽然只有十年，但这十年却与中华民族的近代百年有着惊人的相似。也许是这十年以最大的限度在这奇妙的足球场上，浓缩了这百年的曲折而复杂的历程，重复着某种民族的“对外”心态。也许足球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真有某种惊人的逻辑同构。足球毕竟是一切体育运动中最复杂且最能体现民族合作精神的伟大运动。正因为如此，也许中国的足球，在中国未曾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之前，根本就不可能真正跻身世界足球强烈。

这样的推测可能过于悲观，也可能过于宽泛。但这十年的足球运动所提供的各种信息，用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尺度加以衡量，就会得出这种兴许悲观的判断。但愿这属于痴人说梦。

三、足球是种子

国奥队在不足**10**分钟之内，就以三球之悬殊败给了韩国，失掉了走向世界的再次机会。人们因此而将愤懑掷向场上的运动员和场下的某某教练员甚至与球没有多少关系的足球领队，此类举动，相对于球迷的激情，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然而，相对于冷静的理性审视来说，它毕竟显得偏激、草率和浅薄。

中国队屡战屡败，其失败的原因，在我看来，最少超出了足球本身，也超出了运动员和教练员的范围。真正的原因在于超过足球本身的复杂的民族文化。

小析足球本身，各位冷静的看客同样也会倍感惊奇。

在中国，几乎没有人从心灵深处树立一种真正的足球尺度：足球是西洋运动，是外国体育的种子。

没有这一基本的足球态度和理性尺度，中国的足球就永远只会停留在“足下”，而不会滚得更远，不可能在“足球文化”上取得任何可能的进步。因为这一尺度，涉及到中国人如何理解足球这一根本问题和基本心态。

当我还是一名本科学生的时候，任教最少**20**年以上的足球老师，怀着绝顶虔诚的态度向我们讲述着足球的起源。他一再强调，足球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古代的齐国和两汉，盛行于唐宋两代，三国的曹操如何用蹴鞠训练过部队等等。在他看来，现代足球虽为西方体育，那也一定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东方文化，古代西方不可能有中国这种足球云云。为此，这位至今健在的我的大学足球老师，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考证了中国足球如何传入西方并如何逐步得以壮大的历史。我后来猜想，先生的这番努力，即使没有任何价值，但考出这个“世界第一运动”产于中国，中国人即使永远踢不出亚洲，脸上也会有几分得意的光荣：中国毕竟是足球的祖先，西洋外国只配当我们的儿孙。老子看见儿孙踢球，心中自有某种骄傲。

这就是中国人的一种奇特足球态度。大学教授尚且如此，那些天天“爱国”的足球“迷子”又何不是如此。

然而，这位教授级的足球老师，几十节课中却缄口不谈中国足球何以失传的历史原因和民族原因。似乎这些问题，他从来不去思考，好像这样思考完全没有必要。仿佛现在的中国仍然拥有可资世界骄傲的足球产权。

当局者昏，局外人清。

深刻的异域史家，匈牙利体育史学大家拉斯洛·孔则冷静地看出了中国足球与现代足球的格格不入。他说中国足球可以“紧接一场比赛之后，又有另外两队上场，比赛一直要持续进行到都取胜为止。”他补充解释道：“东方对‘游戏’的释义，没有绝对胜者的概念，因此，比赛不采用失败者被淘汰的办法。”

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材料时，真的有些不太相信。难道中国人就这样奇特，比赛都不敢有真正的胜负之分？难道中国古代的足球，与现代的这种足球比赛竟会是如此大异其趣，风格不同？

我为此真还翻阅了不少的古籍与史书，结果还是人家这位匈牙利人讲得正确。中国古代，最起码是宋代这个有限的古代，足球比赛的确是不分“胜负”的。踢球的人，只是在场上热热闹闹地“玩闹”，彼此不分轩轾，让观者乐呵呵看一看就算完事。高俅之足球，就更是这种足球，他相当于皇宫里的足球弄臣，他的足球更是令人“眼花缭乱”，巧而不实。

中国的古代足球，还曾搞过隔网制，中间有个大洞，踢球者从这洞中踢来踢去，以为过瘾，或炫耀技巧。

中国古代的足球叫做“蹴鞠”。它的运动形式很像是从汉代百戏中演变而来，是典型的杂耍。并没有严格的“立法”。

这才是中国的足球。

这才是以追求“善良”为道统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足球。这种足球与以现代西方文化传统中的那种足球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别。我的足球老师不讲这种差别，我们的运动员至今不知道这种差别。我们如此之众的足球父母们，更是不去思考这种民族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基本差别，更是不懂中

西足球的根本差别，只是一味的将孩子送进足球学校了事，以为孩子在足球学校里踢上几年，就会有个好成绩，进而弄不好就会混个“明星”（哪怕是国内明星），继而冲出亚洲，走上世界。

这种对历史与文化的无知，又何止是运动员和大学教授，就是我们的专职足球研究人员，又有几个对此问题发生过兴趣？

那些成日在电视上和报章杂志上，喋喋不休，谈论足球，评论足球者，虽然对足球百倍地大感情趣，甚至有人因为写了足球而发了大财，买了汽车，购了洋房，成了“大腕”，但其对世界足球的历史和中国面对足球的那种奇特心理，却依旧一无所知。

如此这般，尽管时下中国人的足球也算是格外的热闹，更何况又将国外盛行的“俱乐部”制和“职业联赛”移进了中国，但绝大多数球迷们，尤其那些不可一世的足球理论家们，却对中国人踢球这个“历史事件”没有一顶点的头脑。

到头来，那些花言巧语，那些足球评论，那些吊胃口的异域说法，却将中国球迷的胃口吊得老高，中国的足球却依旧原地不动。如此这般，竟害得球迷更是不满中国足球，埋怨中国和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一口气踢出意大利的那种足球。

我在此大喝一声：现代足球不是中国之物，它发源于英国，是西洋文化的体育种子。

中国人要想踢好足球，就必须为这颗种子寻求基本的土壤、气候、水分和肥料。

成语“淮桔成枳”讲的就是种子与气候条件相脱节之后

的痛苦境遇。理论的思考比直观的愿望和感情冲动，毕竟要深刻一些。

四、民族是土壤

既然国度、文化和民族心理充当着现代足球这一体育种子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那么，中华民族要想使这株西洋“野种”在自己的土地里茁壮成长，那么就必须进行必要的土壤分析和民族反省。

从传统角度来讲，中华民族似乎很不适合开展这种以野性展现为特征的足球运动，除非得到某种巨大的土壤改造。中华民族是一个与西方民族在行为特征上存在巨大差异的民族。一般而言，西方民族从古希腊开始一直到近代的英法德美，都是一种以体现“运动”、“对抗”为本色的文化传统。这种本色无论在哲学、医学、道德和艺术等方面，都格外突出。而在体育方面，则更是鲜明直观。正是这种以“运动”、“抗争”为特征的民族，才有其与自己性格高度吻合的体育传统和运动特色。西方的体育运动无一不是“抗争”性的，他们的足球更是这种动作酣畅、风格淋漓的体育运动。西方的体育中，见不到“宁静”和“中和”这种东方式的“和气”与“太平”。

相反，中华民族则基本上不主张运动和抗争。即使是在先秦战国时期，虽然天天打仗，虽然各国之间都在备战，虽然那个时候贡献了许多勇士，但总体文化中并没有“与天相斗”的格局，原因是中国的“萨满教”或“巫术”般的思维尚深重地拖着中国人双腿。就是说，中国人可以人和人斗，但不敢与自然斗。战国末期，出了一个韩非，讲了一两句类似

于“人定胜天”的话，却因得罪了某种传统的文化神经，而被人们叫做为“法家”，意思是过于“不讲情面”和“过于厉害”，最后还差点像商鞅那样被“五牛分尸”。

在中国，一听你是“法家”，你就和秦始皇一个模样，是一个十足的暴君。所以，在中国提倡“人定胜天”者，注定没有什么好下场。中国人讲究的是“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天”）的和谐统一。一“斗”，就会惹得鬼神不安，就会带来居家不宁。韩非的言论，仅仅是个口号，就让人这样不甚高兴。韩非一派没有成为中国文化的主体，其原因可能与此有很大的关系。韩非与李斯两人的“法家”理论（其实是儒家理论的一种变种，韩李都是荀子的学生），推动了秦始皇的革命，却不能构成中国秦汉以后的主体文化。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我的推测，就是“法家”们的“斗争”过于厉害，以至惹出了问题。

先秦时期，中国文化就十足地开始了“宁静”。虽然当时和以后的书本中还在大讲特讲“生生不息”，但那也只是书本如《周易》中的东西，人们在行为上并不能像西方人那样与自然相斗，与自然相争。其余主要文化典籍则到处充满了反对运动和力主静止的东西。比如《大学》中有“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庄子》中则有“道不争而善胜”，“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即使是土匪理论老窝的《墨子》，其中也充满了“兼爱非攻”的说法。

到了两汉，就更是开始了“柔道治国”的政治方略。

汉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讲道：“文德为贵，威武为

下”；宋明理学及其朱熹等人更是主张“主静从敬”，陈白沙则认为“静可能也”和“观书博识，不如静坐”。即使是王阳明这样“好动”之辈，虽高扬“实践”理论，但又在修身和修性方面，主张大家去好好“静坐”以进行“磨练”，他的“好动”也只是在“大脑”中动动而已。中国的禅宗也是突出一个“静”字。

……

要不是这种种“静”、“敬”和“无为”，要不是这各种“反动”，也许还不会有后来的“五四运动”。

“五四”的意义，就在于当时的“青年”，比较了中西两种文明，深深觉得中国人的文明的确是过于陈旧，过于“反动”，过于与世界大潮流唱着反调。于是乎，他们开始了“革命”，开始了心灵深处的“爆发”，开始了文化意义上的真正“启蒙”。难怪“五四”时期，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都曾猛烈向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开火”，也难怪鲁迅和钱玄同坚决反对年轻人看中国的线装书，并说每每观看这种书，就会令人犯困，令人沉静，令人不动，令人没有了战斗的欲望。

鲁迅在“五四”以前，就曾说过：“《老子》五千言，在于不撄人心”。

后来我有本事看懂《老子》时，更是觉得这书讲得全是让男人如何变成女人，从而“以柔克刚”。该书虽然充满智慧，但这种智慧却有赖皮的味道，是军事理论中各种“游击”的策源。难怪我们的队员踢球时，总爱搞些小动作，犯一系列不该犯的无为之“规”。这可能就是老子的后代有意无意受了这种“老子”的影响，寄小动作之捣鬼于成功。然而，这种举动，实在是太有些落后。

总之，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从来就没有为自己尚要发展体育这一问题，提供丝毫的理论可能。

正因为如此，中国历史上除了外来文化影响下的唐代马球外，几乎再也没有自己尚可表达“力度”、“野性”、“猛烈”等张扬自我的所谓体育运动。中国的武术早已套上了沉重的道德枷锁，最著名的“气功”更与体育没有什么关系，仍是“静敬之道”、“填虚化气”之类，鬼鬼神神，不亦乐乎。

正是这种文化道统，那种用脚所踢之“蹴鞠”，那种所谓中国式的古代足球，便永远不可能自觉演化成近现代英国的这种充满厮杀和拚搏的现代化足球。

现在好些可爱的球迷，一见中国足球队员甚或某些国内级明星踢不好球，着急之下，就骂他们是臭大粪，没给他们这些看客踢好云云，这些球迷实在是些地道的“五迷三道”之辈，不知道自己的老祖宗在古代的“文化授精”时，就没有给他们的后代“射上”这种会踢球的文化基因。总而言之，中国人很少懂得中国的文化中，没有能供踢好足球的理论。

球迷是球场上的看客，却是理论上的瞎子。道理就在这里。

好些坏理论，欺骗了球迷，道理也在这里。

我这里的“坏理论”，专指那些只讲横向“系统”而不讲纵向“历史”的各种足球理论。更指那些动不动就拿外国明星欺负中国明星与球迷的理论。

五、中国，“内在超越”

近年来，有人从文化学角度进行研究，得出许多不少有益的结论。这其中，就有人认为西方民族及其文化是一种典

型的“外在超越型”性格，而东方中国的民族及其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内在超越型”性格（如美籍华人余英时所论，见其《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一书）。而我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的理论基础上更认为，西方民族是一种典型的“运动民族”，而我们东方如中国民族者，则呈另一种格局，属于“反动民族”。

这里的“反动”，不是“文革”期间的那种骂人的政治术语，而是专指“不提倡运动”、“反对身体运动”等具体的文化内容与特征。

相对于我们今天讨论的足球来说，这就是最有野力的“种子”（足球）与它所必需的“土壤”（民族与文化）之间的根本逻辑关系问题。足球这颗洋种在中国的土壤里发生了矛盾，闹起了脾气。中国人驾驭不好它，它也不听中国人的话。足球胡乱滚，害得中国人对它很有意见。

中国的这种“反动”文化特色，还从传统心理方面极大地制约着包括足球运动在内的所有以力度为主的体育发展。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民族对“悲剧意识”非常淡漠。中国传统的审美中极少有“丑”、“恶”、“死亡”和“苦难”等范畴，有的则是“中和”、“良知”、“温厚”、“多福”、“长寿”之类的东西。正因为这样，中国的足球才会“比赛一直要持续到所有的队都取胜为止”。也才会出现“东方对‘游戏’的释义没有绝对胜者的概念”这种情况。这里的“没有绝对胜者”，也就等于没有“绝对的败者”。中国的文化性格中，无法接受失败，更无法忍受失败和痛苦。梁启超早就看出这一情况。他在《论尚武》一文中，就指出中国古人在送自己的孩子当兵时，总是哭个不停，诗人在做边塞诗时，也总是将战争描述

得如此可怕，镇守边关也是那样的痛苦不堪等等；而他梁启超在日本所见到的情况则与此完全不同，父母兄弟送其亲属当兵时，则全家“喝彩”，还要用各种小彩条进行一番“庆祝”，并用“祈战死”这样激昂悲凉的字眼来鼓励自己的孩子和亲属笑着征战，死着回来。活着回来的，不是好战士。故曰“祈战死”。

日本的这种格局很有点鲁迅在《斯巴达之魂》一文所讲的希腊风范，也像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武士”、“刺客”那种“不要命”的性格。

可惜，后来的中国人渐渐没有这种基本的性格。

检阅中国的文学材料，虽然在唐诗中不乏有各种慷慨激昂的“力度”张扬，但更大比例的文字，则是悲悲切切，哭哭泣泣，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生死别离，无限情愁云云。

然而，世界并不完全以中国人的意志为转移。

要生活，就得斗争。要斗争，就有牺牲，就有失败，就有悲壮，就有悲剧。

这种“生活”的格局，反映在体育上，就是任何比赛，无论人多人少，真正的胜者只有一个，剩下的人都全是不同程度的败家。比赛中的苦难与失败总是多数。体育的这种特点，最大限度地浓缩了人类的生活格局。但它对于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来说，则完全的格格不入。所以，中国古代不提倡英雄，现在也不太提倡什么英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车匪路霸”，而观者则鲜有人与之敢斗此种真正的社会悲剧。见义勇为者在中国如此之少，那是因为中国英雄之如此之少。

而将《三国演义》与《水浒》中的人物当成中国的所谓“英雄”，一半的原因是中国人向往着英雄，一半的原因则是

文学家的盲目。《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有多少是真正的英雄，我这里不太好说，但《水浒》中的所谓英雄，经我对这部书的来源之学习、研究和考证，大多数都是胡编出来的人物。因为这部书本身都是七凑八合编造出来的（以前叫做《英雄谱》），更可知其中人物之真假虚实。

由于中国缺乏英雄，于是中国人也就格外的想念英雄。这种情况下，就有人摸住了“国民”脾气，不惜假造各种英雄人物，让老百姓终于过上“精神瘾”，茶余饭后，促膝长谈，若比真事一般。

以我之看法，中国真正的英雄，应是司马迁先生所作《史记》中的那些个“刺客”和“武士”，如荆轲、李广之流。其余者或多或少都有些假造的意味，就连百姓如此喜欢的关云长，也让《三国演义》的作者，造成了神一般的人物，以致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一带，人们将他供奉成了“关老爷”。

中国的英雄多是这种隔了好几个时代以后假造出的人物。这些人物，由于来自于书本，我将之称为“书中英雄”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中国人的“超越”，多在精神，而少在肉体。中国人的英雄梦，多在书本，而少在实践。这与西方大异其趣。

历史虽然匆匆翻过了许多页码，但民族的心理传统却未必一时能够彻底改变。当代中国极力提倡足球运动，就其本意来说，十分的可歌可贺，但如果不正确审视其土壤条件中的主静与“反动”，弄不好就会在“可歌”的后面又需加一个“可泣”的字眼。

中国足球极难翻身的原因，就在这里。

要记住，足球是典型的西方“外在超越型”的民族的文

化产物，它本来的文化土壤到处都是运动与抗争，是希腊与罗马时期就已奠定好的“斗争”土壤。“反动”的中华民族土壤中命中注定，难以长好这棵以动为本的西方种子。除非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对这种土壤以及相关的气候和水分有所改造，简直是别无他法。

六、无情的报应

只有对足球本身以及足球土壤中的民族传统加以反省，才可能真正对绿茵场上的一切情绪表现进行观照。事实上，由于上述诸多与现代足球不甚吻合的传统心理及文化势力的存在，我国足坛不可避免地常常出现这样一些非现代的矛盾现象。其中如下两点格外突出，引人注意：

（一）虎虎少年与横秋成年

大家都知道，中国少年足球队无论就其个人技艺还是比赛实力，特别是那种冲锋陷阵的勇猛威力，决不比世界任何优秀国度相差多少。倒是经常在这种“孩子”比赛的世界中，独领风骚。就好比中国的中学生，每每在世界的各种“奥林匹克”知识大赛上，总能拿到许多“冠军”一样，大大给中国人长了志气。

甚至巴西这样的足球大国，我中华“子弟”，却也能将之大门狠狠踢破（如 **1986** 年的世界少年比赛，中国就赢过巴西）。然而，一旦这支本来极有出息的少年队伍成熟，变成了成年人的球员，就发生了另一种质变。当年的那种虎虎生气，消失殆尽，变成了横秋老气。从此就再也别想打赢各种重要的足球比赛。

这种现象，也很像最近十多年甚至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诸

多“神童”和前面提到的在各种“奥林匹克”知识竞赛中取得“冠军”的中国孩子。每每在十来岁上了大学之后，就再也不知道还有过什么非凡的业绩，这些神童每每从国际大赛上拿回诸多化学数学和物理的“冠军”之后，在首长和领导的接见以后，我们就再也不知道还有任何出息。反正在科学的道路上，从没有我们这些“世界冠军”逼近“诺贝尔奖”的。

中国的科学“奥林匹克”出现了这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足球同样也出现了这种鬼怪式的现象。只要是少年，中国人一定胜过外国；只要是到了成年，中国人就再也没有生气，更不用谈什么吓人的虎气。

这一反差现象，以往国人没有太多的注意。这种现象，我在这里第一次提出。我的问题是，难道这种现象真的就要服从马克思讨论世界文明特征时所讲过的中国“是早熟的孩子”这个规律？

中国是否“早熟的孩子”，可以暂且不谈。但这种“未老先衰”现象的背后，我猜测一定是隐伏着重大的有待揭秘的历史问题。

（二）训练现代化与生活传统化

少年成了成年，也就意味着不成熟的孩子终于有了成熟的心灵。

什么地区，造就什么人物。成熟的西方人，完全是一种西方人的心灵；成熟的中国人，自然就是拥有了一套中国式的成熟心灵。

成熟的中国人，自然拥有的是中国式的灵魂。

中国人成熟的标志，最主要的就是看你对社会惯性和传统的认同程度。认同的越早，成熟的也就越早。《红灯记》中

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然是由于贫穷，才逼迫穷人的孩子早早认同了中国成年人的标准，明白了“做人”的诀窍。

然而，不管你是穷人的孩子，还是富人的孩子，只要你对中国成年人的标准和历史传统惯性有了认同，那么你就真正地成熟了起来。认同的越全面，对传统的行为规范和伦理尺度掌握得越深透，则其人成熟得也就越早越完备。

应该指出，在中国越是成熟的标准，便越是不适合足球运动的发展。不少有天赋的少年常因未能及时“成熟”起来，而中途遭到淘汰，从而半路夭折。这种不“成熟”虽然很有利于足球，但却在“做人”上早早让你断了奶，成不了人，你还踢什么足球？这才是我们应该引以思考的一个“人才”问题。一个完全是逻辑悖论的怪圈问题。

我们中国运动员的平素训练，可以满场跑动，左右配合，沉底传中，轰击大门，煞是一片现代足球的场面。而训练场下的生活中，运动员又必须更多地恪守着各种成人化的伦理标准。即使在各种大赛之际，再紧张的集训，也总是生活压倒一切，伦理大于训练。更何况总会有个“领队”在你旁边，只怕这些小子们深更半夜出什么妖蛾子，甚至还时时给你讲解“社论”一类的“原则”。传统的绳索总在拖着前行的后退。“非攻”、“不争”和“中和”的传统血液早已注入了我们沉重的大腿。这种局面，多年来不可避免地总要出现这样一种奇怪现象：运动训练的现代化和日常生活的传统化。其实这种矛盾又可更准确地概括为：足球场上的西方化和足球场下的中国化。还可表述为种子的西方化和土壤气候条件的东方化。

“中国化”和“东方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家长化、领队化、“政委化”和“社论化”以及各种“原则化”。有这

么多的"化"在你身边，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一定会被这种东方文化彻底"化"掉，而且非"化"不可。"化"过之后，大概是再也不好踢球去了，即使在出线之际，极想将球踢好，却又"原则"得让你跑动起来犹如"原则"，生硬古怪，莫名其妙，绝没有调皮蛋马拉多纳的那种自由和潇洒。

这就是中国足球不易走向世界的重大社会背景。当心啊，前面提到的"淮桔成枳"。传统的无意识，成人化的道德感，足球政府化的庄严原则性，都会时时给这颗外国种子在温度、肥力方面产生不同影响。中国运动员射门意识总是不强，进攻意识总是很差，传带总是过多……

七、足球与地域及其民族

如果我们再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审视足球，足球的奥秘就更加清晰，足球的脉搏就会一触即明。

我们把地球分成典型的五大块落。这五大块落分别代表着不同的人文背景和足球水准。它们正是北美、南美、欧洲、中国和非洲。有趣的是，在这五大块落中，足球真正发达的只有两个，它们就是欧洲和南美。非洲足球尽管偶尔表现不错，但因文化水准较低和经济状况太差，从而失去了讨论的意义。世界上现代足球最不发达的也有两个块落，那就北美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

这一现象我最少注意过五年。现在有把握来分析它并揭破其中秘密。

而这不得不再从民族特性着手。

美国这个当今第一王牌大国，按照其好当"世界警察"的脾气，它的足球也应该搞成个第一大国。然而恰恰相反，它

的足球水准低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1987** 年 **4** 月，我与美国南卡罗大学体育社会学教授兼历史学教授的奥登科克有过一次轻松的对话，对话让我获得了启示，认识了这种“反常”。我问他为什么美国人的足球水平如此之低？他答：“美国人嫌足球不过瘾。美国的社会生产步伐，已使美国人难以适应你们所谓的soccer（即英式足球）那种慢节奏和拖蹋作风，美国人只能适应自己的美式足球football。”

聊天很随便，答复也很自然。但其中却基本上道破了秘密。

原来这个最为发达的国度，飞转的机器齿轮已把民族的心理节奏提高到了嫌弃足球不过瘾的地步，难怪美国人最痴迷的是他们的橄榄球、拳击和NBA篮球以及棒球之类力度大、节奏强、见效快、动作猛的各种运动。与之相应，摇滚乐、霹雳舞和踢踏舞何其发达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

比美国略为逊色的欧洲诸国，它们虽谈不上像美国那样的过于发达，加上某种厚实的文化传统（也不像美国那样历史过于短促和浅薄）的影响，民族的好斗心理和抗争意识与足球运动却有着完好的吻合。欧洲是近代文明的发祥地，是现代化的摇篮，传统精神中不像中国充满了兼爱非攻，相反却充斥着武士精神和决斗风范以及海盗般的勇猛抢劫。足球运动恰恰是欧洲人的审美物态，它的野性张扬与欧洲人的传统心态有着高度的同构。欧洲民族拿足球运动过着一种雄宏的精神之瘾。德国诗人海涅曾这样评价过诞生现代足球的欧洲故乡的文化背景：如果说英国统治着海洋，那么，法国则统治着大陆，而德国则统治着天空（他所说的天空是指思想中的那种天空，而非实在的物理的天空，这里指的是德国的

哲学思想对世界的影响）。的确如此，任何人在观赏任何一场欧洲足球比赛，都会感到，不论是地上的勇猛、海上的威逼，还是想象力之无比丰富，都在充斥着整个小小足坛的分分秒秒。意大利、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以及西班牙和荷兰小国，足球的那种酣畅淋漓与其资本积累时期的野蛮扩张恰恰有着相当惊人的类似。

南美诸国，经济平平，不属发达，人种也不是那般身高马大，然而，就这么一个条件，足球却踢出了世界最高水平。这可能也是一种不可思议。但是，这些不可思议中，却有着无比丰富的思议。这是因为南美诸国在文化本质上属于欧洲而非本地土著。我们知道，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就是从葡萄牙和西班牙首发其端的。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代资本主义”的老牌帝国。而南美诸国又恰恰是这个第一代资本主义侵略扩张时的移民国和殖民地。所以南美人尽管由于营养不良而未能体高马大，但骨子里却依然奔腾着哥伦布、麦哲伦、亚麻利哥、德芮克等海盗的冒险血液。只有从这种文化背景中才能最好地解释南美人为何如此迷恋足球，为什么不会踢球的公民不得参与总统竞选等等。这是对野性的渴望和弘扬。这是对生命力的万分肯定。然而，正因为南美人是第一代资本主义的移民国和殖民地，文化传统中某些与中世纪传统并未彻底断绝关系的因素仍然占据一定比例，于是，南美人的足球风格便大大不同于欧洲诸国。欧洲人简洁明了且大刀阔斧，而南美人则动作细腻、技术娴熟。这大概表明南美诸国或多或少与中世纪某种繁文缛节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正是这样，南美球星虽技艺高人，但难免华而不实。

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地区，则从未有过冒险的传统。汉

代张骞出使西域是为了汉代中原的政治和军事，联合西域军队以夹击匈奴；中唐玄奘奔赴印度则为了经卷，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也是出于宫中的另一种需要，到西亚寻找丢失的另一个皇帝。所以，中国者，历史上很少有真正的商业冒险，从未像西洋海盗那样为了香料和黄金而不惜血本将世界搜尽。更何况中国的皇帝曾经代表民众，历代都在严厉打击各种商业投机。打击投机固然可爱，但因此而将商业冒险打掉，则实在不幸。中国的商业不能发达，与此历史现象有着直接关系。

如上所述，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向以“反动”而著称，所以在这块文化土壤中，栽培上一株血腥味十足的西洋种子，成长起来自然是格外的费力吃劲。即使是以刚健著称于世的日本和韩国，也因中国的这种过于沉重的文化影响，而其足球总也踢不出世界水平。日本人可以搞出世界一流的技术，但搞不出世界一流的足球。

这就是足球世界的基本格局：北美嫌足球过不了瘾，欧洲南美觉得足球最最过瘾，而亚太中国则以足球过不上瘾。

八、中国之路

理论的视野必须有实践的根基。

我的足球议论、文化比较，最终落脚之处，毫不例外，只能是中国足球。我是中国人，我的足球理论自然是为自己的民族足球而考虑。我深深感到，中国的足球作为一种最大的民族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必须尽快成长而且健康成长。然而，这株西方文化的种子，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且开花结果，其工程之大，我以为几乎与中国的现代化一样庞大。足

球不比乒乓球、羽毛球这类单项天赋式的项目，也不比其他集体项目。它是人类目前最大的集体项目，本质上它是一项最有代表性的社会运动。它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民族生活中一切最能适合足球发展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几乎完全等同于商业文明下的竞争品质和伦理尺度。没有近代欧洲的商业文明，便没有现代欧洲的现代化，没有欧洲的现代化，便不可能有欧洲的现代足球。

作为中华民族的某种信号也罢，寒暑表也成，中国足球的荣辱成败，必定与民族素质有着内在的联系。

中华民族只有真正彻底改造了某种极不利于商业社会发展的“非利道德”和“非攻兼爱”，骨子里有了真正的野性欲望、冒险风度和野蛮体魄，那么，本来就以灵秀著称的中华民族，其脚下的足球，才会铿锵有力，诡计多端。

足球是野蛮运动。野蛮运动需要野蛮的民族。只有野蛮的民族才能驾驭野蛮的足球。足球运动员作为民族的代表，他们一代接着一代，永远都是民族的影子和缩写。中国运动员骨子里永远流淌着你我他等华夏民族的血液。他们的荣辱就是我们的荣辱，我们的素质改进最后才是他们的素质改进。这就是文化背景与圆圆足球的微妙关系。这不是危言耸听，更不是玄学诡辩，而是文化哲学的必要提醒。

常看中国队踢球，不满的看客总爱叫嚷：“中国人不适合踢足球”。作为牢骚和脾气，兴许可以理解，但作为“说法”和“理论”，则显得过于浅薄。我认为并且坚信，中国人可以搞足球，附加条件是这个民族必须舍得改造自身的价值尺度并勇于弘扬野性。

中华民族只能通过改变自身土壤并最大限度地满足足球

规律的一切要求，而不能通过修改足球规则来适应自己的力度和口味。足球毕竟是全人类的文化结晶。未来的足球只会越来越猛烈越来越野蛮，而不可能倒退到中古时期的唐宋足球。为此，我们中国人搞足球本身就是对中国人自身素质的极大改造，并对传统文化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足球是中国人面对西方文化而如何抉择的一种心理考验，尽管许多人认为没有如此严重。但在我看来，全部的奥秘却恰恰就在这里。

因此，凡是专家和内行能讲的我这里都不讲，以免重复。而凡是大家不甚注意或注意不够的，我则抓住不放。多重力量的研究，多方位的努力才能促使这颗本无理性、半径相等的圆圆足球最大限度地按照中国人的意愿而刻画自己的飞行轨迹。

在我看来，中国足球的真正希望，只能建立在本世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所期望的民族力度基础上，即严复的“鼓民力”，梁启超的“尚武”，陈独秀的“兽性主义”和毛泽东的“野蛮其体魄”。只有这些基本的民族力度有了提高，中国人所日夜寄于希望的足球才会真正走向世界，参与世界第一运动的心灵对话。

1992年3月作于
中国足球队败后

附录四则：

力研按：由于这是我的第一篇较为系统的足球文章，为了慎重，也为了庄重，我把这篇稿子送给了《中国体育科技》的责任编辑魏协森先生。魏先生也出于慎重等多方面考虑，将此文又送给了若干专家进行评审。

评审的意见，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将之收并起来，纳入一体，附录如下，供大家参考。

1. 刘宗耀先生评语 *

此文观点较独特，从历史文化观念来讲，有说服力。当然文中所指现象不仅限于中国，还包括其他东方国家。即使就中国而言，也不完全相同。比如蒙满等北方民族就与汉文化传统不尽相同，尽管它们曾经受过中原文化的熏染。汉文化传统的确十分特殊，并与足球相关。

还有一点，就是足球运动的商业化趋势，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就极难成熟。正像前苏联是体育强国，但不是足球强国一样。苏联的足球也是多年未能“飞起”，从未拿过世界杯。

刘宗耀

1992，6，1

注：刘宗耀，为《中国体育科技》杂志编辑

2. 蒋嘉华先生评语 *

《论中国足球》一文已认真拜读。

作者敢想敢说，观点颇有见地。

中国古代文化中，形而上学的东西是多，包括周易在内。毛主席不是也说过“形而上学猖獗”的话批评过一些人吗？这是与中国文化有关的。

但就是在这块土地上，辩证唯物主义不正在鼎盛发展吗？从鲁迅的“拿来主义”到邓小平南巡时讲的“利用资本主义”，便都是明证。

我认为还是“实事求是”好。改造一个民族的文化，即

使是专门扬弃其糟粕，也是要耗费岁月的。“把三大球搞上去”，贺龙一代未成，李力研一代未必不成，这一代不成，再下一代准成。

毛主席有句话，我记不太清了，大意是讲要坚持最后五分钟。我认为中国足球也就是要挺过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否极泰来。我深信中国足球会有希望。

蒋嘉华

1992，5，30

注：蒋嘉华时任国家体委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评语做完之后不久，不幸去世。

3. 尹怀容先生评语 *

此文已阅。有以下几点看法，供参考。

一、我国足球落后的原因是复杂多方面的。加之足球广泛的群众性，议论的人多了，陈述的原因也就愈加多样化了。作者企图从传统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寻求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其论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是主要原因。“文化”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文中尚有些文化自相矛盾的问题。我国乒乓球先进，但如果将其主要原因归之于“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恐似不妥。

二、作者对中国足球了解不深，情况不太明白。如对“虎虎少年横秋成年”；“训练的现代化与生活的传统化”等的议论就是例子。

近日太忙，未过细推敲，谨供参考。

怀容

1992，5，27

注：尹怀容，时任国家体委科研所球类研究室足球专业副研究员。

4．华夏智慧与中国优势

——兼答尹怀容先生

历史与现实总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中国足球举步为艰，的确与中国文化土壤条件下的民族性格、行为结构有关，即马克思在《资本论》序中所讲的“死人拖住了活人”；而中国乒乓球和羽毛球，抑或体操、棋类等方面的优势，当然也与这一土壤条件下的华夏智慧有关。中国近万年的文明历史，虽使华夏民族丧失了许多与身体素质发达有关的力度本能，致使力量类项目在中国没有什么优势，但却大大丰富了自己的智慧条件。更何况中国自古就有“兵家诡道”的文化传统在训练着民族的机智与灵巧。就目前而言，中国体育项目中的优势，仍然多表现在与智慧灵巧有关的心智方面，而非要求身高马大素质过人的体格方面。中国的足球现状是文化传统的必然产物，乒乓球、羽毛球等项目的优势也当然是这一土壤的果实。不妨可参阅一下恩格斯、爱因斯坦、李约瑟甚至中国人李泽厚等有关中国智慧的论述。

而至于“虎虎少年横秋成年”和“训练的现代化生活的传统化”，与“情况不太明白”本无任何关系。这是学术分析，绝非什么行政公务。

谨此。

力研简答

1992，10，24

我说施拉普纳

——洋种与土壤

十年春秋易逝。中国足球队冲向世界颇难。就在我的《论中国足球》一文写成并在几个编辑部里“出差旅游”之际，国人在一片“声讨”足球的热浪中，提出了各种改革足球现状的对策。体育政府部门更是高瞻远瞩，痛定思痛，将足球视为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破天荒第一次理直气壮名正言顺，把中国足坛第一教鞭从国人手中夺下，交给了洋教头德国的施拉普纳。如此之举曾为众多为中国足球忧心似焚的球迷们所共赏，仿佛洋人施拉普纳一定会给可爱又可恨的中国足球立刻带来翻身的曙光。刹那间，连篇累牍大报小报都在寄厚爱于此次的向洋人虚心请教。施拉普纳一夜间在中国变成了最明最亮的“巨星”。离别中国足坛良久的古广明也作为真正内行助理跟着这位洋人回国效力。

施拉普纳大刀阔斧，几换人马，最后才选中由他看来尚有足球灵气的精兵良将。

两月之后，出于练兵，也许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在中国大地上举办了戴拿斯杯足球赛。赛前许多热情纯朴善良的球迷和不少手笔灵快的报章记者们，连连卜卦，预测这次中

国队的成败。不少人想，这次由洋教头执教的中国新队该有露脸的机会。

不料事非人愿。中国队并没有取得优胜成绩，败给了本次参赛的许多国家。赛场上中国队的老毛病仍然格外突出，不是拚杀不够，就是乱杀一气，不是沉着不足，就是拖泥带水。电视上常常见到，在快没辄的情况下，中国宿将古广明不顾“年事已高”，不管身任副教练之职，连连出马，企图以此能为这些小伙子挽回败局。但多数情况于事无补，十来个人总是撕不破他方之网。素有哲学修养之美称的施拉普纳，也按捺不住自己的屁股，常常站起来跑到场线边上大声吼叫，调度着这群未必全能理解他之指令或理解了指令却跑不出阵势的异国青年。最后，中国队输给了日本，输给了朝鲜……以输多胜少排定了座次。

一时间，施拉普纳又成了热门话题：他灵不灵？有人大失所望；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怒斥老施；有人则抱打不平……报端上又见到了各种热烈的讨论，也见到了对施拉普纳的采访答问。这其中施拉普纳有两句话让我刻骨铭心：一是“要是为了赢，我只要恢复一下你们原来的传统打法，完全有可能”，二是“通过这次比赛更暴露了这支队伍更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我所未曾意识到的”。

我也特别留意一家大报上的一则头版评论。这则评论这样说：“要是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文化素质能有高中水平，可能也不至于如此难以领会施拉普纳的意图”。

看来评论者是把洋人看得比中国踢球者要高出不少。我的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朋友则这样说：“同样是请了洋教练，日本队这次成绩可是三天不见当刮目相看，荷兰人能比德国

人高明多少?!”

牢骚很多，说法不少，原因更深。

我不打算讨论这些问题。我只希望大家认真考虑一下我的观点。足球是种子，民族则是土壤。没有良好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再好的种子也不能枝叶繁茂。尤其洋种在我们这片传统力量十分强大的“土”地上，就更是如此。

施拉普纳无疑是一个有声望有成就世人皆知的德国著名教练，但他的成就没有一点是在欧洲文化圈外取得的。他相对于中国来说，只是一株基因素质很好的洋种。这株洋种能否在中国真正长成，有一多半的问题不可能由这位施先生来说明，而是取决于土壤的情况。足球是无情的。足球就是这么一个怪胎。

如果想要进步，只能是土壤为种子妥协，进行自我改造，而不可能是相反的种子变异。变异的结果就是怪胎，就是中国式的等外足球。

至于中国的足球土壤应有哪些改良，我已在《论中国足球》一文中做了分析与交代。此不累赘。因在写那篇长文时，中国尚不曾引入这位施拉普纳，当时无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借今天机会草草记上几笔，以阐述某种无情的逻辑。

呜呼！

1992年10月23日晨3时

牧羊人与羊

——重提施拉普纳问题

一

中国的足球很有点意思，恨不得，恼不得，也急不得。于是也就奈何不得。球迷对之越恨越急，它就越发不听使唤，常给你搞出点什么“悖论”或“黑色幽默”，令人哭笑不得，最后是不知所措。

照理来说，中国足球低到这等水平，回回出不了线，本该无人问津，无人观赏，只等待在人心冷漠中消失和死亡。可中国百姓就是奇怪，不甘寂寞，人均月收入不足**100**美金，个个足球热情却不亚欧美，竟闹得这等档次的足球云里雾里，无以适从。仅仅一个出线权，就害得几亿百姓几度“失恋”，潮起潮落，欲罢不能，欲看不行。

杀了十余年，越杀越希奇，越杀越是原地转。死活就是出不了线。如此这般，无奈中只好投石问路，移师他方，引来了德国的施拉普纳。如此之举，球迷们当然欢欣乐观。施氏来华，每年耗费**30**多万美金的工资，不用说，就是让他带着中国队能冲杀到世界足球舞台上。

可事与愿违，天不助我。整一年后，洋教练竟不如土教

练，连第一阶段出线权都拿不到，反倒遇上了灭顶之灾。这能不让那些月收入不足**100**美金的中国球迷傻眼、裂肝、炸肺？能不讨伐这个花钱不少成效不大的高价洋人？能不高喊让他滚回他的德国老家去？能不让人怀疑他是否像那走私来的“水货”？能不令人怀疑他是否到中国干起了“走嚎”生意，骗几个钱就算拉倒？

太高的足球热望和巨大的足球失望，逼得我们只好痛定思痛，以致最好是“痛改前非”。

二

然而，难道一个教练对于足球运动竟有如此绝对重要？

他就那样值得大家如此肝火大旺，口诛笔伐？

我以为，教练对于足球固然非常重要，但再重要也重要不到输了赢了非要算到他头上而不可的地步。

足球是天下第一复杂运动，任何教练在其中只不过一个“牧羊人”的角色。他的指挥是否到位，是他的事，而羊群跟不跟他走则是另一回事。教练只能给运动员提供某种足球的理论、范式或观念，顶多能提供一种战术战略，不可能将场上的一切都由他控制。任何一个教练都没有本事将场上的一切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就像一场战争，再聪明的军事指挥家，如果没有基本的“实力”，没有飞机大炮给他撑腰，无论他如何高明，则难以实现基本的企图。

一个教练再利害，他不可能直接左右一个国家足球的基本惯性。更何况一个刚刚来华执教的洋教练，不可能指挥得动中国这群很难伺候的小伙子。教练即使有天大本事，他也无法预料足球场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可能。

足球犹如股市投机，一半靠实力，一半则靠运气。教练就好比股市专家，理论上可以口若悬河，头头是道，但让他实际操作，则未必能比过那些瞎操作的老头老太太。如此这般，施拉普纳又能怎样？

三

我以为，教练是足球运动的必要条件，但还够不上既充分又必要的那种“必然”条件。如果足球不靠运动员，只靠教练员，那场上的斗智斗勇，干吗还要你这十来个运动员你争我抢？意大利那不勒斯当年又何必花如此重金去请马拉多纳？教练决定不了足球。否则就成了教练比赛。如果是这样，那不等于变成了电脑游戏？又能有哪个观众痴迷足球！

足球的魅力就在于足球中的运气。在于它的不可预测和想象不到。只不过，中国足球的一大毛病就是小河沟翻船。这种不可预测简直就是不可思议。银子花老了，就换来这么一个结果？要知如今，决不当初。中国的球迷就是接受不了这种痛心的“魅力”。尤如教徒般圣洁的球迷，忍受不了的就是上帝的俗气。上帝不该向信徒撒了如此大谎。

我以为，施拉普纳与以往中国几任（代）教练，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同是功臣，而非罪魁，更不是祸首。最起码他本人决不想让中国人输个干净，自己拿走银子而大快。否则他用不着明知出线无望，却还认真指挥，应付本土的几场无关痛痒的比赛。当然施拉普纳也十分无能。他的无能，就在于他是凡胎俗子而非天兵天将。他不可能操纵中国足球的一切。而这一切的一切则要求我们必须冷静，多加思考，改革体制，修炼技术等等。实力是解决问题的最后法码。舍此一

途，别无他径。

中国球迷最最不应忘记的就是中国的古训："师傅引进门，修行在个人"。

谁是"师傅"，谁又是"学生"，足球界和球迷们当思。

1993 年 **10** 月

足球无明星

——中国足球的文化学障碍

一、老问题，新实在

足球的魅力，用不着在这里多费笔墨。但如何通过提高足球的技术水平以充分显示足球的魅力，则无论如何也是一篇巨大的文章，非需大动笔墨不可。

足球技术的水平提高，其途径、方法、策略可谓牛毛之多。比如身体素质之严格训练；技、战术水平的高标准要求；临门一脚之高超绝伦；足球体制之健全合理等等，真是不胜枚举。我于这些具体而有效的方针方法算是真正的外行，何况有那么多的足球专家和理论大师在侧，敝人在此怎敢做只字造次，贻笑大方？

虽不是足球专家，但却也留意过足球的某种东西，在此不妨说将出来。如能引得大家哂笑，也算不费我的一点“妄想”。

制约足球运动水平提高的因素，无疑需用统计学上的大型“矩阵分析”才能略见一二。但不管这些因素如何复杂怎般多样，却离不了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即足球运动需要明星，而且明星越多，知名度越高，技艺越是超人不凡，足球

才越是具有魅力。

中国足球的水平所以太低，其他原因一概不谈，与其严重缺乏叫响的明星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足球中不曾出现过一个真正的世界级的大明星。没有明星的足球就犹如没有领袖的乌合之众，犹如没有月亮的漆黑夜晚。这是中国足球所以落后的一种“形态学”特征。正是这样，“明星”问题才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倒是顽症的真正病因。

在这个问题上，我当然同意这样的说法：中国所以不出现世界级的足球明星，是由于中国的足球训练从来没有达到过世界级的水平。这固然是真理。但在我看来，这只是真理的一部分，或者顶多是真理的一大部分。除此之外，还应有真理的另一方面或者说真理的另一部分。这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就是没有明星意识，没有争当明星的英雄主义气概。没有产生明星的文化土壤，足球运动断乎不能从“你推我让”和“一团和气”中达到世界级的训练水平。“世界级的训练水平”，是而且只能是靠自己来创造，而不能等待别人的拱手相送。我倒认为，中国足球明星之所以严重匮乏，第一位的因素是由于明星意识的不够、英雄主义的不足。是这种严重的“不足”直接制约了训练水平的世界性，进而又严重抑制了明星在中国大地上的悄然升起。

想到这里，才不怕别人笑话，才敢大着蚊胆写下这篇专说中国足球与英雄主义的小文。

二、足球不弃“英雄”

足球中的“英雄主义”，其实就是足球中的“明星主义”。世界上真正成功的足球国家，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英雄，没有

离开过明星。似乎这已经成了铁的规律：没有明星的足球，就永远是不合格的足球。

足球一直是欧洲和南美的长项。这绝非偶然。足球只能诞生在惯以英雄主义、个性主义见长的文化氛围之中。欧洲从古（如古希腊）到今（如当代欧洲），个性主义和英雄主义就一直是民族的主要性格特征和行为色彩，即使在神学压顶的中世纪时期也是如此。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都曾赞誉过这种英雄主义或个性主义。欧洲是英雄主义和个性主义的大温床，南美则是这种西方文化的种植园。欧洲与南美之间，无论差别有多大，但在文化的本质上却是典型的同宗同祖。正是在欧洲，出现过许多探险家和冒险家，如麦哲伦、哥伦布、亚美利哥、塔斯曼。他们是海盗，他们是英雄，他们是明星。他们的冒险、探险无一不在美洲的大地上放出异彩。正是这些“强盗”、“海匪”式的英雄或明星，把欧洲的文化搬到了美洲大陆，使两个洲在心理上、气质上连为了一体。一个产生英雄和明星的文化氛围，也一样产生着只有英雄和明星才能将之推向迷狂的足球运动，也一样产生着足球运动中的各种英雄和明星。足球产生于英国，产生于工商业极度发达的欧洲，发达于崇尚英雄的欧洲，盛行于与欧洲文化心理相一致的南美。真正的足球明星无不诞生于欧洲或南美。有了足球才有了足球明星，有了足球明星才有了真正的足球运动。足球从来就没有舍弃过英雄和明星。远的不说，仅就现代而言，明星之多真可谓漫天繁星。单就最著名的明星来说，也让你联想到天上最耀眼的北斗七星。巴西有贝利；阿根廷有马拉多纳；德国有鲁梅尼格、贝肯鲍尔；荷兰有柯鲁伊夫、古利特、范·巴斯滕；法国有普拉蒂尼、地加纳；英国有吉冈、拉

什；意大利有佐夫；西班牙有岗萨雷斯……当今足球运动的魅力几乎为这些英雄、明星所左右。足球就是足球先生们玄耀自我天才的运动。天才们技高一筹，统帅着全军，他们决定着每场比赛的方略、大计和水平。人们崇敬这些足球先生，人们敬仰这些绿茵场上的英雄和明星，仿佛人们只有从这足球大师的身上才能体味到某种难以言状的神秘意味。体育崇拜就是对体育明星的崇拜。足球的迷狂就是来自于人们对明星们的五体投地、无限敬仰和无限崇拜。明星是球迷心中的太阳，是他们的教皇，是他们的上帝，是他们一天不见就想得发疯的情人，是他们爱的寄托，是他们人生信念中的“乌托邦”。明星也一样离不开球迷。他们只有在崇拜者们的热情鼓噪下，才能找到自己的感觉。找着感觉的明星才会使出浑身的解数，力图制造一个又一个的轰动效应或“奇利斯玛”(Chrismas，即巨大的个人魅力）效应。

三、球技巨人，道德侏儒

应该指出的是，欧美的足球明星，与古代希腊神话时期的英雄，无论在个性、气质、技艺、修养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就是，英雄们力大无穷，才高八斗，但常常又都是些道德上的失败者。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可以战天斗地，可以为人间盗来象征光明的火种，但却一个个难能过得“美人”关，每逢女色便发醋意，不惜折身，予以争夺；近代欧美足球运动中的英雄和明星们，也一样与之相同，一个个可以在足球场上尽显潇洒，可以在足球世界里纵横左右，但又在私生活上极不检点，不是与女色难断瓜葛，便是与毒品不绝如缕。欧美的英雄形象，与东方大国中的英雄形象大

异其趣。东方的英雄自古就是真正的“道德至上”，是行为的楷模，伦理的榜样。

然而，尽管欧洲足球明星们有着这样那样的道德上的缺陷，但整个足球运动水平的提高和足球魅力的大增又完全依靠这些道德上“跛足的”明星英雄。也许他们是足球上的巨人，道德上的废人。但他们的残废还不致于将足球彻底毁灭。或许正当某个明星由于声败命裂而快要将足球推向灭亡的边缘，另一个新的明星便会立马产生以补上这个技术与道德上的空位，从而维护着当代人类第一运动的健康机体。

不管道德上的缺陷多么令人深感遗憾，但明星们无可争议的精湛技术却一直是支撑足球大厦的根本梁柱。没有足球明星便不会有足球的魅力。这大概是无庸争执的道理和事实。

既然如此，中国的足球，如想跻入世界的殿堂，并魅力无边，光彩照人，那就需要创造自己的足球明星和足球英雄。可以肯定，舍此一途别无他径。

四、中国无明星

中国足球的最大问题，现在看来当然就是没有真正的明星。这是事实。

然而，如果人们硬要从无明星的历史中挖掘出某些明星，那也倒是不成问题。在我看来，中国史上真正称得上明星的人物，大概只有两位。一位是宋代的足球大师高俅，一位是今人皆知的广东宿将容志行。

高俅是中国古代的足球高手，他的高超技艺不在于如何地能攻善守，而在于他的“耍弄”足球，耍技之高难以比拟，竟能博得皇家贵人的欢喜，最终使自己爬上了仕途高位。他

的“耍弄足球”实与今天撕杀式的足球不相干系。如此看来，真正与我们要说的足球有关的明星大概只能是容志行了。

容志行之前，中国也曾出现过几个中国式的“明星”和“技术精湛”者，但他们再“明”也明不过后来的容志行，技术再“精”也精不过任何一位世界大师。

容志行的确令人称道。他技术好、战术好，一直是广东队的队长，中国队的队长，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国内比赛中，只要有容志行在，几乎总会有他的出色表演或进球得分或组织成功；即使是对外比赛，容志行也一直是一名——很有威力的中国式的人物，连贝利都曾夸耀过他的水平。在中国足球史上，他的运动寿命又是那样格外的长，第四届全运会和**80**年代初的争夺世界杯出线权时，三十多岁仍在场上搏杀拚抢，实在是国人运动员中的少之又少，难能可贵。

然而，构成容志行知名度的，似乎并不全在这里。容志行毕竟是一个中国级的足球先生，他的球技毕竟也没达到过真正的世界级的水准，顶多在亚洲尚有某种影响。成就容志行的关键，在我看来，是他的道德精神和高尚风格。如果离开了这种道德性的内容，光以技术而论，容志行也许就不再是容志行，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普通不过的容志行，顶多是与古广明、左树声等人齐名的容志行。

容志行毕竟是中国人。他有中国人的基本特性。他离不开中国文化的背景。中国是一个道德立国的东方大国。容志行的知名度，更主要地是得益于他那中国式的道德修养。中国当代足球史上真正能做到“宁失一球，不伤一人”者，大概只有容志行一人。容志行是我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著名球星。这个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还非常有限，中国

的传统文化依然保留着它的高度纯洁性。中国文化对每一个中国人的影响当然具有绝对的权威。容志行也不例外。中国的价值系统一直是影响人生的最重要尺度，其中道德因素又充当着第一尺度。容志行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传统伦理尺度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明星。他不是那种只会技术而不懂道德的人，也不是只有道德而无技术的人，相反，他是当时真正的“又红又专”者。他能在“高龄”阶段，率先垂范，刻苦练习，勇敢拚抢，屡建奇功；又能严以律己，不伤一人，遵守规则，口无恶语。如此这般，实在是中国足球的骄傲，也实在是中国百姓们立身处世的道德榜样。只要大家翻阅一下当时的各种体育报章，容志行的响名就一定如同雷声贯耳，“志行风格”、“志行精神”总会不绝耳目。

显然，容志行这位中国明星与国外的明星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地方。如前所述，世界级的明星只以球技成名，而与道德几乎毫无关系，甚至在道德上都是不同程度的败坏主义者。显而易见，容志行的成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中国道德立身的再度光大。照今天的时髦话语来说，这样的明星成长起来的确是“累”了一些。

然而，可悲的是，容志行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位这样的足球明星。这样的明星虽然“累”了一些，但毕竟是为多数中国人所接受、所认同的精神偶像。今天的“踢”球者，既没有容志行当时的技术领先，又没有容志行那样惊天动地的道德精神。

由于没有真正的明星，中国的足球步履自然不会轻便。

中国无明星。悲哉！

五、明星岂是独行侠

说完了中国足球无明星的状况，理应说说足球本身的特性。否则，便很难知道中国足球无明星的缘由。

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是集体类的大型运动，严格区别于个人性的“天才”运动（如田径、游泳等）。在我的分类中，我将之称为“复杂运动”。明星从足球中出现，的确非常不易。虽然中国的足球中不曾出现过真正的世界级的大明星，但如果有谁因此而下结论说，中国人在一切体育运动方面都没有产生明星的天才，那就是完全的胡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智慧和天才。中国人在个人性的项目中人才辈出，明星高照。这类个人性的项目有乒乓球、羽毛球、体操、游泳甚或今人无人不知的在田径方面有出色表现的马家军。个人性项目就是一种天才性的项目，每个运动员成绩的简单相加之和就等于一个团体的成功。以上个人性项目无一不是如此。足球之难，难在任何一个球技再高的人，都无法单刀赴会，力斩群“凶”。贝利再能，马拉多纳再有本事，单凭一人之技也赢不了水平很低的中国足球队。由此可见，足球明星一定是相对而言，绝不是金庸小说中的独行侠，匡时救世，神力无边。对于足球而言，明星就像明月需要“众星相捧”，就像金凤需要“百鸟相朝”。

就是说，足球明星只能出现在个个都不示弱的战斗集体里。明星之所以成为明星，那是因为他比别的好汉更有英雄气概，关键时刻更能显露个人的魅力。如果一个足球队，11个人中，10个是草包，一个是明星，那么，这位球星注定会有两条命运：一条是活活累死，一条是第二天也沦为草包。中

国队所以不出明星，关键问题在于11个人的战斗集体里，人人都水平太低。太低的集体水平中，注定不会产生世界级的伟大明星。明星需要众星相映。

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所以长期落后，除了训练学的原因外，还有文化学的原因。这种文化学的原因就是中国严重缺乏有助于明星产生的个性主义和英雄主义。

中国的英雄向来都是独行侠。而在一个人人都是英雄的集体里，"英雄们"便自暴自弃，对自己的英雄现象进行自我毁坏，不是有门户之见，就是互不服气，相互掣肘，从而使每个英雄的实际水平都降到了这个英雄集团的平均水平之下。如此这般，真可谓"三个和尚没水喝"，真可谓是出现了"系统"中的"紊乱增加"或"熵值加大"。中国人在好些集团或集体的活动中都出现有这种情况。比如抵御外侵时个人和小集团之间经常会发生"各顾各没罗嗦"的"不合作主义"；又比如在面临车匪路霸时，则经常出现一种"事不关我，少管闲事"的"旁观主义"，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缺乏真正的集体主义，也很少有同仇敌忾、临敌团结的合作精神。正是这样，才有了陈天华在日本的悲愤而死；才有了孙中山将中华民族特有的集体主义称之为"一盘散沙"；也才有了马克思把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叫作是"麻袋里的马铃薯"。

正是这样，中国的集体活动中才经常出现各种"负"效应。中国的集体类的体育项目中才格外地难以涌现出自己的明星或英雄。这其中除了某种人种学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怕仍然是传统历史中的小农意识，和在这个基础上生长出来的集体不合作主义。生活的现实中，我们中国人大概都有过一

种切身的体会，即集体里的每个人常常都会"试给对方找麻烦"；而集体类的体育活动中又有谁敢保证，就没有这种恶习的死灰复燃？中国人特有的嫉贤妒能，在体育的集体配合中也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表现。这可能仍然是中国足球难以产生自己的世界级大明星的民族心态背景。我认为，在中国，什么时候真正做到了"赛时是对手，练时是朋友"，什么时候不再重犯古人常犯的"妒嫉天才"这种坏毛病，什么时候便真正具备了创造足球明星的良好土壤。

足球队不是**11**个独行侠的简单相加，更不是独行侠之间相互报以嫉妒、成见的那种极坏的"系统"运作。

六、自古领袖不英雄

除了以上"系统"方面的原因外，还有另一种传统文化的力量，制约着我国集体项目中的"英雄"与"明星"的诞生。

先不说体育。在中国的军事、政治甚或某些文化娱乐方面的集团运作中，首领很少是真正的英雄。近代历史学家钱穆早就看到了这一奇怪现象。他在《从象棋看中国人的精神》一文中就说过：西方历史似乎就是一种"英雄性"的历史，从希腊的亚里山大到罗马的恺撒再到法国的拿破仑，到处是英雄主宰世界，英雄扭转乾坤；而中国的历史则很少具备这种特色，刘邦、刘秀、刘备、宋太祖、明太祖都不是真正的英雄，都是纤纤君子，都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道德楷模。秦始皇、曹操、唐太宗虽尚有某些英雄气概，但就其全部的领导过程来说却又不以英雄性见长；相反，由于些许英雄气质，他们在民众的心目中一直没有树立起太高大

的历史形象（秦、曹二位更是如此，极讨人嫌）。钱穆这样分析中国的集体和集体中的领袖人物："集体必有一领导，但领导性的重要，次于集团性。所以每一个集团中的领导人，不易见其英雄性。而英雄性的表现，常在领导人之下。在中国人的观念里，英雄不易为领导人，亦不易成大事业，如项羽即是一例"。中国的文艺中更是反映了这种观念。如《水浒》中的宋江是首领，但什么武功也没有，几乎是一个废人，顶多是一个道德上的化身，而真正的英雄则是鲁智深、李逵和林冲之类；《西游记》中的唐僧也是一个废人，什么也不会，但却是大家的领袖，而真正的英雄则是孙悟空甚至猪八戒；即使最讲攻防的中国象棋，那将、帅二位也是废物一对，几乎没有任何杀伤力量，只能在那个方格子里悠哉游哉踱踱方步，四周还有卫士保卫，可这样的无能之辈却是众多浴血奋战者们（如车、马、炮甚至过河的小卒等）的首领。

由此可见，在中国，是英雄便绝难当上领袖，当上领袖者又几乎不可能成为英雄，领袖的意义仅仅在于如何协调各弟兄或众将士之间的关系，并充当这些英雄们的道义所在。"心治天下"，以文降武，这才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格调。中国文化过分地夸大了英雄们的心智不开和鲁蛮愚蠢，极度地夸张了领袖者的道德价值和文弱意义。

回到足球，言归正传。这种历史积淀无疑严重影响着中国人在体育方面的行为状况。既然影响了象棋的格局，那它就必然影响到足球的格局，自然也就影响到足球运动员的行为表现。在中国，足球队的队长，未必一定是球技高人英雄，倒经常是"德高望重"、"严守纪律"、"服从教练"、"团结同志"、"要求进步"、"爱做好事"的道德人选，真正的足球英

雄倒可能去充当责任单纯的前锋、前卫、中锋或后卫之类。队长和英雄经常是互相抑制对方成为“明星”的排斥力量（当然不排除相互间也有某种共同促进）。在中国，人们分不清，队长和英雄，何者作用更大，何者威力更强。竞技运动是西方的文化产物，中国人开展这种运动，首要条件就是应该从本质上将之吃透。足球对于中国人更是如此。

这种“领袖非英雄”的象棋格局，与西方体育文化完全不同。西方的国际象棋，将、帅不是方格中的“困兽”，而是拿破仑式的所向披靡，是恺撒式的战斗英雄。西方的足球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谁有本事谁称王，在他们身上我们绝难见到领袖不是英雄，队长不是明星的“中国意味”。有马拉多纳在，阿根廷队的核心就非他莫属，有古利特在，荷兰队的领袖人物就不会另有人选。尽管西方的足球明星们在道德上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其角色绝不会因此而易位他人。这大概是中西足球的又一种内在的性质差别。

中国足球要进步，就必须培养出合格的世界级的大明星。在这种明星的创造过程中，除了日甚一日的严格训练之外，是否还可以留意一下中西两地明星产生的不同土壤，警惕一下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道德排斥英雄的可怕力量？如能做到这一点，也算不冤本文的一种良苦用心。愿中国的足球明星成长时再少一些看不着的障碍。噫嘻！

1993年11月

足球、节庆、酒神

——在杭州大学的一次印象

第十五届世界杯足球大赛于6月18日开始了。举办国不在亚洲，不在欧洲，也不在南美，而是在足球水平非常不高的美国。十五届杯赛，如同以往各届一样，与中国并无太大的干系——中国既不是举办国，又不是参加国。

然而，即使如此，中国人依旧如同过节一般在迎接着它的到来。那浓浓醉意，那郁郁节庆，那勃勃生机，足足感染了我，深深打动了我。于是，我就记下了热爱生命的年轻人的心绪。

我离开学校已有十年。年轻一代的心潮似乎无从把握，更难相知他们今天的心态。然而，就在第十五届世界足球赛即将开始前的十余个小时，我有幸触电般读到了当今年轻人的心迹。由于感想很多，我遂将这种感想草成了此文。

6月初，我到福州、厦门开会，6月16日返，换车来到杭州。17日小雨，我出游八年未见的西湖，18日继续小雨，晚上却要到杭州大学体育系参加一个简单的学术座谈会。晚饭后，正在赴会的途中，顿觉一种雨天不可能有的“活力”向我袭来。年轻的脚步如此匆匆，喜悦的脸蛋有如阳光，这里好像没有乌云，似乎没有霪雨。男学生的手，不是拿着饮用

水，就是抱着电视机，不是持着小脸盆，就是扛着大拖把……女学生的手不是搂着维系生命的面包，就是揣着可共呐喊的饮料……我不明白这种神色特异，我不知晓此种行为“非常”，于是便向老友问起了“非常”的缘由。老友则说：“学生们今晚不睡觉，要看足球开幕式”。此一说倒使我明白了“非常”的缘由。老友又说：“为了看这个足球比赛，学生们早就准备上了。宿舍间集资买了电视，你看心劲大不大？那大拖把就是准备高兴时燃烧用的火把”。

饮西湖水长大的浙江青年，向以文静甚至文弱著称，面对足球竟有如此热情，我不知那些精力充沛、烈如干柴的华北青年、东北青年又该以何种方式来欢度这个“节庆”。我猜想他们更会有新的“添油加醋”的举措吧。

体育没有国界，足球不分地域。哪里有足球那里就有狂欢。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里举行大典式的足球大赛，全世界就会有亿万颗心为之激动、为之焚烧。足球是世界第一运动。足球大赛和奥运会一样，是人类目前最大的狂欢节与节庆。西方的体育狂早有领略，似乎天经地仪、顺理成章。而中国人面对小小足球也尽显醉态、狂样，在我看来，倒十足是一篇颇有学问的大文章。中国是文明古国，是礼仪之邦。中国向来推崇理性反感狂妄，主张喜笑有度、举止有节，提倡宾宾有礼、勿作冒然，讲究“发乎于情，止乎于理”……总而言之，中国人倡导“通情达理”，厌恶“怪力乱神”。正因为如此，封建时期的年轻人便每每失去了活力，每每未老先衰，每每少小书生若夫子老相，每每体质羸弱、健康不佳，每每无力缚鸡、弱不经风……

今天的青年，面对体育尤其足球，总是那样的汪洋恣肆、

豪放无羁，大概完全背叛了孔夫子的初衷，也完全违背了理学家的苦口婆心。这可能就是“打倒孔家店”以来“五·四”新文化的某种胜利，这大概也是新中国提倡体育运动、注重学生体育的必然收获。……

年轻的一代，当拥有自己的足球世界，当拥抱自己的迷狂节庆，可以忘却明天的考试，可以不顾课堂的学习，只是沉浸于尺牍大小的电视机屏幕上的你争我夺。此种豪情，真可谓“朝闻道夕死可矣”，真可谓“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精神可能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高举火炬”，就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就是罗素所说的“生命的活力”吧。任何一个不愿意憋死在“文明”大厦里的人，足球就意味着他们人生的“兴奋剂”。足球是粗野的肢体运动，正因为是粗野，它才有真正的意义。今天的问题恰恰在于文明的重负极大地压抑了肢体的力度和心灵的野性。有足球在，就会重新唤醒干瘪的肉体，就会打通阻隔肢体健康的墙壁。足球如果也有某种哲学的话，我想它的魅力和答案就在这里。

也许，这种足球的“酒神”、“活力”总是有着“狂妄”、“放荡”和“不可理喻”等等这样那样的不足和毛病，但它毕竟充当着民族的某种力量的“尺度”。当一个民族尤其是广大青年，面对精彩绝伦的足球射门，面对美不胜收的组织配合，竟然无动于衷，或面如死色，或萎靡不振，没有丝毫的喜庆精神，这个民族大概是到了风烛残年，近乎于人心死灭。

正因为如此，我以为，年轻人面对足球所表现出的热烈和豪迈才是真正的活泼和健康。足球背后毕竟有着更深刻的意蕴。

1994年6月

我看马拉多纳到牛津

——答《粤港信息日报》记者邓成

一

广州东站旁的大排档。

时虽初冬，却春意融融。

你问我如何看待马拉多纳到牛津大学发表演说一事。我因你的问话而突然语塞。本来醉意刚有，谈兴正浓，却被这突如其来的一问没了话题，尽管我后来回答了你的问题，而且令你那样“满意”。但那“刹那的语塞”，我却无法忘记。因为我并不知道马拉多纳到过牛津，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可能至今还不知道。而这位体育天才奔赴牛津，虽说只是天下事中的一件普通事，然而在你我的心中，却有着意味非常的另一种价值。

一个运动员到一所大学里发表演说，并没有什么奇特。而马拉多纳到牛津，却引起大家如此兴趣，我以为其中除了现时“明星”的某种效应外，还有另一种含义。也许正是这种含义不为人们所多加注意，所以又才有着讨论的意义。

马拉多纳是当今世界上少有的足球天才。他的天才足以使他的“看客”忘乎所以，投入到非理性的世界，用热情、用

狂欢、用热泪、用愤怒、用悲哀、用失望，去寻找自己的一种人性的感受。

马拉多纳与贝利是当代最伟大的足球天才。然而，在马拉多纳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却是他更多的“调皮”。他的调皮足以使这个世界的理性失去意义。他时而吸毒、贩毒，时而服用兴奋剂，时而用气枪射击采访而来的记者……总之，他年轻的生命中有着说不清的风流和韵事。与之相比，贝利仿佛倒像个听话的孩子，不像马拉多纳这样令人难以捉摸。贝利是个不干坏事的天才。然而，即使这样，热爱足球的人们，还是给了马拉多纳这位调皮的孩子以极大的的同情和理解，人们对他的热爱，丝毫不亚于贝利。今天的话题，就从对马拉多纳的爱出发。

二

我爱马拉多纳。尽管当今还有众多的明星，但相对于他，都只不过是在“众星捧月”。当今世界，如果没有这位马拉多纳，仿佛真是“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最起码足球世界，少了许多意味。我生活在这个拥有马拉多纳的体育世界中，当然有一种无法言语描述的满足。犹如美酒、咖啡和醍醐。

我经常陶醉于这种满足，然而又不敢一直陶醉于这种满足。因为有一种理性在提醒我，不敢在狂欢中陶醉。理性告诉我，哲学告诉我，马拉多纳的天才代表着当今人类的另一种生命情结。

当他今天站在牛津大学的讲台上，这种哲学的意识立即涌现在我的眼前。

牛津是一所以理性为代表的世界著名大学，那里诞生了

许许多多的理性俊才。英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想当英国的首相，就得到牛津或剑桥这两所大学中的任何一所，去学习数学。否则，你再有天才，也不会让你从政。即使从政，绝不让你去当什么首相。

足球是人类体育的最重要代表。足球的世界里也为人类诞生了无数的体育明星，她不知多少次唤起了人类的激情和兴奋，不知多少次地使人们从无聊中获得了趣味，不知多少次地让那些平时绝不敢胡乱高喊口号的人们，在球场上发泄着自己的爱情与憎恨……足球是体育的精华，是人类非理性世界中的最大绿洲。有绿洲在，就有生命在。足球生命力如此之大，缘于这片绿洲迷人。

三

然而，尽管是这样，马拉多纳这样一位极出名的球星，却从没有到过什么大学去做什么动人的讲演，就像从没有什么哲学家到体育的场所中发表令人激动的幽思与讲演一样。我甚至不清楚这位超级明星在哪所大学读过什么科目。马拉多纳是个不爱读书的坏孩子，他不像贝利经常搞些风雅事宜。他对文化没有丝毫的爱好，他对文字没有任何兴趣。他就对足球有着兴趣。其余就是女人和毒瘾。这一现象，很有意思，理性压迫着人们，人们呼唤着非理性。可是理性却很少从非理性的体育中获得什么重要的启示，让足球发表自己拯救人类的意愿和呼声；体育也没有到哲学的殿堂里振臂高呼，让哲学不要忘记体育的价值。

马拉多纳出现在牛津大学的门口和讲台，终于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开端。

我以为他的出现，并不只是简单的明星出现，而是一种世界在另一种世界中的出现，他从非理性生命世界走到了理性的智慧王国。这既是一个人与人的交往，又是一个世界与世界的交融。当代的哲学话题就是理性如何与非理性更好的结合，既不要使众多的人们在理性的大厦下压死，也不要使非理性的人们没有丝毫的法度。

无情的历史使人类终于走向了理性并压倒非理性的时代。人们的大脑极大发达，人们的肉体却极大地发生着萎缩。丰满的人生，在理性的重压之下，开始变得干瘪无力。而且，今天的苦恼大多由此而生。本世纪的哲学主题，就是如何寻找自己回家的门径。于是，存在主义才有了强大的生命。马拉多纳来到了牛津，就是把活着的哲学带到了孤寂的殿堂，把充满生机的生命带到了一大堆身带近视眼镜的科学王国。让近视眼好好看看那双天才的腿和脚。

四

马拉多纳的头脑中，没有丝毫的哲学素质，但他的肉体里，却处处都是哲学的意味。他是体育的象征，他也是生命的象征，他更是人类生命存在的直接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就是“存在主义”的根基。在这个到处充满理性的世界里，人们早已感到压抑和痛苦。人们呼唤生机，呼唤热情，更呼唤激情和冲动。马拉多纳所以还能受到牛津人的欢迎，就是因为苦恼的人需要甜蜜的笑。于是马拉多纳到了牛津便自然成了重要的话题，也就成了你们“报纸人”的“消息”，也成了你我谈论的话题 。

可惜，庸俗的英国佬们，面对马拉多纳的出现，却没有

任何一个人意识这是“哲学”的交往。相反，彬彬有礼的学者们却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询问墨西哥足球赛上，是否真有“上帝”之手。英国的学者们，忘不了自己与马拉多纳的祖国是“敌人”，于是在梅杰与梅内姆握手言和的情况下，还在重温昨日的“战斗”。绅士般的牛津学者们，面对马拉多纳，早已忘记自己还有“哲学”的超脱使命，只是顾及自己和民族的切身“利益”。这本身就是对学者们的无情讽刺；科学家们、哲学家们以及未来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面对哲学竟然毫无哲学。

……

你问我对马拉多纳的看法，我真的是激动了良久。尽管我语塞我激动的时间短到了你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我语塞是我不能马上回答这个巨大的问题。我激动是我感知到了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问题。“酒壮英雄胆”，我借着你为我送行的蛇酒，兴奋地讲出了这个意思。否则，马拉多纳干吗要得那个名誉博士的头衔？我相信，马拉多纳的身上，有着另一种意趣。于是，我就写了这篇另一种含义的文章。

阿门！

1995年12月

谤"球迷"

——专说吾国球迷之病症

一般来说，球迷是神圣的，只能歌颂，不能诋毁。因为球迷，就是足球的"上帝"，没有这些"上帝"的光临和捧场，就不会有足球的发展。

因此，球迷一直说不得。一说仿佛就是说着了足球，说着了足球的"上帝"，说着了足球的纳税人，说着了爱球如命者的脊梁骨。我们很少见到有文章批评球迷，有道是无限的歌颂和大而无当的赞扬。

球迷有优点。然而，除其优点，就是缺点。

球迷的优点就是热情，就是"爱球没商量"，就是你踢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就唱到哪儿，就嚎到哪儿，就骂到哪儿，至于老婆孩子干什么，至于工作岗位需要做什么，至于自己明天的收入是什么，至于我的"情人"(对球迷狂爱球星的一种情绪描绘) 输赢到底能干什么，从来不在话下，不做思考。

球迷的缺点，似乎比其优点，一点也不逊色，那就是迷狂，不冷静，不动脑子，热情高于理智，受暗示，赶时髦，时常还干一些失去控制或扔石头或砸玻璃或掀汽车之类的傻

事。

今天的文章，就从这里开始。别人不说球迷的缺点，我来说。我来一次“逆潮流”而动，说一说球迷的坏脾气，也许更会有助于中国足球的发展。至于此篇文章发表，会否惹得球迷暴跳如雷，声讨我，攻击我，实在这里顾不上。

我一直是个球迷的支持者。长期以来也一直是球迷现象的研究者和歌颂者。他们的情绪，他们的行为，他们的激情，真像是科技时代的新“宗教”。他们如醉如狂，他们精力充沛，他们契而不舍，他们一爱到底，实在是感动着我。我一直将这种球迷心态，与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相联系，我将其热情激昂、富有朝气理解成对科技理性压迫自然感情的正义反抗。

然而，球迷只是球迷，总不愿从“迷雾”中走出，常常让人失望。他最起码让我失望。球迷的不动脑子，球迷的只有热情而无理性，只有激情而无冷静，只有捧场而无拒绝，只有口口声声的“是”，而无铿锵有力的“不”，使我突然改变了态度，改变了情感，改变了思维，改变了我对球迷们的看法。当然最后也使我有了这样一篇专说球迷的“谤文”。

中国足球，基本上是世界上最差足球之一种。我一直将这种落后状况与社会生产方式相联系。我在很多文章中讲，中国足球是一种“农业足球”或“农民足球”。她的落后，盖与踢球者、教球者、管球者的农民气味太重有关。而我们的球迷却更是农民球迷。我经常无法理解中国农业社会中竟然如此迅速，像雨后蘑菇般冒出了一种叫做“球迷”的现代人口。这些农民的孩子，一夜间变成了现代化的公民，跟着西方的球迷，学着英国的球迷，手舞足蹈。

还真怪，中国范围内的“足球先生”（或曰足球“明星”），竟然就是靠着我们这些可爱的非现代化的球迷捧起来的。而比这更严重的则是，这些“先生”的许多坏毛病也是我们的球迷养惯出来的。因为在球迷心目中，踢球者将球踢成狗屎球，依然可爱。反正我爱你，死活“爱你没商量”。有了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球迷，中国的足球先生几乎失去了良心的批评机制，我踢好有你爱，我踢坏还有你爱，我还怕什么？

我们中国式的“球星”们，之所以毛病如此之多，一个原因就是一直得不到球迷们的严厉制裁，反倒一再得到迷徒们的怂恿。不少球员球踢得如此之差，某些球队与外国队比赛成绩那样之臭，居然一直有人在爱，居然下次比赛还有人捧场。

曾几何时，中国队只要输了球，球迷们就狂骂：“老子再也不看你踢球！”可还没过三天，还是这些“球星”踢球，却仍然还是这些发过誓的球迷又坐到了看台上“看你没商量”。球迷就是这样没心没肺，说话不算，说了“不看”，还要来“看”。

这就是我们中国足球球迷的毛病。这个毛病到现在也改不了，似乎只要存在着一群叫做“球迷”的特别人口，他们的这种毛病就再也改不了。因为球迷的“癌症”就是“没有记性”。

正因为球迷的这个毛病，我们的球星也算是摸住了中国足球的“脾气”：反正你爱我，这次不爱，下次还爱，踢好踢坏总有你爱。于是中国的球星们，也就养出了一种高乎其高的“国内”素质，只要你外国球队敢到中国（且不说为了什么目的），到沈阳，到北京的工人体育场，我中国队就输不了，

而只要我到你国外去踢球，我就再无这种“国外”素质，无论如何是非输不可。中国足球，真可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国外输了球，固然会让自己的“上帝”球迷哭哭鼻子，但过不了几天，只要“家里”的球场上有我踢球，准保你又来。所以有人说，中国的足球就是“窝里横”。其实中国的球迷哪个又不是猫狗脾气，哪有骨头肉腥味，那就有他的踪迹和身影。

世界上的球迷大概都是这种人，都是些“无脑儿”，都有“好了伤疤忘了疼”的病。这个现象，在中国当代最为严重。“国奥队”再次饮恨马岛，以其拙技不能出线，本应该得到球迷的无情“冷场”，再也不看球赛。可倒好，一两月功夫，**1996**年**5**月**16**日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商业足球，又爆满了这些只有热情而无冷静的“看客”。据说，最低票价从**60**元起价，一直卖到几百元，照样是满满当当，座无虚席。

谁说国人无钱花？中国的球迷就最有钱，至于是真有钱还是假有钱，反正舍得往这体育场里花。花钱不要紧，要紧的是过于热情的花钱，就会助长本应得到良心惩罚的球星们再无可能受到教育。相对于踢球者来说，政治辅导员的说教，永远是苍白无力的白开水。踢球者最怕的是足球“市场”。这个市场未必是教练员用不用谁，而是真正的球迷们对这个不信任的球队进行“罢看”。“罢看”大概是最无情的教育，是球迷最拿手的利剑，是对足球的最好管理，是减少球星毛病的最好医术。而我们敬爱的“球迷”们，从来没有充当这种真正的“法官”。正是这样，我们的球星从来不怕自己身边的“政治专家”(即辅导员领队之类)，也不怕自己队里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我该迟到就迟到，我该夜不归宿就敢不来，反

正你离不了我，反正我踢得再臭也是“明星”，反正有满看台观众为我捧场。你不捧有人捧，你不疼有人疼。我进一球常常能得十来万。

这样的球星肯定永远只是中国级的球星，因为中国的球迷没有能力制造出世界第一流的足球市场环境。

体育是西方的产物。球迷也是首先出现在西方的体育现象。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这种坐在看台上发狂的现象。不过那时没有足球，也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球迷，有的只是观看“奥运会”的体育迷。

坐在希腊体育看台上的人，总由三类人构成，一是发狂的类似于今天观看足球的“球迷”；一是到场地里赚钱的商人；一是在场上观看比赛却不说话也不发狂只在那里思考问题的哲学家（大家如有兴趣可看一点罗素谈西方哲学的书，书中记载着这个情况）。希腊的体育所以一直发达，一个原因就是看台上一直坐着爱而不狂的哲学家，从而使体育没有出现迷狂，误入岐途。

我们无法要求中国的球迷都是哲人。但鲁迅说的那种“看而不笑”并充当“民族脊梁”的“看客”，兴许就是古代希腊看台上的那些思考问题的哲学家。我们的球场里，目前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发狂的球迷，一是赚取球迷金钱的商人。有点头脑亦能冷静的人，却因种种原因不在场内，有话只能在报纸上调侃几句。纸上谈兵的冷静，终不能制止迷狂者的发疯。

中国的球迷，什么时侯，能意识到这些问题，什么时侯就算提高了自己素质，就算能从根本上有助于这个民族的足球运动。只在那里大谈特吹明星的绝技，球星的婚外恋，何

种战术，场上的组织情况，教练员是否真正内行，永远是些皮毛看客，永远是些不得要领的观众，永远是些帮了正忙又帮倒忙的“闲人”。

如果中国真有球迷协会的话，我希望那里的头头认认真真研究一下我的看法。我的看法，言词尖酸，肯定难听，但无论如何属于“逆耳忠言”。我也希望球迷们硬着头皮看完我的文章，看完了再向我大发脾气，或骂或毁，那也不迟。我最最希望的是球迷们拿笔写成文字，与我来打笔墨官司。这种官司有胜于无，打多了，球迷的思维大概也就更开了，思路也多了，言语也多了，层次也高了，问题也多了，最最后，中国足球的真正出路也就更宽了。

最后一句难听话：宗教的迷狂总是推动不了理性的进步，就是因为信徒们死活不愿承认自己的上帝是个假物。

不好意思，球迷爷爷，得罪您了！

1996年6月

梦里看球

——中日比赛有感

我不是球迷，但忍不住还是要说说足球。

最近的亚洲杯足球赛，我都没有看。原因简单，我不是球迷，我迷不到夜晚不睡觉去看球赛。

然而，即使这样，有些东西还是逼迫我看起了足球。看来我的民族心，还是高于一切，即使不是球迷，也一样关注着某种“命运”。

中国队出师不利。第一场就输给了乌兹别克，且在优势情况下输掉。痛定思痛，第二场洗了脚耻，于是又有了大赢叙利亚的壮举。

剩下的问题，也很简单：只要与日本人打平，即可顺利出线。

先死后生，背水一战，终于再次有了中国队出线的可能。

而且可能，条件再次的相同：只要“打平”。

近几年来，最少有三四次这种情况，只要“平了”，就可出线。然而，非常令人不解，所有的这种“平了”都没有产生。

1992年在马岛与韩国“决战”，只要“平了”就可以出线，

最终不仅没平，反而输了三个。四年后的今年，又在马岛与韩国决战，又是只要“平了”就可出线。但命运又一次不济，以输告终，未能出线。

有趣的是，每当有这种“平了”的大好时机，宋世雄老兄，总要在电视里为我们脆弱的神经分忧，一再讲：“这场球只要平了，就可出线!”仿佛“平了”如同儿戏，易如反掌。事实上，不说“平了”还真无所谓，一加宣扬，准保没戏。如此这般，似成规律。与韩国比赛，一说是“平了”，肯定是要输到两三个以上。

这次亚洲杯，中国队能否最后出线，又一次遇到了“平了”问题。

我因此而绷紧了神经，因为这又是一次“平了”的难题。此刻，我当了一回真正的球迷。我晚上停了一切，专门伺候电视里的足球。

球在场上飞来飞去，人在场上跑来跑去，虽热闹但不精彩，总是没人进球。仿佛中日都很清楚对方的意图。不久我就泛困，我又蜕化到了不是球迷的地步，迷迷糊糊地看着场上的运动。看着看着，仿佛在看一种梦境足球。

老是不进球。看来双方都是为“平了”而努力，欲来个“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我因没有刺激，更是招架不住困意，时而梦里，时而球场，三五分钟睡去，五六分钟醒来，睁眼望场上仍然没有变化。

中国人有自己的战术，日本人有自己的考虑，双方都为各自的表现满意。双方的战略意图只要实现，该出线的出现，该第一的第一。问题明白，结局清楚，剩余的就是快点结束。我等不到最后的时刻，干脆就在沙发上“呼噜”了起来。睡

了半个小时，最后时刻，我本能地醒了过来，突然间“回光反照”，瞪起双眼紧盯赛场，看看这“平了”的最后光彩。

“平了”，肯定是“平了”，这是我当时的心中话。离比赛结束也就一分来钟，中国队在倒脚，我传我，我传你，有张有法，阵型不乱；日本队也在倒脚，你传我，我传你，双方踢得慢不悠悠，绝无杀机。中国队可爱的小伙子们，此刻似乎心有“定局”，个个跑回本场，都到大门边上防守，就等着裁判吹哨结束全场，就等着“平了”的胜利出线。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这时，日本一个小家伙，好像倒脚极不耐烦，突然间像发疯一般，从场地一侧狂跑起来，接住同伴传来的一球，冲向了禁区，再一怒射，球就进了我们的家园。我们输了。

整场球，我发表不了任何意见。因我常处在睡梦与清醒之间。唯独这三两分钟，我格外的清醒。我的眼睛就像摄像镜头，点点滴滴被我抓拍。中国队在最后几十秒钟输掉了最后的“平了”和光荣。

此刻，我仿佛觉得有这么一条规律：“只要‘平了’，就可出线”，总是“平”它不了。即使到了最后的几十秒钟，照样“平”它不了。中国队似乎能赢，但却“平”不得。这一个“平”字似乎要把中国队压死，好像腐败干部过不了“腐败”关，好色男人过不了“美人关”，国脚们就是过不了这“平了”的关。

最后的几十秒钟，打平这场球，现在看来，可以有很多的解释。比如门将区楚良只要往右侧多站一点，就可扑住那个射门的球；比如队员们只要分散一点，就会将那个小日本堵截；中国队再多倒倒脚，或者干脆往场外踢它几脚，时间

就会耗掉；或者我们死死压住日本人，硬给他家园地强攻猛射，让他失去反击的可能……如此假设简直有无限之多。

然而，一切的假设，都是多余。我们输了，最后的几十秒钟输给了本可打“平”的日本。“几十秒”无论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但它毕竟改写了历史。中国的小伙子，在我看来，个个可亲可爱。但他们的不足，同样格外可爱，就是总过不了别人的“平了”关。

一次次“平”不了，多让人闹心发慌！

日本队的那个突然怒射，终将我的梦境惊醒。这一晚，我无论如何难以入眠。于是，干脆起床，写下了这篇梦话一般的文章。文章写完，叙利亚与乌兹别克的比赛也结束了。前者将后者干败了，中国人终于出线了。中国的出线，是看着别人的脸色，仰仗他人的鼻息实现了。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叙利亚的帮忙，也就没有中国队的出线。

我不是球迷，也从不把一场足球失败当做什么“耻辱”，但我觉得里面确有问题。那就请我们的国脚认认真真总结和反思吧。中国队何时说“平”就能“平”，说出线就能出线，而不靠别人的帮忙，那就算是真有了进步。

1996年5月

中韩启示录

——关于中国足球

如果至今仍有人看不到中国足球的进步，那无论如何算是有眼无珠，睁眼瞎说。

中国“足改”，短短两年，就已取得巨大成就。在中国，终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职业足球”，有了“甲A联赛”，有了与国外高级足球俱乐部频频接触的绝好商业形式，有了锻炼和培养自己足球明星的初步土壤，有了中国球迷自己花钱而购买狂欢、寄情与发泄的可能，等等。

面对这些进步，我常常激动不已。我作为一个对足球也还算有兴趣的人，一个专业体育研究者，为自己民族获得这些成就无比自豪。

然而，平心而论，中国足球的这些进步，还只是刚刚开始，就像一个婴儿刚刚学会走路。

一、痛苦的现实

中国足球如何“冲出亚洲”，怎样“走向世界”，一直是近十多年的基本任务，这种任务已经发展到了不只是一种足球问题，而是变成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至民族主义问题。

每当遇到“世界杯外围赛”，看客的心，绝非对球欣赏，而是考验到底能否出线，能否实现那个梦幻。

然而，这个梦想一直没有实现，即使是中国足球取得较大进步的今天，也没有实现。且不用说，何时能够拿得世界杯赛上的冠军，即使是如何将近在咫尺的韩国击败，都是一个尚无把握的问题。虽然中国在亚洲的足球对手不算太多，但这少数几个对手，足以使中国人头疼。且不说西亚石油国的威胁，也不用说日本巨大经济后盾对自身职业足球的“强心剂”式的刺激，但就韩国的那种“蛋丸岛国”足球，就让中国足球时时难堪。我们今天的问题，就从中韩比较说起。

自**1979**年至今，中韩之间，足球比赛，正式比赛一共进行过**17**场，中国队一共获胜**3**场，平一场。剩下则全是失利。这就是两国的具体情况。每当中国队输给这个“蛋丸小国”，中国人“冲出亚洲”就变成了大大的悬念。一个韩国都难以战胜，何言战胜巴西、德国和英格兰?!

我本人正是无法忍受中国队总是输给韩国，才开始“研究”足球，才开始撰写足球的文稿，才试着寻找足球与社会、与历史、与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各种关系。

我必须承认，即使我也时而参与中国足球的讨论和研究，但我不是什么球迷，也不愿充当球迷。我经常提醒自己，一旦当上了球迷，就会迷狂，就会失去理智，就会丧失思考的可能。于是乎，我倒是对球迷的“高温”，不敢恭维，并常说些与他们未必相同的话语。我深信，研究体育必须像古希腊竞技场上的观众中的哲学家那样，看而不言，想而不狂，虑而不悲。

中韩之间的负多胜少，不知多少次刺激着中国球迷的心。

如果说，中国足球存在某些“恐韩症”，我则说，观众心态上的“恐韩症”则更要严重。对于这些“爱球没商量”的人来说，内心世界简直再也无法接受输韩的现实。可这样的现实现在还在发生，就在我写这篇小稿时，中国少年队又一次以0：3败给了韩国。在此之前，中国的职业队，则在先进一球的情况下，又失三球而告终。

二、专家的意见

输球毕竟痛苦。队员痛苦，教练痛苦，球迷更是痛苦。

中国队何以总输韩国？这毕竟不是偶然现象。记者们面对输球并不“气馁”，仍旧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于是，这样的疑问，总是由记者们首先“问”出。大凡与韩国队比赛结束，当场就会有电视记者追上教练问个究竟，最差第二天也会有报纸记者写出连篇累牍的各种采访。

我们从教练那里看到听到的“意见”，最多的就是这样几条：“我们的技战术尚不过硬”；“中国队职业足球刚刚开始，韩国已经搞了十多年”，“我们的心理素质不过关”……教练未必是足球真理的垄断家，但他们毕竟是足球运动最大的发言家。以上就是我国专家对中韩比赛经常失利的经常解释。然而，这些意见，虽然十分正确，却像是老生常谈。如果说这是十年前的解释，自是无可挑剔。可问题就在于，中国人提出“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最少已有十年，足球问题不能说不受重视，十年以后，依旧是这样的解释，则未免肤浅，则未免没有深入。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可见，只有“深入”，才能真有收获，犹如抓住难得的“虎子”。足球也是如此，问题不深入，解释不深入，又怎好了解其他

与技战术相关的问题?

我无权对中国教练的意见提出批评。然而,报纸与电视上的问题解答的现实,则不能不让人思索。以我之浅陋,以此亦可得出某种浅陋之看法。中国足球专家们的意见,大多都还集中在“物化”形态方面——足球技战术。

三、吾之技战术观

以我于少时和学生期间认真“玩”过几天足球的资历来说,断乎不能在此乱说“技战术”问题。技术的问题,自然是专家的问题。但是面对“恐韩”,我则愿意贡献丁点相关意见。

我以为,技战术形态,只是运动竞赛中充分表现自我能力的“最终形式”。犹如一个瓶子的口径,瓶子中水流量的大小,最终取决于瓶径的大小。然而,一项完整的体育项目,与技战术相关的问题还很复杂。技术是人解决问题的办法。运动员为了战胜对手才开始学习技术和战术,否则,这些东西毫无价值。技术与战术,之所以永远重要,就在于它是最终的能力表现方式。就像生产活动,最终的价值实现方式,在于流通或商业那样。

然而,较之深入一点,必然要有很多问题出现。一个人如何掌握技术?一群人如何形成战术?当一个人掌握了技术和一群人形成了战术,如何能在场上得以“释放”?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平时积累起来的“足球势能”释放出来?

这些问题,似乎只从“技战术”原理出发,不会有什么答案。这是因为运动员的“技战术”形式,只是人的一种“物化”,只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效”形态。“看不见的

手”（经济学重要术语），其实还在后边。

体育中依然存在着一种“看不见的手”。这只手不在体育而在民族，而在民族心理，而在民族文化，而在民族历史。这样的问题，可能“大而无当”，可能“不着边际”，可能像是“玄学”。然而，它却实实在在控制着人的肌肉，影响着我们可爱的国脚的血脉。

经济问题暂且不谈（因为好多现象不是经济问题，比如巴西足球就是比经济实力高出很多的美国和西欧要好），为什么韩国队就一定能比中国人的足球技术更强？为什么韩国队的足球战术会比中国队的更高？同样是亚洲人，甚至同样是中国儒学文化的子孙，为何在这小小的足球问题上，竟会有如此之大的现实差异？即使是同样的技战术水平，何以韩国队总比中国队要表现好出不少？

这些问题，显然不是任何“技战术”可以解答。较之复杂的应该是还有其他。

四、另一种“表象”

那么，到底中国与韩国在这足球问题上，有何差别。

我们先来看看不是足球但与足球有着内在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它就是中韩两国的女子篮球。中国女子篮球，在亚洲和中国的男子足球一样，也是没有什么对手。最大的对手只是一个小小的韩国。在亚洲，中国女篮输球最多的大概就是韩国。

论人马，论身高，论技术，中国女人从不比韩国差，甚至较之要好出许多。然而，只要中国女篮与韩国对阵，问题就会出现。

在篮球的技战术方面，我仍是个外行，我依旧不好发表“内行”话。然而，我却看出了另一层问题。我的问题，就是中国女队员较之韩国女篮，总是“跑动不积极”，仿佛是松松夸夸，少气无力，本该发挥好的技战术，却在这稀松中不能组织。小小韩国，身高无优，却个个“穿插活跃”，常把我“大中华”女队击败。

篮球与足球，根本不是一回事。我却在此做了无情的捏造和比附。

女篮也存在“恐韩”，只是我们无人去提。中国女篮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男足的问题。中国男人，他也是男人，自有其男人的特性。即使是洋人，即使是德国的施拉普纳，也不敢轻易讲中国男人的足球技术不行。相反，牛哄哄的巴西人，见了中国男人踢“静态”练习足球，也常常夸我们“技术不错”。

可这种“技术不错”的中国队，只要比赛场上遇到了韩国，就很难充分发挥正常，“心理总不过硬”，一系列的组合难以奏效。有道是，“跑动不积极，穿插不灵活，抢位不主动，攻门欠火候……”。

我有一个初步的印象，在此不妨一说。如果初等数学与高等数学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一种静态的数量与形式的学问，而后者则是运动的数量与形式学问。中国足球的问题也是这样，如果世界一流足球是一种动态的足球，则中国属于一种静态的足球。

由此广泛推演，还可获知：如果西方足球是一种商业文明的足球，则中国足球更多的倒是农业足球。即使回到我们的主题，中韩差别，绝非简单，更不是什么技战术问题。韩

国较之中国不只是早几年有了职业足球俱乐部，而是更早地走上了民族商业与国家资本的重要道路。中国至今是农业大国。农业的民族心态，对足球产生的影响，倒是多少篇文章难以真正说清讲透。更何况韩国，在继承儒家文化方面，较之中国更多地掌握着“勇敢”、“威武”、“不屈”、“有为”方面的内容。更不用说，韩国人只要干上体育，总以其“无情”、“严厉”、“刻薄”、“恶毒”、“凶狠”而出名，绝没有中国人各种“善良”、“敦厚”、“人情”、“温文”、“雅致”。

…… ……

问题就这么多，一一细说，实在话长。如有可能，那就等以后的章节，慢慢由我道来，假如我的“足球研究”还不算胡说八道。

1996年10月

国懊"国奥"

——写在"国奥队"失利之后

"国奥队"再一次不能出线，再一次输给了韩国，再一次在吉隆坡翻船，而且是再一次身穿"白衣"败给了身着"红衣"的韩国。

"国奥"失利，全国悲痛，真可谓国懊"国奥"，泪水滔滔。

四年前的失利，与这一次的失利几乎完全一致，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前一次天不下雨，而这一次则雨水连绵。

这一次中国队失利，大概又使不知多少球迷饭难吃，觉难眠，笑不是，哭不是，死不能，活不成……真好像"如丧考妣"或"老娘改嫁"或"第三者插足"之大不幸状。

问题不在于中国队的失败是否已成事实。问题的关键在这次出征南洋之前，人们总觉得"国奥队"不会再输，就连解说员老宋在开赛几分钟的解说中，还一再强调"只要中国队能打成平局，就可出线"。更何况自从"足改"以来，"国安队"、"全兴队"、"申花队"还有这著名的"国奥队"，都在一系列的商业比赛中，取得了重大"胜利"。进一球，10万元，就连姜昆这样的"球球"都有感而发，春节联欢会上跑到上海，拿小喇叭猛"吹"一通，那架势就好像中国队已在一夜

之间由最落后的足球国家变成了可与世界一切来犯之敌较量的足球大国。

好景不长，“姜球球”吹完不久，“国奥队”却翻了大船。输得不是一个半个，而是三个球的大输特输。

我对足球的技术与战术，基本上是个外行，而将足球与社会与文化与历史联系起来考虑问题，我则不用谦虚，还算一个内行。面对中国“国奥队”的失利，我这个敢于自称“内行”的人，自然也想发表点愚见。

中国队输了球，不能因此而言中国的足球一点成绩没有。中国队自从四年前的吉隆坡失利之后，就开始了全面的改革，并将足球作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一系列的改革中，有引进洋教练施拉普纳的壮举；有将足球由政府办向社会办的转化；有由“计划”比赛向“商业”比赛的转化；有由从来只见踢球从未与之共场踢球的“隔绝封闭”状态，而将大牌俱乐部和红得发紫的意大利足球明星请到中国同场踢球的转化；有过去少得可怜的一点奖励到一球10万的鼓励变化……所有这些转化、变化，都是我们的改革，都是我们的进步。中国队虽然再次没有出线，但这些成就则无论如何不能回避。

然而，我们的问题，就是只看到了自己的进步，而忽视了前进中的巨大困难，甚至将眼前的一点成就视作一劳永逸的成功。于是乎，当“国安队”在家门口赢了远道而来为钱而来的洋人明星时，我们的足球舆论热了，我们的观众狂了，我们的球迷疯了，飘飘然，就仿佛中国已出低谷。

足球从来不是一项独立运动，它比任何其他体育运动，与社会、文化甚至历史的因素联系得都要更多。足球基本上是

一种“资本”运动，它的机制也基本上属于“商业”性质。这是由这项运动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绝非哪个故做深沉之辈信口开河，任意杜撰。

亚洲的足球所以水平低下，其历史背景，就在于亚洲太缺乏资本主义的历史熏陶。亚洲的经济强国太少，亚洲的发达国家太少。非洲的足球凭借其非洲种族的运动天才经常会有上乘表现，但总也踢不出世界一流的成绩，其关键还是因为这些黑人兄弟太少了些商业与资本的社会锻炼。亚洲就目前而言，足球水平稍微高一些的，就是韩国、日本和西亚几个石油国家。石油国家的足球水平稍高，一半是由于他们尚有些金钱，更主要的是他们的种族和体力更适合于足球运动，但他们几十年来踢不出世界水平，又可见其历史因素与社会条件的强大制约。韩国与日本，都是足球的后起国。但他们的成绩比我们提高得要快不少。其快之原因，除了经济上的因素外，我以为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总体社会进步幅度。这两个国家，其“发达”程度，都明显高于中国。它们的民族精神中，习得的“资本”要素，显然要比我们多出一些。中国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大国，而且是一个至今无法立刻脱离“农业”色彩的大国。我们的农业民族和这个民族中的总体“农民精神”，与足球运动所需要的那种“游戏精神”、“商业气概”，大概还有不小的差距。

我们12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胜不了一个只有几千万人口的半岛国家，绝非偶然。韩国的历史与文化虽然极大地受到过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但他们与中国人的行为规范则并不一样。韩国有“太极图”，但与中国人理解的“太极图”就不相同。韩国人对中国儒家中的“刚健”、“有为”、“勇敢”给

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发挥，日本人也将中国的“勇敢”、“任侠”、“武化”精神与其自身的“神道”性格结合，发展出了著名的“武士道”精神、“祈战死”品质。加上他们先我们一步接触并接收了西方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经济、社会、历史和伦理等诸多要素促成了他们足球的进步。我们必须承认，韩国的足球在整体水平上，大大高于我们。而我们的民族，尽管天天守着孔夫子孟夫子，但我们的行为中，并不能将“有为”、“刚健”、“弘毅”的东西发扬光大。有道是“忍让”、“克制”、“乖巧”、“听话”等“吃亏是福”，“沉默是金”的东西盘据着我们民族行为规范的灵魂。我们的社会中，无法有力打击车匪路霸，见义勇为不易得到弘扬光大，其内在的文化因素，就是我们的“农民”品质太重。农民习气很重的民族，很难在短期内学会现代人的足球。

足球虽然不是直接的社会比赛和经济比赛，但却是民族总体文化与精神的比赛。它是“游戏”，却浓缩着“精神”。我们的队员就是从这样一种国度里成长起来，他们是中国广义农民的子孙，他们血管里流淌着这种根深蒂固的血液，他们在练习足球的同时，他们在献身足球的同时，他们的父辈，他们的社会关系，早已教会了如何“适应”社会，如何“听话”，如何“克制”，如何“忍让”——一句话如何会“做中国人”。有这种人格因素在侧，在足球场上完完全全变成现代社会的“足球人”，将自己民族精神中的这些东西，丢得干干净净，大概是没有可能的。

有如此巨大的文化力量在，任您戚务生、王务生在场上声嘶力竭调兵遣将，命之“勇敢”、“快跑”，关键时刻的腿软毛病总是不可避免。这就是我们的足球问题。这个问题，非

常的不明显，它在极其隐蔽的暗处，我们无人关心它，无人讨论它，但它却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拽着您，拽着我们的队员，拽着我们的足球步履。

中国足球通往成功的道路，还相当漫长，绝非一朝一夕可以一蹴而就。改革是通往成功的最佳途径，是使一切与足球有关的因素排列得更加合理。有形的因素与无形的因素都会困扼足球的生命。

痛定思痛。何不从最深处思痛?!

呜呼！

1996年4月

“文化”重于“种族”

——关于中国足球的话题

近日，接受电视采访较多，为电视台小做“筹划”也多，于是“打的”机会自然也多。隔三差五，我就得坐在“黄虫”中长途奔跑。司机见我不是“老人”，也就愿意聊天，聊不上几句就定会跑到“足球”。因为不知不觉中，他们就会发现我的身分：体育人。

这“打的”般的“黄虫”生活，足为我提供了另一种“生活经历”，并为我提供了随车调查的机会。如果大家都有机会听“面的”司机“侃”足球，那么，中国足球的所有症结，都会一“侃”而出。一会儿是说“脚法”不行，一会儿是说“素质”不行；有的说在于教练不行，有的则说营养不足，等等。我的感觉是，“面的”司机中，蕴藏着无数个中国球迷。听他们侃球，足可了解球迷心态和足球问题。

昨天（补记，**1996**年**12**月**26**日），我从北京电视台返回，途中一位“面的”师傅与我“侃”了一路足球。我则很少说话，只顾认真听讲，为的是“听懂”其心声。这位慷慨激昂的师傅，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中国足球所以太差，原因是踢球人的种族不行。

“种族”说法者，我听过的不止一个两个，可以讲每到一

处，就定会遇到这种代表。我在山西就遇到过一位很有成就的“体委主任”，他一直以为中国足球的问题，关键就在“种族”。这种“种族”的不足不在其他，而在“身体素质”。甚至他还有一个观点，如果让新疆人踢球似乎比让北京人上海人踢球更好。理由是新疆人在体质上更接近欧洲。如此这般，“种族”说者，绝不在少数。

我听过师傅一番慷慨之后，三天没有说话，一直在思考“师傅”的心里话。

思忖许久，刚有眉目，恰遇《中国体育科技》记者邓宏君向我逼稿。我没辄，只好爽朗答应，将我的思考写出，见教于方家大人。

一、“种族”说有一定道理

“面的”师傅，工人师傅，球迷观众，未必没有眼力。他们所发表的“种族”说就是一种重要观点。他们的这种观点，最起码在直观上反应了一种“真实”。其真实性就是中国人在身材上的确不如欧洲人，在素质上不如非洲人。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而且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我对体质人类学还算是了解，某些无情的数据，像铁一样硬实，在支撑着这种判断。

中国人在体育方面的长处，基本上都是与“种族”自然属性关系不大的项目。大凡遇到田径、篮球这些非体力而不可的项目，中国人的确是问题很多。足球这家伙绝非省油的灯，它太需要体力，太需要素质，太需要“种族”的那种强大的自然属性。而我们可爱的中国人，与那些身高马大的欧洲人相比，的确是矮人半截。于是乎，一系列的“输”逼迫

人们联想到了“种族”及其“素质”。这个思维过程，我以为自然而然，合情合理，没有原则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大概就是会触动某些神经过敏之辈，仿佛足球上的“种族”不行必定包含了其他方面的“种族”不行。

足球大国中，基本上都是种族高大之国也。欧洲如此，南美稍小些，但也是欧洲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后裔，非洲人的天然素质之高无人不知。即使亚洲西部的“石油国家”，其足球水平较高，也是由于人种上既接近欧洲又接近非洲，素质很好。可见，“素质”和“种族”肯定是足球运动必然遇到的问题。“种族”问题也必然与中国的足球发生各种关系。

“种族”说中，包含了很大的事实和真情，最起码在“统计”上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人们产生这样的观点，也为从事足球事业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依据，选拔运动员时一定要选那些身高力壮的“好孩子”。让这些“好孩儿”上场，鬼子才不能猖狂。

种族说的优势，还在于它会让我们注重平时的身体训练，免得连“十二分钟跑”都不及格。体力是基础。没有种族的威力，就不会有高水平的足球。我以为民间的这种“种族”声音，应在“素质”这个有价值的意义上，予以高度重视。

二、足球的实质在于“文化”

然而，“种族”说无论合理性多大，却有其严重的缺点。这个缺点，只要来回一想，就会暴露。比如，世界上最著名的几个球星，都未必是什么身高马大之辈，贝利不高，倒是与亚洲人一个身高；马拉多纳更矮，也就一米六八；普拉第

尼，并没有太多欧洲人的“种族”风范。意大利的罗·巴乔，瘦小得让人担忧，巴西目前的两个最好的球星贝贝托和罗马里奥的主要优势也不在其身高。

即使在亚洲，韩国人足球水平较高，但其基本身材比中国人没有丝毫优势，天然方面绝无什么过人之处。相反，较为身高马大的新疆人，反倒在中国足球队里没有一个队员。

这些事实，都表明“种族”说，有其明显的问题，不能充分反映足球的实质。“种族”说，只是表面上建立了足球与人种的联系。

露出了“种族”说的问题，足球的本质也就更加清楚：它不是一种简单的体力运动。它不是田径那种纯然人体力量的较量，它不是棋类那种完全的大脑斗智。足球需要极大的体力，但同时还需要很高的技术，更需要非凡的战术，还需要涉及两人以上（己方十人，对方十人，二十人组合起来的复杂局面）的“组织学”（我的“新概念”）能力。这种能力比战术能力似乎还要高，是真正的“战争”核心。它的培养既与平日的训练有关，又与不训练时的生活影响有关，是个极复杂的问题。所有这些，绝非天然的身高与力量所能解决。这需要智力需要心灵，需要一种“感觉”，需要一种背景，需要一种社会心理基础。

中国与韩国比赛，足球总是输多胜少，输的不只是体力而是我前面讲的那种“组织学”能力。这种能力，赛场上有用，但未必来自赛场的训练。它与民族的社会心理直接相关。它的实质就是民族“文化”。

中国足球的最大困惑，不在体质而在“文化”。

三、儒家文化：文弱

如果承认中国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的话，那么，很多与足球有关的问题就都与“儒家”有关。虽然以往无人讨论过这个问题，但不等于说就没有这回事。

我窃以为，中国足球之所以总是“步履蹒跚”，体力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文化基因在控制着大家。两千多年来，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动力，不是别的，而是孔孟及其弟子所弘扬的儒家规范。

儒家的本质就是“磕头种地写文章”。它与墨家、道家甚至阴阳家的性格完全不同。特别是墨家，在先秦时期，曾是真正的“武士”，都是战斗不要命的英雄，都是“以武犯禁”的人们。墨家，简直就是先秦时期的“武斗专家”（冯友兰语）。中国的“侠”就是从墨家一派演化而来。“侠”在中国又称“武侠”和“墨侠”，是仗义与勇敢的化身。我以为中国文化如以墨家精神为主，则对于足球的发展会有极大的好处。那些“武侠”式的人们，一定在足球场上会演出众多马拉多纳和贝利式的勇猛与机警。

只可惜，“写文章”经孔子及其弟子的呼唤而在中国突然变得值钱，于是乎，中国社会就又出现了另一种景象，即“以文乱法”。孔孟之道，就是以文章乱天下的一派。由于这是一种文雅而特别的一派，并在当时社会中发挥着较大作用，那些以“武斗”为主的先生们，也就不再吃香喝辣。自从孔孟变成中国文化的脊梁，墨家、道家和阴阳家从此个个“歇菜”，由“显学”变成了“地下党”。这一转变，完成于中国封建社会确立的那天——汉朝。

秦始皇虽然接受过一些儒家的思想，但骨子里看不起儒生，并深知他们都是些“以文乱法”的家伙，这与大秦帝国所需要的“天下太平”和“万世长存”，大异其趣。于是秦皇帝就发布命令发动了著名的“坑书焚儒”事件。由此可知，儒家“写文章”的那种劲头在秦皇帝时代并没有太大市场。刘邦以来，国家安定，生活祥和，但诸侯之间却时刻孕育着“暴乱”和“夺权”。先秦那种“武斗”精神仍然旺盛，各家各户纷纷养“士”，武斗“门客”之多，常以千计，经常酝酿着社会动荡。面对如此社会格局，刘邦之孙刘秀，听从“写文章”能手董仲舒之辈的进谏，来了个真正的“以文治武”，遂使中国凭添了“文雅”的力量。名之曰“独尊儒术”。

从此，中国人也就开始了“磕头”加“写文章”的“礼仪”生活。

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这样登上历史舞台的。它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从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国足球和中国体育来说，此事则有严重问题。两千多年的“磕头”加“写文章”，终使中华民族变成了真正的“书生”，并全面“文弱”。书生的必然结果就是“文弱”。孔子思想中虽然有某些“进取”，“勇武”，“刚健”方面的质地，且孔子本人也还算是个七尺“大力士”，但“儒家”的“柔弱”本质，却无法回避。

近代章太炎、胡适、郭沫若和闻一多等人的考证文章，都从文字学、训古学方面得出结论，“儒”本身就是“弱”的含义。甚至中国凡是带“需”的字，都有这种特征，例如“糯”、“懦”、“蠕”、“濡”、“糯”、“懦”、“薷”等等，都与“柔弱”相关。儒家之“儒”则因“文质彬彬”、“文弱书生”、“不曾富裕”等而得名。人们所说的“儒家”即有“软弱家”

的意思。这最起码是对周代时期商人后代生活状况的形象写照。

中国社会虽历经变化，但儒家精神一直没变，演变到近代就更是柔弱出名，一直无法抵抗列强进犯。正是这样，引进现代西方体育才成为必要。中国的体育就是因此而引进家门的。

四、近现代中国：仍未摆脱文弱

近现代中国面对西方文化，不得不进行适应，本世纪的巨大社会变迁，终于树立了一种新的社会风范和道德尺度。西方“马列主义”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依据。

然而，中国的“文雅”气质，却并未因此而放弃。相反，每一个家长，每一个教师，仍然恪守着自己血液中的“孔孟”之道，继续传播传统文化。“知书识礼”仍是中国人的最高教养。

这一点与西方“列强”完全不同。西方的足球所以很好，除了有钱，体力充沛外，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中向以“武斗”为本，即使是“基督教”盛行的中世纪，“决斗”与“骑士”仍是百姓心中的最高风范，男女爱情的“吃醋”问题，其解决方式常以决斗为准绳。英雄爱美人，其英雄就是骑士或与骑士相类似的人们。这在汉代以来的中国简直不可想象。中国的男人也好色（如唐代诗人）但却不好决斗。西方的文化苗头源自希腊，而希腊不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都是“武斗”大国，都是极度重视体育的城邦。现代欧洲更是继承了这种体育与武斗的传统，所以一切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在那里格外突出。足球这种最需要“蛮力”与“智慧”的东西，自

然市场很大，水平极高。现代足球起源于西方，发展于西方，流行于世界，绝非偶然。必然的力量在于特别的文化基础。

当这种“蛮力”文化向中国渗透时，中国则仍是“以文治国”，短时间内无法接受。严复当年（本世纪初）在其《原强》中，就曾发表过重要看法：西方人属于“以质胜者”，即以体力之强大而保种成功者，这些人“生繁教训之事，简而不详，骑射驰骋，云电飙散……乐战而轻死，有魁杰者要约而驱使之，其势可以强天下”。这的确是西方人的“美德”和“传统”。而与西方不同的中国人又是怎样？严复总结道：“若夫中国之民，则进夫化矣，以文胜国也。”而与严复同时代的梁启超则说：“竞争之说，素为中国人所不解。”

这虽是“旧社会”的事情，但即使“新社会”里，“竞争”不恰恰是近十年来随着“市场经济”这个时髦概念的流行才开始为中国人所熟悉?!虽然经济的力量逼迫我们学习着“竞争”，但平时未竞争的日子里，我们的家人孩子学校社会不依旧是“儒雅风范”，“礼貌在先”，“文章道德”?！我们的“国脚”们，少小时分，第一个所学却并非足球，而一律都是“快叫阿姨”，“快叫爷爷”。如此“叫法”虽然简单，但却流露着明显的“奴性”。中国的孩子，第一堂课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养成的品质也就自然而然必是快叫“阿姨”。

由于叫别人“阿姨”时间过长，孔孟之道的那种“文弱”精神自然就带到了足球场上。你看看中国人与外国人踢球，那还不让人气死，明明可以一举拿下的球，他就是要慢慢来，仿佛稍微鲁一些快一些猛一些就会打破“叫阿姨”的规范。

五、“文化”特色：润物无声

我的以上“文化”观点，估计某些足球“干”家们会不以为然，觉得这和足球没有关系。问题就在这里，某些有头脑的文化人，也总以为看不见的东西，就是不起作用的东西。这种思维我借用马尔库塞的话称作为“单向度”思维，用心理学的术语又可叫做“具象思维”。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哲学头脑，但研究者的头脑则必须“全面”。

中韩足球，韩国人比中国人技高一筹，除了体力和商业因素外，则与“文化”大有关系。韩国人虽然历史上一直接受着中国儒家的教化，并常以中国历史之长度为其文明长度，明代还曾被中国“托管”，两千年来，“春秋大义”真可谓不绝于口。然而他们并没有真正接受全部中国人历代所“造”的儒家精神。韩国国旗上居然也是中国文化徽章，但它不是儒家的“文弱”，而是“太极”，强调的是“阴阳斗争”和“刚健有为”。

“高丽棒子”之所以脾气刚强，倔强无比，当与这种“阴阳斗争”的精神教化有关。我们的足球与韩国相比困难重重，即使与经济非常紧张的北朝鲜相比，也未必有什么优势。这就是秘密。这就是文化的秘诀。韩国只有4000万人口，而中国的12亿人马却难与之相敌，足见这不是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否则，南美足球就该永远落后。因为它的经济不行，不少国家比中国还要差出不少。在人种上，中国人与韩国人简直没有区别，费孝通早年当学生时，就搞过体质人类学方面的头盖骨测定，认为朝鲜人（含两个朝鲜）与中国的山东人，在体质类型方面完全一致。

由此可见，无论“人种”说还是“经济”说，都难以成立。唯一成立并难以解决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文化”。

“文化”的力量，的确是“看不见”，因为它离我们“太近”，近到了“叫阿姨”，“叫爷爷”和“叫叔叔”这样的水平。所以我们谁都不会注意。然而心灵的尺度就在这种谁也看不见谁也不经意去看的“无声”社会中塑造。它真像是经济学中所说的那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指使着各路好汉悄悄服从它的“最高旨意”，或降低成本，或增加投资，或扩大市场，或缩小规模等等。

足球的文化也是这样，它本身就是看不见的手，最后终使不同民族有了不同的特色。中国足球的特色，在我看来就是太“文雅”，太“幼儿园”化，太“谦谦君子”，太缺乏海盗子孙们（葡萄牙、西班牙及其南美后代）的那种野蛮，太缺乏骑马人（西亚人，东欧人）的那种潇洒，也太缺乏“决斗士”（欧洲人）的那种威武。

中国足球，只能伴随中国商业社会的巨大发展而进步，中国人的“新品格”也只有在这种规范的商业文化中重新锻造。有新人格的锻造，才会有新足球的品质。而这种进步，必然离不开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悄然“文化”。

这些话题，说来过长，难以在这小小文章中说清。更何况我本人也只能“写写文章”，是个典型的“文弱废物”。天底下多我这样一个文人，足球的魅力就会减少一分。想到这些，只好赶紧收住，免得包括“面的”师傅在内的一切足球“同行”笑我天真，笑我于足球一窍不通。阿门！

1996年12月

沉重的“游戏”

——民族心态与中国足球散论

一、中国人的“认真”

中国人的严肃性、责任心，大概举世无双。就连离婚这种本属“寻求自由”的行为，也被大家看得十分严重。同样，本属游戏的体育，自从输入中国以来，就开始变得不再“游戏”，沉重的政治意味和复杂的民族情结，早已成其基本色调。小小足球，竟惹得某些本该好好多做文学作品或社会调查的学者专家，开始了另一番情趣，或遣词造句，或慷慨陈言。刹那间，指点江山，挥斥方猷，足球声音响彻云霄，仿佛搞足球的人不听其这番高见，定是先亡球，继而后亡国。

这就是中国的体育，这就是中国体育环境中的足球。中国人太在乎体育，总想在这体育中说出点什么。于是乎，是个人，是个有生命力的人，就总是奉待体育如宗教，奉待足球若神明。看那些神魂颠倒之球迷辈，成日价嘶声力竭，振臂高呼，全国漫游，你就知道这些人如何对待体育，对待足球。但你万一问他为何如此痴迷体育与足球时，他（还有现在的那些个她）却无言以对。仿佛他们就是世界上真正的“解构主义”者，失去了语言，没有了表达。中国人（不，主

要是那些老少球迷爷们儿们）对足球就是这样爱得盲目，甚至爱得糊涂。

中国的足球小子们，也真是可爱，回回不让这些大老爷们省心静气，每每都要输它得个干净利落。第二天，准保是各种议论会、讨论会和座谈会，开个没完。中国的报纸电台，因为这足球“低潮”也绝不会倒闭。再难看的节目与文章即使令人浑浑欲睡，只要换个频道或版面，看看那上面的“足球”话题，立马又会让你清醒。仿佛喝了浓茶和咖啡。再无聊再烦闷的人，只要是谈论上足球问题，他就不再天玄地转，百般无聊，而是振振有词，精气神十足。北京满街的“面的”，你万一是个男人，一旦乘坐这些“的（此处读di）爷”的车，“的爷”们一定主动找你聊答几句足球。中国不争气的足球，不仅提供了成日开车极其烦闷如“面的”司机者以各种开心话题，从而有聊，而且养活了许多专吃足球饭的记者、作家和评论家。“家”们，比“面的”司机更“有聊”，一个个口诛笔伐，巧舌如簧，悲天悯人，痛心疾首，讲球如救亡，评球如救国，燕赵悲歌，血泪相连，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天浑地暗，顿失滔滔。经其聊侃，亿万国人，面对足球，也只好戚戚然而无语。一个个闭月羞花，都不敢“孔夫子面前卖弄文章”，只怕在专家面前露大怯。越是这样，“家”们就越是更像田连元或马三立，成了足球评书家或足球单口相声家，把酒当歌，摇舌鼓唇，痛陈“脚下”，电视里报章上，一把鼻涕一把泪。仿佛足球的“硬道理”就在他们的口袋里。

如此境况，真可谓“一场足球一场寒”。

我有时纳闷，如果中国足球真的冲出了亚洲，是否目前这些喋喋不休的“说家”也会个个面临失业？想到这里，我

就觉得，中国足球目前这种状况，虽然水平不高，但却功不可没。许多人的生家性命或稿费收入都竟然直接“挂靠”在了这个“破球”身上。

……

二、由一个辩题引出的问题

中国足球之如此“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不只是惹得挣稿费的先生们“竞献大计”，就连中学生和大学生们，也按捺不住冷清和寂寞，一个个“足球兴亡，匹夫有责”，人前人后，大发洪论，煞是热闹，仿佛又回到了春秋战国，“道术为天下裂”。

前不久，北京高校间举办过一次 green plus“大专院校体育辩论会”。这就是信号。国计民生如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者，向来是“大专辩论”的主题（近十年来，概莫如此）。而今的主题，却开始转向了“体育”。这或多或少表明，中国体育已到了如同政治经济一样的社会高度。或者说，社会的历史责任和民众的格外关注，体育你就别想老是那般“游戏”，你必须来个如此“高度”。

在这个不久前结束的北京大专辩论会上，有一场辩论就关乎足球。题目是“尽快提高中国男子足球水平必须引进外国教练”。这个辩题，无疑具有“无可争辩”的性质。正方拿上此题就可慷慨陈词，任意发挥，满场生辉。

我偶看电视，正好看上了这场辩论。只见场上，你来我往，针锋相对，彼此舌战，痛打“落水狗”而毫不留情。但细细听来，这些辩论的孩子们，实在可爱（看来这些少男少女还处在“热爱足球”的初级阶段），所出言论，基本上没有

抓住问题的实质。虽然都是长篇大论，流利口才，舌枪唇剑，语势铿锵，但不免多是些花拳秀腿，华而不实，套路太多，打不到疼处。

我当时有个感觉，如果中国搞足球职业专家们，真的按这些孩子们的言词办事，断乎依旧不能“尽快”提高水平。足球的问题，在我看来无论如何也要比“辩论”更为复杂。看着电视里的“辩论”，我的脑袋却时时摇着：过于正确，大而无当。

辩论快要结束时，我才突然醒悟，学生辩论以“辩”为主，不能认真。谁在辩论场上是雄辩家，谁就会赢得“辩论”的胜利。有真理的人，只要你不是“雄辩家”仍然不会当上“辩论诸侯”。因为“辩论会”最大效果，是满足听众的“听”癖。在此“辩论气氛”中，即使你辩得霸道娇情，但只要你嘴中总是念念有词，并字字足球，那你就初步有了足球“雄辩家”的架势。评委们就会根据自己“美感”满足的程度而给你打得高分。

然而，“雄辩”的事实最终表明，反方赢得了辩论胜利。反方胜利的原因极其简单：“善辩”、“雄辩”和“硬辩”。辩论比赛，永远不是“事实”陈述，只是刹那间的“华章”与“流利”。辩论会的最大误区就是：“雄辩胜于事实”。

三、中国足球必需“范式”

辩论比赛结束了，我的心却沉重了起来。因为辩论场上辩题并不是一个“华章”与“流利”的问题，而着实是个事实与陈述的课题。我作为一个理论研究者，面对“华章”取胜，霎时找不着感觉。

如果中国足球的问题是“最终提高足球水平”的话，那么，肯定是不“必须”请什么外国教练。但假如真还有一个“尽快”提高水平的话，那么，中国足球肯定是“必须”请洋教练入华执教。

如此问题，虽然简单，但“雄辩”的孩子们，没有一个谈道。

“尽快”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必然要请外国教练。这在“进步”(请行家们注意参阅库恩的《科学结构与科学革命》一书，这是个极重要概念）意义上，属于起步的“范式”问题。中国足球界的行内人都是“技术家”和“战术家”，当然不知道“范式”概念，但那些“肚中有水”，颇有韬略的文化人，却未将美国库恩的这个“范式”概念搬到中国足球界来，在我看来，实在是枉为“军师”。这就像一个酷爱哲学的年轻人，特想让某某著名哲学教授指点提拔，并让他立马（相当于足球中的“尽快”）有些哲学“提高”。教授不慌不忙罗列了几本极重要的古今哲学著作，而没有告他哲学水平如何马上提高。如此这般，这“几本极重要的古今哲学著作”就是这个酷爱哲学的年轻人的起码“范式”。他如果听进了老师的意见，并认真阅读了这几部重要著作，那么，他就可能在哲学问题上，有所悟性和提高；他如果对老师的“教导”不屑一顾，继续在人堆里卖弄着报纸上的一些“哲学”言论，他便永远进入不了哲学的殿堂。这个事例告诉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哲学书，都能让人成为哲学家。只有读了名家推荐的这“几本名著”才有可能成为哲学家。这些“名著”就是“范式”。任何人做任何事，都离不开“范式”。“范式”就是起点的水准。西方哲学有一句名言：“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柏拉图的注

释史。”可见，柏拉图就是哲学的基本“范式”，一个没有接触过柏拉图的人，断然不可能有象样的“西方哲学”言论。有也只能类似于“胡说”。

邓小平领导我们搞“现代化”，他的“范式”就是当今西方的“现代化”。否则他根本用不着“改革开放”，也用不着那么多的一系列“引进”。

中国足球也是这样。一个泱泱农民大国，不借鉴他人之经验和“范式”，突然间就想有世界一流的足球水平，这无疑等于弗洛伊德所说的“白日梦”。中国足球的“范式”就是当今的西方足球（南美洲足球逻辑意义上亦为西方）。

更何况沉重的足球已将中华民族逼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它要求中国足球必须“尽快”提高水平，如此这般，就更是必须从高“范式”上起步。

四、关键永远在“内因”

大专辩论中，反方“辩友”抓住正方一个“漏洞”不放，猛攻狠击，说道（大意）：“我们不怀疑引进外国教练的重要性，但引进教练不是最终的办法。更何况我们国家队前此引进的施拉普纳，地方队引进了英国教练等，都没有提高我们的水平，也没有实现我们冲出亚洲的目标。”

“引进国外教练”，便必然“提高中国的足球水平”。这就是“雄辩”孩子的“雄辩”逻辑。在这里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再次大放异彩。

引进教练执教，此乃中国足球水平“尽快”提高之必然条件。但能否有此提高，则问题较为复杂。一方面有外国人是否卖力教球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有中国人曾否学好和短期

内能否学会的问题。老虎豹子天天教王军霞向它们学习，再能跑的王军霞却死活跑不过这些畜生；陈景润手把手教动物园里的猴子学习数学，动物间最聪明的猴子却打死它也学不明白“1+1”这样的数论问题。

这种不可能和“未”可能，显然存在一个“接受并转化”“范式”的条件问题。通俗点讲，这也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讲的“外因是通过内因起变化的”。老母鸡再认真孵蛋，也不能将铁蛋孵出小鸡来。

外国教练的水平再高，也不过相当于“母鸡”的地位，至于到底能否有高水平的足球运动，则完全在于我们这些“内因”，在于我们那些可爱的小伙子们。

雄辩如那些大学生们，大概都有些健忘症的倾向，那么长的辩论时间里，竟未见一人认真“抓住”这个问题。也许并无健忘症，只是为了“雄辩”而故意回避。

我无意否认中国小伙子们的聪明与果敢，我只是想再三强调，中国的“足球先生”只能来自中国人的孩子。中国人所有的问题，如果只从大而无当但极时髦的“文化”意义上讲，集中起来就是一点，即“农民品质”太重。因为中国是农业社会，她的孩子自然都是农民的孩子。

现代足球，无论如何没有也不能诞生在“农民”的手中，而是诞生在创造商业老板的那些国度。现代足球起源于英国，起源于老早就实现了“工业革命”的这个英国。海员和商人后来才将这个商业文明的足球“游戏”传播到了世界各地，并在各地扎根发芽，成了全球奇观。

中国人自信自己能踢好足球，这固然令人百倍敬仰。就像亿万民众自信可以实现“现代化”一般。然而，即使手握

一万个自信，心中却没有一个支撑自信的条件，最终则连一个自信也无法实现。好比一个不懂数学，同时也不懂物理的人，却要设计导弹上天，其自信虽然百倍可爱，但最终只能是一枕黄粱。

以吾之悲观看法，中国足球真正登上世界先进行列，其时间之久那要等到中国实现自己的现代化。足球虽小，但不孤立。一种游戏，就是一种命运。

每每说起足球，我的心就跟着沉重。

足球，啊，足球！

1997 年 1 月

"12亿"与"10来个"

——来自"民间足球讲坛"的报告与思考

一

谁的话最可靠？

这对于我这个搞研究者来说，却未必能有一个好的答复。

因为文献上的东西，所反映的内容常常与实情有很大的脱节。文章家的文章自然经常脱离实际，硬道理少，花言巧语多。我有一个体会，如果真要照文章家，特别是一些足球文章家和评论家的"理论"，去核实中国足球，反而真让你找不着北。相反，倒是朴素的百姓，他们的话，常能提出好的问题。

我所接触的百姓，且最让我觉得有些足球分量的百姓，就是开车的"的爷"。"打的"是城市人的方便和阔绰，但真正开车的"的爷"则未必没有辛苦。尤其是那些小"的爷"，天天开着那个很像70年代方面包的铁家伙，冬天冷，夏天热，一天上百公里的颠簸，自然会"颇感无聊"。

正是这样，我也摸着个"规律"。就是只要你坐车，只要你坐上了"不拒载"的小面的，司机师傅最高兴的事，大概

就是愿听客人胡聊天。一来解闷，二来防困。我因工作忙碌，近来还特别能"打的"。这种体会可谓"至深"。

只要是昨天晚上的电视里播放过什么足球，尤其是中国人参加比赛的足球，"的爷"和您聊天的内容准保离不了这个足球。即使您对足球没有兴趣，甚至压根就没有看过足球，他也会从各种角度转移到这个圆圆的足球。

胡子拉碴的"的爷"，一面手握方向盘，扭来扭去，一面慷慨陈词，痛说足球，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显得格外"内行"，格外"懂得"足球，格外"酷爱"足球。这种状况，如果要用上海话描述，"的爷"师傅如不与乘客聊足球，他准保是怕客人蔑之为物质上的"小瘪三"和精神上的"小赤佬"。

这种局面，我常常遇到。尤其当那师傅知我"打的"到电视台，总要问我是否在电视台工作。而当我如实告他不在电视台，而在"国家体委"某某单位，则我这"国家体委"无论如何也躲不掉他的左右煽惑，非让你听听他的"足球高论"而不可。

二

我常常将"面的"师傅的"足球高论"当作"民间足球讲坛"。就好比古希腊的自由民，经常有事没事到个破广场上发表政见，从而显示博学和远见。

"的爷"们不会被请到电视演播室，也不会被邀为佳宾到什么广播台，也没有时间（甚至没有能力）来写文章发表足球观点。他们也就只能和你这专门干体育的"体委干部"聊聊大天，发泄发泄足球之"私愤"。

然而，尽管是这样，我却觉得他们常常会冒出一些"语

不惊人死不休”的话题，时时能提出类似哲学家那样“极端”深刻的大问题。我就听到一次这样“豪言”般的问题。

有一次，我“打的”到了北京西站，恰巧就听到了足球高论。

“面的”师傅，一面开车急转弯，一面满面深情而侃侃道：“咱们中国这**12**亿人口中，怎么就挑选不出**10**来个能踢球的人来?!”

我听“的爷”论球，大概早已听得发腻。每每遇到“侃球”的“的爷”，一般来说，我总是不太认真，应付即可，顶多是适当显示还算对其言论表示关心。如此这般，一是为了掩盖咱并不专门从事足球职业，二是也以此表示咱不能白当“国家体委”某某单位的干部。总之，我是有一句没一句，边听边答，昏昏欲睡，哼哼哈哈。照王朔的话说，我是“没一句正经”。

可自从听了这位师傅的豪言壮语式的“问题”之后，我就再不如此，再无困意。

因为这“民间足球讲坛”里冒出了真正的“足球问题”。

是呀，这难道不是中国的足球问题？中国不就是**12**亿人口中，总挑不出会踢球的**10**来个小伙子？他说得全对，而且对得不能再对，仿佛达到了真理的顶峰。如果那个爱说大话的“林彪先生”在世，弄不好还真会请这“的爷”来当他的接班人。

我听过那话，第一次觉得像是个真正的“问题提出”，比所有体育学院里的研究生们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要高明，都更好地提出了“重要问题”。于是乎，我认认真真将“的爷”师傅的“问题提出”记在了我那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

我经常拿出小本对照，我认真思忖着里面的问题，他揣摩着问题中的问题。于是乎，我今天第一次接着“的爷”师傅的话，要写一点东西，也算咱对足球“事业”的一点“贡献”，也算咱对那位“的爷”师傅的真正敬仰。

三

中国的足球，尽管目前进步的速度可谓不小，尤其“足改”以来的那种进步，更是不能视而不见。但必须看到，这种进步还远远不是世界一流。中国足球的问题如堆，这不用否认，而且问题的形式，也是方方面面，不同角度。但这些问题如果硬要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那就真还是“的爷”提出的问题，即“12 亿人口中，就是挑不出会踢球的 10 来个小伙子”。

此话无差矣。足球比赛，如果是国对国的话，又怎能不是一个国家的人口对另一个国家的人口进行比赛？更何况代表这个国家参加比赛的那 10 来个人，又总是被叫做“足球选手”？“选手”之谓，就是从人堆里多费几道“手续”“挑选”出来的意思。“中国足球运动员”，无论如何也是从中国这众多人口中“挑选”出来的吧。中国足球有多高个水平，应该说，问题和责任不全在国家体委及其中国足协。有些文化人一看中国足球输了，就将难听话扔给“国家体委”和“中国足协”。这样的文章先生，在我看来，虽勇气十足，虽抓住了主管部门，但绝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你 12 亿（其实中国人口又何止是 12 亿?）人口中，总是挑不出出类拔翠的那种足球“小伙儿”（东北话），中国那么多人口中就是长不出能踢好足球的天才孩子，中国就是成立

上100个“国家体委”和1000个“中国足协”，又能怎样？

古人云，“千里马易得，而伯乐难找”。这说明人与兽之间，专门赏识“马才”的“人专家”非常少见。而且一旦有了这种“人专家”，大草原上的“千里马”一定就会找到，并成为大家的良驹宝马。可今天的问题与此完全不同。中国足球这种“人与人”的问题，在我看来，就不是这种“千里马”与“伯乐”式的问题。

有的人一着急，就爱骂“国家体委”，更特别爱骂“中国足协”，总觉得这些政府部门不是“伯乐”，发现不了人才，进而也就不爱惜人才，再进而也就导致了中国足球水平总是“上不去”，等等。

可是爱骂人的“球迷”，“文章家”和“笔杆子”们，大概都没有预先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中国人堆里真有能踢球的“10来个小伙子”。如果“千里马”真有，只是真没有“伯乐”，那“家”们的“骂声”如同真金，字字铢玑，没有白骂；而如果“千里马”压根就没有，却培养了满地“伯乐”，又该怎样？同样的道理，能踢球和会踢球，特别是可以踢出世界一流水准足球的“选手”没有，就是再有天大本事的“伯乐”来了，又能怎样？又怎能一定搞出中国式的“巴西”？这就是好比，一块菜地，本无黄金，却非要顾上掏金“别动队”来此挖金，结果是飞机大炮，机枪坦克，狂轰乱炸，掘地三尺，折腾了半天，挖出石油也见不到黄金。所以，我总觉得，“文章家”论理一定尽可能全面一些，种种可能都要有个估计。

四

问题的严重性，也还就在这里。

中国乃泱泱大国也。十三四亿人口，砍掉一半女人，还有六七亿男人（女人足球毕竟不如男人足球更有代表性，姑且这样让我处理一下），六七亿男人中，再砍掉一亿半不能踢球的糟老头，再砍掉两亿左右虽然对足球极感兴趣但绝不可能让他们上场的中年男人，这样，从四五岁到**10**来岁的“小老爷们”也还有两亿多。邓小平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我估计这“娃娃”范围，无论如何也不会逃脱这两亿多的“小老爷们”。两亿“娃娃男人”，虽然在中国不占最主要的比例，比不得天天战斗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农民还有现在天天倒腾东西做买卖的商人众多。但以同样比例对比一切外国（印度除外），我中华大国中可供选拔的踢球“孩子”大概比哪国的总人口都要多出不少。韩国只有几千万人口，可那足球“选手”就让我中华“健儿”格外害怕，日本人口多一些，一亿多，五千多万男人中的极少数“娃娃”这几年也突然有了“很大进步”。巴西、英国、德国还有意大利，这些比我们足球水平都要高出不少的国家，其总人口都没有我们的“娃娃”多。

有此对照，我忽然有了一个足球人才的“配制思想”。我用咱们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的思想以及我的“六比一”的“足球人口”思想，对全世界之足球形势进行划分，真还可以看出不少的问题。如果将之列表对比，就可以更加明确，即我中华大地上“会踢球”者，确实是太少太少。如此这般，真也再次印证那位“面的”师傅的“问

题提出”就是深刻。

请看下表：

表1：足球“第一世界”各国总人口及足球后备人口

（单位：万）

国别	总人口（约）	男人数	足球后备人口
欧洲：			
意大利	5748	2874	975
英国	5708	2854	951
德国	7799	3899	1300
荷兰	1476	738	246
西班牙	3909	1955	652
南美洲：			
巴西	14443	7221	2407
阿根廷	3243	1621	540
乌拉圭	306	153	51
智利	1291	646	215

表2：足球"第二世界"各国总人口及足球后备人口

（单位：万）

国　别	总人口（约）	男人数	足球后备人口
欧洲：			
瑞典	847	424	141
挪威	418	209	70
丹麦	513	256	85
俄罗斯	14800	7400	2467
南美洲：			
巴拉圭	404	202	67
秘鲁	2126	1063	354
哥伦比亚	3024	1512	504
亚洲：			
韩国	4367	2183	728

表3：足球"第三世界"各国总人口及足球后备人口

（单位：万）

国　别	总人口（约）	男人数	足球后备人口
中　国	120000	60000	20000
日　本	12278	6139	2049
澳大利亚	1653	827	276
沙特阿拉伯	1401	701	234
科威特	196	98	33
卡塔尔	37	19	6

五

有人说，没有数据的研究是不精确的研究。我这里列了三表，应说亦可说明某些问题，最起码“有助于”说明某些问题。中国的“娃娃”人数比所有以上国家的“总人口”都多。但足球水平较之多数国家都低。这不能不说是“12亿人口中挑不出10来个会踢球的”吧。

中国如此众多之人口中，“会踢球者”的确是太少。而太少的踢球者中，能达到较高水平者，就更是太少太少。这就是事实。说起来，外国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人，外国人能干的，我们也能干，外国人搞出了原子弹，中国人也搞出了原子弹。可就是中国人没有搞出象样的足球。你想，一个卡塔尔，只有少之又少的六七万“孩子”踢球，居然也能造就出和你中国差不多的足球水平。更何况那个小国不可能会有六七万孩子都去踢足球。我列出的“足球后备人口”只是一种“理论可能”。其实哪个国家也不会有那么多“娃娃”来踢球，不然的话，那还得了，还不让足球把人踢死，把汽车踢翻！

中国两亿后备足球人口，竟然出不来这“十来个”会踢球的“先生”。这无论如何也算个奇特问题。

问题安在？各位文章家、评论家，在慷慨激昂之后，不妨细细想想，兴许里面还有别的原因。如果让我来解答这些问题，我肯定会钻进更为宽广的“背景”之中。然则，这是后话。后话只能留给以后再说。

1997年9月

另一种"国防"

——新时尚，"足球忧患"

一

早有人注意到人的一些基本特性。

比如有人说，人是政治动物（亚理士多德）；人是社会动物（马克思）；人是符号动物（卡西尔），等等。总之，人是有特性的动物。

而在我看来，人是好斗的动物。尽管人也是"爱好和平"的动物，但如果真让他生活在和平年代，天天没有战争，则又会手心痒痒，恨不能操起个家伙和人干仗。即使不能和他打架，也想在嘴上过过"战争"之瘾。这种情况，在男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而对于女人来说，虽然不像男人这样好斗，但也有一些类似的癖好，就是在人前人后极爱唠叨，还尤其好唠叨别人的私事，否则，就不会有中国著名的民间说法，"三个女人一台戏"。这可能就是女人的"战斗"。只是特别一些而已。

好斗的品质，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中国人，也极其突出。甚至丝毫也不亚于他什么阿拉伯人、欧洲人、非洲人、美洲

人和亚洲最凶狠的“日本鬼子”。

中国人的这种“好斗”精神，目前而言，城市居民，尤其为烈。而城市人口中，又特别以北京人最有意思。也许我到的地方不多，也许是其他城市球迷的狂热劲尚未让我把握住“实质”，也许是其他城市“口头语言”或“形体语言”，我还尚待消化。总之，北京球迷的那种劲头，似乎最能反映中国男人好斗品质的全貌，即使不是全貌，也会接近全貌。

这也许是因为北京的政治文化地位，北京的标准语音，北京人的举动略带某种“示范”所致吧。反正，我觉得北京人充当球迷最能反映国人（男）的那种品质。从外地迁京生活的“侨民”，过不上多久，也会学上这种劲头，从而具有一种在我看来就是“足球国防”的东西。你不信，可以到北京所有的大学里看看，那些可爱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外地人”，但没来京三月，就汇入了“京片子”的行列，并扩充着这种行列。

二

国际势力，因其最杀伤性武器的竞争制衡和人性的最终发觉，从而将那50年之久的“冷战时期”结束了。这不能说不是好事。有和平在，把搞军火的巨额经费用在任何一项经济建设上面，都会为老百姓增添不小的实惠。

然而，老百姓不是经济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更不是政治家，他不管什么实惠与否，他不太关心和平以后应干些什么，他只是个老百姓，他要看节目，他要娱乐，他要发泄接近本能的攻击性，他要在体育场消耗体内太多的脂肪，他要减肥，他要追赶各种时髦，他要过一种自认为“幸福”的

生活，他要在电视机旁消耗太多而无聊的时间。

于是，老百姓，尤其是城市里的老百姓，第一个在这“冷战”结束之后，开始了另一种不甘寂寞，在那不大不小的足球场上开始了“游戏”的“热战”。

中国人经过**20**年的努力，虽然口袋里终于有了些钱，但这些钱尚不足使大家轻松自由到国外度假和消费。即使最爱看球的男人，即使他再有钱，也不会时时刻刻到英国、德国和巴西去亲眼观球过瘾。可以较为客观也较为负责地讲，中国人的体育消费大多数还在国内，中国最纯粹的球迷，其精神上的“得与失”、“满足与否”，大多数也在国内。

中国人的足球水平如此之普通，如此之不太丰富多彩，照理说，球迷们想看球，看看就行，看完拉倒，说说而已。完全用不着那样一蹦山高，那样一惊一乍，那样大动肝火。反正像我这样的男人，现在是这种想法。莫非，我及其和我类似的男人就不是合格的中国男人？

可大多数中国城市男人，不是这样。他们不愿意面对中国足球而无动于衷，特别是面对中国队是否能够“出线”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雄性公民们，那种好斗的自然品质，立马就变成了一种极其庄严，意义非凡的“国防意识”。

中国人，面对足球，之所以如此狂燥，在我看来，原因特别。你如果说他是因为纯粹喜欢足球而如此，那也许完全将之归错了类。中国男人没有纯粹球迷，都是些具有政治品质、社会意识、团体责任的家伙。世界上有没有“纯粹球迷”(即不带地域偏见，不带感情色彩，完全是欣赏球技，甚至能天天欣赏“敌人”球技的那种球迷)，我不是体育社会学家，实在是不好回答。但在中国则不会有这种球迷，因为如

果有了这种球迷，他就不会“狂燥”，他就不会出口不逊，他就不会骂骂咧咧。如此足球小事，倒也让我想起一种文化大事，即为什么中国极少有“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大概也与中国人的某种性质大有关系。

中国人从不把文艺之类的“文化”当作纯粹的“艺术”，而常将之当做“有用”的工具，去服务于某某目的。鲁迅虽说过魏晋南北朝曾经诞生过诸如曹丕、曹植、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式“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艺术家，但大多数时期，中国的文化人，都缺乏那种“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的精神，更多的都是“现实主义”艺术家，都是将艺术当做另一种东西，即门面与饭碗。考察了中国的球迷，仿佛这个文艺现象也在此得到了解释。即中国的“家国”思想过于强大。现实生活之紧迫，容不得大家如此充裕，细品球技，来当什么“纯粹球迷”。

三

中国球迷的这种特性，可能是来自一种现实的“压力”。

那就是中国的足球40来年，一直未能出线。

外国人是人，中国人也是人，中国的足球不能出线，不能到最高舞台上表演球技，自然会引出无数个“心烦意乱”。这烦恼就是中国人因其足球水平之低，而可能被别人误以为“猴子”，矮人一等。

如此这般，怎能不激发中国男人的“国防意识”?！于是乎，只要是比赛，只要是中国足球争夺出线的比赛，那种“国防意识”不用政党号召，不用街道老太太动员，不用机关里的支部书记喋喋不休，不用爹妈妻子孩子兄弟等苦口婆心，

自然而然，油然而生，仿佛有奸毋杀父之仇敌来犯我家，我不战斗谁来战斗，我不出征，让谁出征！中国人的团结，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仿佛才能“自觉自动”，而绝不再是“一盘散沙”（孙中山语）。

中国的球迷有好多优点，就和他有好多缺点一样。不管是优点还是缺点，都是让现实被逼迫出来的。如果中国队得世界第一，老是跟玩似的，大概这种情况就不会产生，也就没有了那种焦躁和不安；年轻的小伙子也就再不会夜不能寐，食不知味。相反，大家会表现得格外休闲，格外大方，尤其在自己赢得太多时，总会自觉主动为对方也“加他一油”，弄不好还会觉得赢得太多了很不好意思，而故意输输对方，从而显示中国人之乐于“照顾对方情绪”。就像中国乒乓球队老赢别人，弄得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于是乎也就不再拼命地鼓掌，更不会搞什么狂欢。

因此，可以断定，中国球迷如此之神经兮兮，完全是事出有因，是因为大家太爱自己的足球，太怕别人的足球，太希望自己的足球能“滚”到国际舞台。

久而久之，中国的足球迷们，似乎都有了一些病症，即心眼开始变得发“小”，“小”得容不下失败，见不得别人踢好。即使是国内甲级联赛，也不能安身，动不动就要欺负对手，不是扔下瓶子，就是投掷石块，省与省的比赛也成了国与国的比赛（很像是古代的“春秋战国”）。焦躁、狂妄、不宁、骂人等极不文明极具攻击性的行为尽于言表。

足球是和平年代的战斗。人们爱足球就是爱战斗，进而也是爱自己。但如何爱好，则是一个都需反省认真总结的社会问题。

和平年代，营养充分，小康人家，大谈足球，大爱足球，全民皆兵，球胜国胜，球败国亡，这仿佛就是球迷的想法。

四

说来惭愧，我在京城混着生活也有十多年的“历史”，却从未到现场看过一场足球，怕的不是买不起票，也不是没人送票，而实在是受不了那种刺激。尽管是这样，我却常常能见到从场里走出的各路球迷，也经常遇到过马路上发表高见的二等球迷，或骂此脚法不灵，或诋彼意识太差，或曰那不成，或说这不行，总之，只要是输了，什么理由他都能想得出来，什么话都能从其嘴“片子”里蹦出。如此这般，活像那“厄尔尼诺”天气时期，满街的男人在路灯底下看人下棋，下棋者均有修养，基本上能做到不动声色，而观棋者个个没有修养，总是摁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离着老远，献计献策，胡乱支着，或让上马，或令出车，或让谋卒，或命动炮，一着急自己上去，竟敢动手，挪车动炮，代人下棋，仿佛“观棋不语”只是说给别人。下棋者不知所措，让他上场，他却要么自谦不行，要么走不了几步，比别人更臭。这就是中国的棋迷，但我从这些人身上，自然想到了咱们的球迷。

我时时想，球迷如果真成了北京城马路边上的那些支招儿棋迷，准保完蛋。身无章法，却敢乱点鸳鸯谱，说东道西。这样的球迷，大概是除了两扇嘴片，就再也没有其他。找乐找到这种水平，那肯定是低层次的瞎乐。

问题是，北京有这样的棋迷，其他地方又如何没有这样的棋迷？

有这样的棋迷，自然会有同样的球迷。

这样的球迷，虽然处处充满着激情，时时有一种足球“国防”，而且是只能赢不能输，赢了狂妄，输了骂人，但如此这般，实在让人不得不想到与此稍有关系的问题，即八国联军进攻中国时的“义和团神勇”。

“神勇”抗敌，自然是可歌可泣，但在敌人未来时，硬吹自己之“神功”如何高明，如何刀枪不入，而真见了打枪的洋鬼子，却个个逃跑，不敢出阵，再不露神勇。这就无论如何属于“无知”＋“吹牛”。精神再高，手无办法，还是抵挡不住洋人“默不作声”的进攻。中国球迷如果成了“义和团”，精神虽然仍佳，但办法得不到赞成。

最好的办法，我以为，还是要理解足球，学习文化，从研究入手。最好是当一名鲁迅所说的那种“不笑的看客”。然否？

1997年8月

在"球迷"背后

——中国足球与中国文化

一、"球迷"之我见

世界不能太平。一太平，世界上的雄性公民便找不着感觉。但是，世界也不能有战争，一战争人类那点极其脆弱的文明又会被大胳膊大腿的男人彻底断送。

于是，人类必然要为这种既不战争又必须战争的局面发愁。好在人类是一种聪明的动物，是一种会想办法的动物，终于还是想出了办法。那就是"战争游戏"。

有了"战争游戏"，这些以战斗为生的雄性公民也就可以"安身立命"，也就有了发泄和宣扬自己生命本体的所在，也就有了检验自己是否还算男人的标尺。

其中，那个圆圆的足球就是最好的一种"战争游戏"。世界上的球迷之所以多是男人，道理就在这里，就在于男人不能闲着。世界上所以又有了越来越多的女球迷，那是因为她们最爱英雄。对于女人来说，没有了英雄式的男人，她们活着比受罪还要难忍，比死了还要痛苦。于是为了能爱英雄，她们才走上了看台。女人并不真正喜欢足球，它们只是狂爱踢

足球的那些“先生”。在中国就是那英热爱高锋。

这可以说就是当代人类的一种有价值的“生存”格局。而且这种格局最好不要和什么政治经济联系起来，一联系起来，就显得极其没劲，仿佛沉重的链锁把个有血有肉的汉子套得很紧，生硬的教条把个活生生的足球文化弄得没了底蕴。

我本人所以还愿意写点足球文章，就是从那不声不响的“球迷”背后看到了一丝“民族”的“真情”。而且我觉得，多挖掘点这种民族的东西，似乎对于足球也没有什么不好。说不定对于广大球迷来说，还有些微小的“知识”益处。于是乎，我就又有了这篇文章。

有足球在，便必定会有球迷在。足球只是“表象”，球迷才是“内涵”。我作如是观。解开了球迷之谜，似乎才好解开足球之谜。

我每观足球，便有感觉，中国的球迷越多越好，多到了全是球迷，中国就有了另一种希望。因为球迷代表着民族的生命与“力量”。

指不定哪天，中国的“民族性”、“劣根性”、“传统性”等等，真还要被这天天呐喊的球迷所彻底改变。

想到这里，我为球迷呐喊，我为球迷呼唤。

这又从何说起？这些“不务正业”（某些人对球迷之批评语）之辈，竟会起到如此作用？

而这就需慢慢说来，从球迷说起，从历史说起，从足球与球迷之背后说起。

二、话从这里说起

从世界球迷到中国球迷都有很多问题，而且有时问题大

得简直难以形容，简直快大到了“害马”的地步。集中起来而言，其问题就是球迷脾气太不好，极易膨胀，太容易发脾气，常常控制不住自己的理智。我对球迷的态度，因此也简直就像好女人找了个坏脾气的男人，你说他坏，不对，他疼起人来，简直是“头上长疮，脚下流汤”，可谓举世无双；你说他好，他脾气就像是炸药做的，稍有不顺，立马爆炸，鸡犬不宁。

这就是球迷，他浓眉大眼，他英俊潇洒，但他也张牙舞爪，声嘶力竭，吹胡子瞪眼。他像人，又像兽。艺术点形容，是人与兽的“合金”。

关于球迷的这些问题，最起码是中国球迷的问题，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经专门讨论过（可参阅我之著名的《球迷爷爷，得罪您了！》一文）。

然而，也应该看到，球迷现象绝非偶然。球迷除其不足外（然则哪个人就一定没有不足?）她还反映着另一种东西。这些东西，几乎无人注意，但这些东西极有价值，她几乎浓缩着民族的生命，她就是民族力量的另一种体现。只是这种力量极其隐晦，它几乎是一种“无意识”的现象，非得专门讨论而不可。

而这就不得不将“球迷”与“民族性”联系起来讨论。

体育与“民族性”有何关系，对于大多数球迷来说（尽管他们本身就是“民族性”的具体体现或表达），他们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似乎只有那些搞历史的老学究和某些爱“出奇语”的高雅人，才会有些兴趣。然而，其他人不感兴趣，不等于不存在事实。我就深深被球迷的各种“热情”所感动，我也悄悄从球迷的“呐喊”声中，体味到了另一种东西。于是，

我大胆冒充一回“文章家”，写下此文，非有某些东西叙述而不可。

三、“文弱”中国

中国人，给人之印象，似乎就是“不争”，最起码在这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总是这个样子。正因为这种不争，中国人才又格外“礼貌”。因为中国一位姓孔的圣人及其弟子，他们的教化，就是要人“知礼”。由于“知礼”是中国人生活中的必修课，于是，只要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第一堂课便必然是让孩子“听话”，进而就是“服从”；最后一节课还是“听话”和“服从”。据说，有了这两种功夫的孩子，才会成为合格的“好孩子”。然而这种教育极其难以实现，要实现就非得下大功夫而不可，这样就需要“读书”。

中国古代的教育，之所以还算发达，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为了“科学”（中国古人没那个爱好，有谁不信，可读近期新上市的《哥德尔》一书，作者是著名华裔科学家王浩，里面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很有道理），也不是为了“哲学”（这个问题，可参考同时期的希腊，中国人读书的态度与之不同），而主要是为了“作人”和“当官”。因为作不好人，就成不了“公家人”，自然也就不能生存，无法“立命”。

中国人之所以特别强调“安身”和“立命”，道理就在这里。读书的重要性，自然也就在这里，只有读书才能“安身”，进而“立命”。

所以，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书”是非读不行。书读得越多，这种“知礼”也就越是像样。所以中国人，几乎是世界上“最爱读书”的民族。但中国人读书与希腊人读书不

太一样，希腊人读书是为了“好奇”世界，并提出各种问题（最起码古代是这样），而中国人读书则不是为了好奇，而是为了掌握“礼貌”与“规矩”的各种知识。读懂并掌握这些书籍实在是难，因此大凡读懂了这些书的人，最后也就真成了“书生”，再最后也就成了“文弱文书”。

中国人之“不争”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国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软弱，就没有骨气，而实在是孔孟之道及其原始氏族血缘机制的那些东西，把这个民族死死地害了个够。最后就变成了“不爱战争”、“只爱和平”的“好人”。“不争”和“爱好和平”不一定就是坏事，但因此而丧失了民族的“活力”，这个民族无论如何是到了“危险”的地步（我这里绝非唬人）。

四、先秦，“有兵”之国

如果大家对历史真有些兴趣的话，对上古史做些讨论，兴许就了解了咱们祖宗当年的“风采”。中国人原本是个好战的民族，而且是在世界上杀出了名堂的民族。中国的“战国”就是因“天下混战”而得名。其实中国的“好战”又何止是从“战国”开始，比之更早，中国人就开始了战争，只是到了“战国”时代，各种战争达到了“无以复加”之“彪悍”地步。

梁启超曾说，春秋战国，中国大地，约有上千个小国（其实是“氏族”）在进行着各种战斗。只是到了最后，才形成了“战国七雄”，以至到了秦汉，中国大地，才算是第一次出现了“统一”。

战争不是什么好东西，因为它的恶果就是“死人”，就是“人头落地”，就是“家破人亡”。然则，战争也是一种好东西。

中国的大多数智慧，恰恰是在这个混战的年代里产生。孙子兵法不可谓不是中国的绝大智慧，“老子”不可谓不是中国人之高妙智慧，《周易》不可以不谓中国人之智慧，所有这些，无一不是诞生在那个战争的年代。孙子以辩证法的态度审视了战争；《易经》从男人及阳刚角度弘扬了战争及其进取；“老子”则以女人及阴柔方面解释了“柔可克刚”。

这些古老的中国智慧，至今都有极大之价值，商人、兵家、哲学家、政治家、历史学家甚至艺术审美无不深受其重大影响。

春秋战国，“士”如林立。这些“士”首先就是“战士”和“兵士”，然后才是“文士”和“儒士”。当年的中国人，是个男人就都是这般奇特，个个英勇善战，人人巧舌如簧，“说客”满地走，“谋略”握在手，文章满天下，一心为战斗。他可以杀人，也可以自杀。日本的“武士道”全是跟中国先秦古人学来的，就像体育中的“相扑”也跟中国学来一样。现在有些孩子特别稀罕日本人的“切腹自杀”和“武士道”精神，其实那些东西首先产生于中国。后来中国人嫌它太刺激，不合礼教，就将之悄悄放弃，结果我们的中国孩子反倒羡慕日本人厉害。说白了，日本人什么都不会创造，只会模仿。连“武士道”都是模仿中国人的产物，更不要说他今天的什么汽车和电器。

有谁不信我们祖宗之如此风貌，可以好好看看《史记》。一部《史记》可谓一部“战争的史诗”，里面全是中国人的生命、英雄和力量。在我看来，读《史记》犹如看足球，看过让你过瘾，让你舒筋活血，让你肠胃通气，让你筋骨有劲，让你的拳头痒痒，让你只想找个什么东西狠狠揍他两拳。总之，

《史记》一部，犹如好药一副，好酒一壶，让你吸进战士的英勇，吐出病夫之毒素。

如果有谁，嫌读书困难，觉得读《史记》太费功夫，则可直接到西安临潼，看看秦始皇的“兵马俑”。秦始皇墓中摆放着如此众多之“兵马”，绝非为了“故弄玄虚”，让人眼晕，让后人觉得很有“艺术”效果。而是“实话实说”，这就是秦始皇他老人家当年的“国情”。秦国者，统一中国之大国也。

先秦及其秦代，中国人就是这样，非常好武，可谓“战斗民族”。

冯友兰曾说，唯一可与孔子一派抗争的墨子一派，虽高唱“兼爱”和“非攻”之调，但却是地道的“武斗专家”。

由此可见，其他派别之中国人，自然也爱打仗。

中国人爱打仗，所以，也才有了各种“智慧”。

我一向喜欢的英国佬罗素也曾说：战争与商业是推动智慧进步的力量。

我甚觉在理儿。中国人的智慧就来自古代战争，而非其他。

秦汉过后，由于文弱，中国人哪还有什么世界级的智慧？除了磕头捣蒜，再也没有。

五、孔孟，“无兵”之道

不知怎么搞的，有了中国之大一统，反而有了不小的问题。秦汉以来，也不知道当时那些当家的皇上和臣相怎么想的，突然间看重了一个孔老二，硬是把秦始皇坑过的“孔孟之道”(必须指出，孟子是在唐代由韩愈的高举才成为“亚圣人”的，汉代以前他没有这个地位。)举得老高老高。孔老二

学说，自从成了中国人的《圣经》，中国人便开始天天“磕头”，本来非常硬朗的双腿，变得像是得了软骨病，硬汉子也开始成了陈独秀说的“手无缚鸡之力”之徒。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就是中国两千年软骨症的历史。

漫长的封建社会，虽也有这样那样的战争，但战争基本都是来自“外国”，来自蒙古高原上的野蛮人对我华夏侵略。如此这般，中国人只能招架，只能进行自卫战争，却不能发动一场像样的“侵略战争”，更无能征服他人之领地。中国人中了孔孟之毒计，从而也就“不争”，中国人自从读上了“知礼”之大书，天天在家开始了“磕头捣蒜”之“文弱”生活。

中国有封建社会，却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大异其趣。欧洲人在500年的封建社会中，不仅没有学会“磕头”，反而培养了“骑士”，缔造了为女人、为爱情和为财富而决斗的各种男人。欧洲的“贵族”是“决斗”的贵族，而不是中国式的那种会“磕头”，会“作揖”的文弱贵族。

孔孟之道想以“道德”立国，结果拒绝了“武力”。于是乎咱们中国人，硬了嘴巴，酥了骨头，多了“春秋大义”，少了“射御兵斗”，最后也就多了各种“文弱”。

忆不远之当年，李鸿章到英国作国事访问，英之大臣为他亲自进行体育表演，打了半天篮球，表演完毕大汗淋淋，来到李鸿章大臣面前，本想讨个“表扬”或“夸奖”之好，可我们敬爱的李大人，大摇其头，连连感叹（大意）：“这种出力的事，干吗非要自己去干，雇个人给你跑跑就行了，何必这样！”

清朝大臣如此，其他朝代的“贵族”又能好到哪里？

中国的贵族，连体育都害怕“跑”得“出汗”，哪还能缔

造出什么足球。某些过于“爱国”的体育史学家，在考证现代足球之起源上，硬要说现代英国足球来自我堂堂中华。这种说法，我总觉得除标榜其莫名其妙之“爱国情绪”外，就是十足的瞎扯蛋。

中国古代，虽有高俅式的宋代足球，但绝没有现代足球的这种“力量”，也未有今天的各种球迷精神，当然中国社会中也就不会有费孝通老先生鼓吹的英美式的“sportsmanship”（光明磊落，运动家风度），也没有朱光潜在英国所深受感染的“fair play”（公正比赛）。如果唐代也算有某些“球迷”的话，这些球迷不是恶霸就是嫖客。可悲的是，到了大宋以后，连这种恶霸与嫖客式的球迷也都再不存在。

中国人自从进入那个著名的封建社会，就开始丧失了生命，就成了小胳膊小腿的一种。甚至男人之性欲也开始倒退，某些恶霸式的男人，多占了不少女人，可体力不争气，只好求救于医生。医生为此发了些小财，于是乎，编造了各种著名的“房中术”，传授并教育近乎嫖客的男人如何“坚挺”。

中国之男人，自从离开了战争，就变得格外可怜和窝囊，很难“坚挺”，如果还有什么“坚挺”的话，那也多在文章里面。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地地道道的“文章”社会。笔杆子要得好，但细了胳膊瘦了腰。真是悲剧。

六、唐代悲剧：繁文缛节

也许有文章家，觉得我的言论有误，甚至会举出唐朝之“辉煌”来论证中国人之“威武”。如果是这样，那么正好我可借着这个问题向大家摆摆我的另一番道理。这也是我多年想说而未说的话题。因为多数体育史学家多认为唐代是中国

最“厉害”的“武”社会，自然也是最厉害的“体育”社会(最起码是之一吧)。

我承认唐代在中国有了不起的地位，武功也不错，体育也还行，毕竟有“马球”这等从回民那里学来的所谓“体育”。

可我一直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这种强大的“武功”及其体育，不能自觉转化成希腊式的那种体育，不能主动变成欧洲式的各种运动会?

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简单的体育问题，甚至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与“民族行为”的问题。限于篇幅，我这里只举一个小例，足可证明，是什么东西拖了中国男人的后腿，让中国男人不能借着唐代“力度”创造出真正的“体育”。

唐代，由于是李家李世民的天下，相对来说，较为开明，对道教比较重视，“吃药”与“喝酒”之事，依旧风行(相对于鲁迅说的“吃药”与“喝酒”的那个“魏晋南北朝”时代)。但是，儒家的思想文化毕竟早在中国扎根发芽。于是，即使唐朝这样“开明”且“道家”的时代，儒家的那种“繁文褥节”还是相当厉害。即使简单的一个“姓名”问题，就有许许多多的“避讳”。“避讳”使中国人姓什么叫什么，都得处处小心，时时在意，稍有不慎，就是终身遗憾，甚至大祸罹身。

有史书表明:“唐人避家讳甚严格。诗人李贺父名晋肃，他参加进士考试，因‘晋’与‘进’音同，即有人指责他犯讳。韩愈曾作《讳辩》一文为之辩解，《旧唐书》竟以韩文为‘纰缪’，当时之众议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当时的唐朝，虽

然“潇洒”，但很拘谨，极不“公正”，很不“现代”，根本没有产生体育和“足球”的各种文化可能。

再看一例。“《唐语林》载，有崔殷梦者知贡举，另有一叫归仁晦的人来应试，因为殷梦父名龟从，‘归’与‘龟’音同，归仁晦竟不得登科。”（以上例证均来自《中国人的姓名》一书，中国社会出版社，63页，64页。）

为什么说一个简单的姓名“避讳”问题，就不可能自动产生出“足球”以及“体育”这样的文化？因为“避讳”是一种氏族式的血缘产物，是典型的“孔孟之道”的必然现象，是“等级制”，“非平等”，“无法制”的中国文化。也就是说，中国人自古重视的就是“血统”，像李贺这样极有天才的年轻人，由于父亲的姓名上有了某种与他人“相讳”之处，竟惹得有人指责他为“犯讳”。这样的人，如果来踢足球，可想而知，应该是什么结局吧。“避讳”都不让考试，怎还能来踢足球？

所以，中国无足球，也没人来踢足球。因为两者的产生似乎都属违法，不合乎儒家的“道统”。

“避讳”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小小方面，但已经暴露出了中国不可能有自觉的“体育”和“足球”（那时的中国已经有了类似于足球的“蹴鞠”）。

然而，这还只是唐朝。除了唐朝，中国的哪一个朝代又不是这样？

可以说，从古到今（民国以前），中国的历朝历代都有“避讳”现象，都有严重的“等级制”，都有强大的“不平等”，都有各种“私家规定”的非法制、非社会、非文明和非现代的东西。

何况除了家中姓名之小小“避讳”之外，则有更严重的“礼仪”教育和“知书达礼”。有了这种“无兵”的文化，“静敬”的教育，“听话”的礼仪，“磕头捣蒜”和“下跪作揖”的中国文化，哪个中国男人还能再有“野力”，哪个还能再有朝气？没有，绝对不会再有。

所以我常说，中国的历史中，不可能有“自觉”的体育，更不可能有什么自觉的“足球”。足球的问题实在是一个后来的问题，是一个“近代化”的问题。中国人能喜欢足球和各种体育，无论如何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反动和颠倒。

但这些否定、反动和颠倒，不是要把我们的祖先骂倒，而是将其子孙的性格进行重新塑造，多一些力度，少一些羸弱。与其让孩子天天吃各种“补药”，不如让小家伙到野外好好锻炼。批评几句古老的“补药”，赞美几句野外的锻炼，又有何妨！我作如是“否定”观。否定是为了进步，是为了更加爱护祖宗。

如果大家同意我之观点，我为之甚感欣慰。自然，我为之写文呐喊。

七、坏爸爸坏妈妈

人性总是一样的。是个孩子，生下来就都有其大概相同的品质。这无论在生物学上还是在心理学上都是不易之事实。

然而，为什么同是孩子，长大成人，却变得如此不同。原因就在“教育”，就在“文化”。虽然中国的文化瞎了眼，选中了孔夫子这样的“文化人”，但孔夫子毕竟离我们太远，他本人不可能去教我们每一个人。教我们的第一任老师不是别人，就是我们最近的亲人：父母。

如果承认“文化无意识”和容格之“集体无意识”等高妙理论的话，我倒觉得我们的父母就是地道之“孔夫子”。我们的父母之父母，高举着他爷爷奶奶那种孔夫子式的“口训”和“教条”，代代相传，世世因袭，教会了自己的孩子如何磕头，如何作揖，如何读书，如何知礼。中国男人骨头之变软，欧洲男人骨头之强硬，都取决于各自之父母。欧洲的父母是海盗，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海盗，日本的父母是“武夫”，他们的孩子也就格外“好战”，中国的父母是“孝子贤孙”，我们的孩子自然也就是“孝子贤孙”。

这不是“血统论”，这也不是“遗传论”，这是起码的教育观、文化观和环境观。中国的男人如此之背叛了先秦时期的那种“好战”品质，抛弃了燕赵悲歌之性格，难道是中国人的遗传基因有了“突变”？非也。而是中国的父母接受并传播了孔孟之道。据我所知，“儒学”之“儒”，就是“软弱”的意思。有谁不信，可以看看胡适先生之大文《说“儒”》，也可看看郭沫若之《驳“说儒”》。他们两人可以互相攻奸，但在一点上相通，即“儒”者“濡”也，都是“软弱”的意思。在中国，连“软米”都叫作“糯米”。在古文字中，“糯”、“儒”等各种带“需”的字，都有“软弱”的意思。“儒家”之儒，虽也大讲“刚健”和“有为”之类，但这种“讲法”，倒更像是“口号”与“召唤”，并不能彻底排除掉骨子里的“软弱”本义。

有如此之“文弱”（甚至“儒”弱）之老爸和老娘在，其孩子断乎只能是跟着大人“磕头捣蒜”，别无选择。

中国足球之所以如此举步为艰，我总觉得与我们父母们不自觉的“孔孟”式的教育有着必然联系。为什么我们的孩

子足球总是踢得如此之好，就连贝肯鲍尔如此傲慢之德国家伙，来京签名售书看了北京娃娃之足球，也不得不佩服孩子之灵气与天才（可参阅《中国体育科技》**1997**年第**4**期内的专稿）。可为什么我们的这些孩子一旦长成了“大人”，反而再踢不出“天才”的足球？这分明不就因为“成人”而背叛了“人性”?

中国的“长大成人”，是以能否被社会所接受为基本标准。一个孩子，想要变成“大人”，他的第一关就是要与“大人”看齐。而“看齐”首先就得接受父母式的“孔孟之道”。要有“眼色”，要会看“眼色”，要知道什么叫“深浅”，要识“抬举”，要识“大局”，要处处“小心”，要事事“谦虚”，要时时“谨慎”，要注意“文静”，要懂得“中庸”，要不随便发表意见，如此等等，这就是我们的父母对孩子的教育，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变得终于“成熟”。

如此“成熟”的人，固然格外“成熟”，但却踢不了足球。

这道理用不着我说，几乎是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有敏锐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看到了问题。即使到了本世纪初，也有一个年轻的后生在高声“呐喊”，此人非别，正是作了“新中国”统领的毛泽东。他在《体育之研究》的开始，面对孔孟，面对国情，不是歌颂，而是指责，而是控诉。他说：“国力荼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此“可忧之现象”来自于谁？

来自于我们的社会，更直接来自于我们的父母。

父母照着孔孟式的“圣经”，教会了孩子“读书”，自然也就成了“文弱”。

如此这般，必然“可忧”。

八、感谢"五·四"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有勇气将自己的弱点暴露出来，这是最伟大的谦虚。近代中西比较，终于让中国人知道了自己的不足。于是一种对历史的检讨，开始在中国爆发。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五四"是反封建运动，"五四"是新文化启蒙运动。

正是有了"五四"这样的文化运动，才有了后来的一系列体育运动。中国人自己并没有什么体育。气功只是黑夜睡觉，白天接着睡，虽有修身养性之美誉，但总嫌昏昏沉沉；武术虽属国术，但不能充当呼唤"国力"之体育。中国人为了强种，只能引进"兵式体操"，进而就是学校里的全面体育。

有体育的引进，有体育的生根，便有了中国人之希望。

一种叫做"尼采哲学"的东西，作为一种德国式的精神，也开始在中国传播。有趣的是尼采恰恰是"泡尔生"的朋友，而"泡尔生"恰恰是给毛泽东以极大影响的德国伦理学家。很难说毛泽东的思想中，没有尼采的影子。尼采的思想，在于呼唤一种"超人"，一种具有原始生命力的民族。

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先驱如鲁迅和郭沫若都对尼采大感兴趣。鲁迅呼唤"立人"，郭沫若鼓吹"狂飙"，且自己还起了"尚武"这样的名字。

其所以如此，并非他们硬要去赶什么时髦，而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严重问题。这种问题就是中国的"孔孟之道"如同最强力的"安眠药"。鲁迅不提倡年轻人读古书，特别不提倡读中国的古书，都是因此而有感而发。

中国的"五四"运动，第一声呐喊就是"打倒孔家店"。

不打倒孔孟之道，中国年轻人，断乎没有生命力。这种孔孟之道，不管是汉儒还是宋儒，也不管是明清之儒，都有“软弱”之毛病。

球迷朋友，看到这里，大家亦该明白，其所以大家成为“球迷”，相对于“五四”之前，我们是多么的“伟大”。我们终于告别了那个“磕头捣蒜”的年代，终于告别了鲁迅批判的“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的岁月。你们呼唤着“胜利”，叫唤着“成功”，呐喊着“射门”，希望着“进球”；你们摇着小旗，你们吹着喇叭，你们光着膀子，你们蔑视权威，你们为英雄“加油”……

所有这一切，要是在明清，要是在唐宋，那还得了。你们的家长，你们的祖宗还不狠狠扇你两个耳光?! 因为这样的举动，根本不符合圣人之教导，不符合“仁义”的规范。

有此感慨，我常常想，如果没有“五四”，如果没有中国的那场“新文化”，如果没有中国人真正承认自己之不足（严复自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等），如果没有将西方的体育引进中国，如果肚量小点，只引进“兵式体操”而拒绝了足球，“球迷”一词大概还在娘肚子里等待着他爹授精！

九、足球是文化

我所写的足球文章，之所以从不去写什么技战术之类的东西，重要原因就是我不愿将足球看得太小，只是在那不大的足球场上滚来滚去，谁赢谁输。胜负固然重要，有时重要得胜过了政治经济。然而，那些胜负毕竟只是“游戏”范围内的东西。高级球迷似乎早不能满足于单纯的胜负输赢。

我想把足球写成文化，写成“学问”，写成“生命”，写

成“意境”，于是乎就有了一系列的“土壤分析”。

足球是“游戏”，而且永远是“游戏”。但这种“游戏”的背后却有着非同儿戏的含义。多数足球文章“家”们，从不谈这个问题，只是在那报纸电视上“指点江山”(甚至乱点江山)。如此“纸上谈兵”，真可谓“技末小道”，喋喋不休，把一个活生生的足球，说得生硬刻板，死气沉沉，充其量也就十来个人，在场上跑来跑去，踢来踢去，进球多少，得分几何，仅此而已，实在没劲!

什么是足球？在我看来，极好回答，那就是双方各出十来个人，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想尽办法将球滚进对方的门。如果只从技术战术角度讨论，足球的秘密还能再有什么？

然而，对于“家”们来说，更重要的不只是这些，还应该在更广阔的方面。为什么一个小之又小的圆圆足球，就会有那么多人来爱，而且爱得死去活来？为什么中国这样本来羸弱至极的民族，突然变成了欧洲人第二，爱足球竟然毫无商量？这种“爱”，这种“狂爱”的背后是一种什么力量？中国如此之“疯爱”足球，是对固有文化的否定还是肯定？如果我们的民族拒绝了足球，那又意味着什么？

这兴许才是问题，才是足球的文化，才是足球的“学问”(如果承认或极想承认的话)。我总感觉，把足球“念”成“学问”，比将之“视”作技术，无论如何也要高明，我们的脑袋因此而显得才算没有白长。

可爱的球迷，我们补上这一课吧。

有了这一课，我们就不只是失败后的“困顿”和胜利后的“疯狂”。我们就会时时刻刻想着更多更多的问题。有问题在，就有哲学在。常有些人，特爱高明，动不动就要乱嚷

"哲学"，显得自己如何矜贵，殊不知哲学不在于"教导"别人，而在于提出"问题"。问题是哲学的命根子，也是我们大脑的本钱，也是思想"深刻"的敲门砖。

以上这些，就是我的足球企图。也许我的文章，会激怒一些"家"们，但我自信会赢得球迷的鼓舞。我早已知道，你们在等待什么，你们渴望着什么。有你们在，有你们的"反传统"在，有你们渴望"生命"的劲头在，我的文字自然会化成你们的"口舌"。

十、球迷是"生命"

我偏激地认为，中国多一些球迷，比多一些戏迷要好。

看戏固然可以培养"雅气"，但不足以提高"生命力"。尤其是多看了"才子佳人"式的古装戏，就更是让你变成梅兰芳，是个男人也让你雌掉一半，虽投手举足，款款殷殷，有板有眼，但终不免"呔呔咦呔咦呔呔"的那种拿腔拿调，矫揉造作，脂粉气扑鼻。

足球就大不一样。它是什么？它虽然什么都不是，但它却什么都可是。它首先呼唤着男人的神经，调动着男人的筋骨。是男儿，血气方刚，和平年代不能战死疆场，但也要在这"假想"的战场上练练筋骨，过过战瘾。不会打架，不能打架的男人，近乎于废人。这样的废人，自然也就不爱足球。女人较之男人所以不爱足球，就是因为女人近乎残废的男人，没有战争的神勇和牺牲之企盼。

是故，足球必然是男人的运动。踢球最过瘾者是男人，观球最起劲者仍是男人。衡量一个国家的种族是否优良，其标志只在检验你的男人是否勇敢，而女人则可以忽略不记。女

人的价值永远在于给国家和民族生出什么样的男人。

我常以为，虽我中华，劳其心志，终使大多数人有了温饱，也使不少人之体质有了明显改善。然则，我们之“弱”疾形象，却也不应忘记，而且应该牢牢记住。某种情况下，“弱”病它还相当严重。我们广大农村的孩子，至今还不能发疯地狂爱足球，他们看不懂足球，甚至不知什么是“越位”，他们的温饱困绕着肚皮，没有“剩余精力”（斯宾塞的“游戏”基础）来投放足球。

我们所谓的“球迷”多是些“城市”里的孩子，他们仅仅是少数肚皮充实者和精神向往者。球迷的队伍扩大，才能最终改变我们的形象。进而也才改变我们民族之“本体”。

球迷最不自私，有多少青春，有多少激情，有多少体力，他（还有她）都会一五一十“呐喊”出来。球迷，绝大多数球迷，基本上不会踢球，他只是在那小小的圆球的飞舞中，拚命地检验自己的生命力是否强壮。

球迷与其说是看球，不如说是在观看自己。看自己是否属于强者，是否属于男人，是否属于强壮的男人。

中国这样一个曾经长期文弱之大国，有足球运动在，有如此痴迷足球的球迷在，我以为中国无论如何也还有些希望。如果中国没有了这些球迷，没有了青春与激情之叫唤，那断乎是接近完蛋，犹如一个见什么都不兴奋的老头，算是走入了“歇菜”胡同。

中国的球迷现象，实在是对中国固有文弱文化的积极反动和有声反抗。

如果再能把这支球迷队伍武装上尼采的“超人”，鲁迅的“立人”和毛泽东的“野蛮”，我以为中国之种，就算是真正

有了强大。

…… ……

球迷，你好。真让人着迷。

在中国，小个子四川人，最懂足球，他已把足球之秘密看透，每每“呐喊”，不像“京片子”那样笨拙只是喊个“加油”，他们却高喊“雄起”……

每当我听到四川人高喊这个“雄起”，每当我看到四川的那支“雄起”足球队出场，我的心就颤动。因为足球太需要“雄起”，中国人太需要“雄起”。

既然如此，我们怎么办？

就让我们跟着四川人高喊：“雄起”。

小个子，最希望“雄起”。

小个子若能“雄起”，那一定都是英雄，一定都是拿破仑。

1997 年 **9** 月

中国足球问题之困境

——关于民族与足球的思考

一

中国人喜爱足球，这早已是不争之社会事实。否则，就不可能有那么多球迷，就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关足球的报纸和杂志，也不可能会有那么多的足球电视观众。当然也就不会有诸如**80**年代的那种“**5·19**”式的“充满激情”的社会事件。

正是有了这种“喜爱”，中国的足球发展，虽其水平不高，但其“社会化”程度，“产业化”程度，以及商业操作水平，却在中国的所有体育项目中，最先达到了“最高”。据一位高级体育干部亲口对我讲，仅**1996**年一年，国家投给足球的经费虽只有两千来万，但产出却达到了两个多亿，并完全实现了“自足”。甚至中国足球的发展态势，已到了国家政府不得不时时考虑其“社会安全”的程度。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如此之太平无事，但却怕两“市”出现问题，一个是“股市”，一个就是“球市”。此“球市”者，非别也，正乃我堂堂中华之足球也。由此可见，足球在中国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水平。

即使不喜欢足球的人，面对如此汹涌澎湃之状态，也不能不大加感叹。如此这般，怎不让人看到中国足球的“魅力”和“潜力”！

然而，这只是中国足球的一个侧面。一个有关足球运动之外的侧面。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繁荣，目前而言，主要是在“社会民众”，而非足球本身。

二

足球本身的水平不高，或在短时间内没有较大提高，必然不能继续将这种“社会民众”的“观球繁荣”推向更大繁荣。自然也不会满足中国球迷观球过瘾的那种“吸毒”般的美妙心理。

怎么办？除了从事足球职业的各路“诸侯”的继续努力，想出各种办法，少走弯路，多有捷径等等外，除了可爱的足球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好好练球之外，是否也需要“社会民众”的各方支持和“献计献策”？

如果中国之足球也必需某种“礼贤下士”的话，来自百姓的话题，在我看来，则无论如何也应多多听听。最起码应该让大家发表各种见解，哪怕是完全错误的见解。我在好几种场合都已讲过，现在的世界是一个结束了“冷战”的世界。如此局面，世界格局，自然要从“兵器战国时代”向“足球战国时代”转化。事实上，不是发生了这种转化没有，而是中国人面对这种格局，自己却处于一种较低水平。

“春秋战国”，自然是“天下大乱”。如何“大乱”得到“大治”？根据中国两千多年前的那次“战国”经验，“士”之计谋多少与质量高低，最起码起到了一半的伟大作用。举个

例子，秦国如果没有李斯这一“士大夫”之“献计献策”，秦始皇之“霸业”能否成功，还很难说。再举一例，如果楚国没有荀子之传授机密，大讲“易理”，深入人心，断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壮举也就没有可能。自然也就可能没有后来刘邦项羽之楚民造反成功之事实，甚至也就没有大汉帝国的出现。

想到这里，我就觉得中国足球，虽然只是个小小玩艺，但因其率先进入了世界级的“战国混战”，这就不得不迫使各路“诸侯”和“士大夫”去给“足球国王”“献计献策”。而至于今天中国之“足球国王”是谁，所献计策能否被他所采用，在没有经过实践检验之前，我们还是应该不要多去考虑。以我之经验，哪国国王都爱听“好计”，都爱用顶用“策略”，都不同程度能听进重要“进谏”。苦恼的倒是，作了国王，听不到“士”之声音，自己的身边居然没有什么“人才”。这样的“国王”，自然而然，就会走向“独裁”与“刚愎”。

国家是这样，足球也是这样。最起码有可能是这样。

三

有此判断，我这里也为中国足球小献一计，此计根本不足以直接推动小小足球之飞黄腾达，但能“有助于”（仅这个有限意义）认识中国足球。

以我之观察，中国足球其所以如此步履为艰，与几十年来踢足球的运动员，特别是运动员“背后”（极讨厌，我近来常使用的一个词）所反映的“文化背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问题实质，在其民族之“社会关系”与“足球运动”在历史逻辑上发生着一种“共振”关系，

而且这种关系，说得可怕一点，学术一点，不大不小，还是一种“呼应”性极大的数学式的“函数关系”。

何以见得？且听我慢慢道来。

首先，要从单纯的体育角度来认识一下足球。

足球是什么？我经常讲，足球就是一边各出十来个人，在规则允许的情况，想方设法让球滚进对方的大门，并设法别让那球跑进自己的门。但为什么如此简单一个问题，可世界上解决起来又会那么困难？为什么对于中国人解决这个问题更显得格外困难？为什么中国人解决其他体育问题相对来说，较为容易，而一遇到足球问题就显得力量不足？中国人解决乒乓球的“翻身”问题，只用十来年工夫，而为什么中国人解决足球问题花了四十多年甚至更多时间也没有见到大效？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就需格外冷静。切莫让激情烧坏了大家的眼睛，从而有眼无珠，看不见眼前的问题。这种局面，我以为与足球的特殊性质有着必然关系。为什么足球就那么特殊，而别的项目就不像它这样“特殊”？这是因为足球是世界上最为“复杂”的运动。而涉及到如何理解足球的“复杂”，无论如何也要重新审视体育项目的“分类”。

较长时间来，国内体育项目的分类，一直是以一种“平面”且“静态”的方式来进行。某博士和其弟子，炒洋人之冷饭，多从“项群”角度来考虑。结果是，隔网的分成一类，对抗的分成一类，体能的聚成一类，技能的又自成一类。应该说，如此分类尚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最起码在“表面”形式上符合了项目间的“关系”。但这种分类有其致命的弱点，就是无法确立项目之间的“逻辑”关系。

为此，我在近乎十年前，就进行过另一种分类。我采用

了孔德、恩格斯、怀特和罗素等大有名堂之哲学家有关“运动形式”的思想进行分类。就是说，看一种项目属于什么性质，首先要考察它本身所包含“运动形式”的多少。“运动形式”包含多者，自然属于复杂项目，反者，则属“简单项目”。何谓“运动形式”？就是事物进化过程中从简单到复杂所必然经过的“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这五种最基本的“形式”（我这里只从恩格斯，别人的新分类暂且不考虑）。在这个过程中，每后一种“运动形式”都包含着前一种运动。从而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局面。目前科学界最时髦的“分型分类”也与此相似，最起码在“平面”考察上这样。在地球的自然进化中，人所以是最复杂的“事物”，就在于他包含并组合了所有这些“运动形式”，猪狗所以不甚复杂，就在其没有人的心理运动和社会运动。有关我的这种体育分类思想，可参看我所写的《竞技运动新论》，里面有专章讲解为什么如此分类，这样的分类有什么好处，其主要科学性在哪里等。我以为想读懂足球的人，无论如何也应该听听我的分类思想。只有不动脑子的人，只有知识面太少的人，才不愿接受我这那种“逻辑”分类。

总而言之，足球是体育运动中，包含“运动形式”最多的一种项目。从而它必定是最为“复杂”的项目。

四

为什么这种“复杂”运动，中国人搞起来就格外困难？

分类成功了，问题的实质在这里也就第一次显得突出了。

我的解答是，复杂的运动（其实包括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在得以“社会操作”时，必然需要各种复杂而有效的

社会关系。这个思想仍然是来自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我在这里直接采用了马克思的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观点。

足球如果就是生产力的话,运作这种生产力的生产关系,自然也就应该与之配套。这好比说,一个国家已经大量引进了“热兵器”(如机枪、大炮、飞机和坦克等),但这个国家却死活不愿意相应改变它的“军队建制”,还想继续采用它那“冷兵器”时代的军队编制。这样的军队无论如何不能驾驭好这些兵器。兵器在这样的军队中,自然也就不能发挥最大的威力。这个道理,有谁还不懂,一定要找来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看看。多看几遍,可能就明白了军队的“建制”为什么必须适应军队之发展或“兵器”之特点这个简单的道理。

同样,足球也是这个道理。复杂的足球,它包含着如此众多的“运动形式”,十多个人在场上产生了自己的“社会关系”、“军人配制”和“战斗力组合”,对方十来个人也同样产生了尽可能有效的各种“关系”、“配制”和“组合”。如何驾驭这种局面,训练比赛,虽然教练是最高统帅,但从进入比赛的刹那起,教练员面对如此“战斗”局面,也常常是一筹莫展。因为他的脑子,已无法控制场上的各种复杂变化。足球一开赛,就再不听教练员的指挥,道理就在这里。

而在平时不进行比赛的“足球生产”(即我们体育界爱讲的“足球训练”)过程中,又何尝不是这种情况?

其实,足球生产较之足球比赛更需要复杂而有效的“生产关系”。

中国人 **100** 年前,为何就抵御不住英国人的侵略进攻?并不是中国的将士不勇敢,归根到底是我们的生产力和与之配

套的“生产关系”明显落后于对手。我们是农业和农民式的“生产关系”，对手是工业和工商业甚至“工业革命”后的“生产关系”。如此格局，孰优孰劣，自然而然，一清二楚。

所以，战争之胜负，武器的作用非常重要，但又并不全在武器，更为重要的还有围绕武器而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或“军事关系”。在同样强大的武器下，胜负则更是取决于这种“关系”。

我们的足球，就目前而言，应该实事求是地讲，较之前几年还是有了很大的发展，因为“足改”及其“联赛制”都为中国足球提供了新的“社会关系”，最起码这种改革，有助于推动足球的进步。为什么这种改革会带来变化，而以前的各种努力，都不能收到应有效果？原因就是我们的改革借鉴了欧洲足球的各种“生产关系”，而不是借鉴了其他地方。欧洲的足球“生产关系”，无论如何，处于世界最先进水平。意大利的“俱乐部”制度，可谓人类楷模。有对此楷模之借鉴，自然就会有中国足球水平之小小提高。

也就是说，借鉴而来的那种“活关系”，较之以往的那种“死关系”，更适应足球本身的“发展规律”(姑且借用经济学与哲学中的这些语言)。

五

然而，为什么借鉴了国外先进经验，引进外国教练（如施拉普纳等)，搬来了国外的运动员(每个俱乐部都有自己的外国选手)，并且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之后，我们的足球依旧那样不能令人满意？这就不只是一个“外在”的“联赛”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借用问题，更重要的就涉及到了我们“内

在”的民族问题。

在正式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还是先游离一下主题，到另一个问题中去。

为什么世界上只有欧洲的足球水平最高?除了人高马大，除了经济实力雄厚，除了俱乐部制度建立并运行得健康之外，难道再无别的原因?

有。我的理论认为，欧洲在**300**年前，就开始了新的“社会关系”的锻造，也就是说，开始从封建庄园式的人际关系向“资本”关系转变。其中，“个性主义”、“英雄主义”和“团队主义”遂成重要的民族精神成分。有关欧洲社会关系变迁方面的文献，几乎是多如牛毛。只要你愿意了解，你可以去读马克斯·韦伯等人的著作，其中讲到了欧洲人由于“基督教”之改革，而使西欧各国因此有了一种新的“新教伦理”。这种精神就是“吃苦”、“耐劳”、“团结”、“开拓”、“进取”等等非常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内容。如此局面，一改以往“神学”压迫下的“萎靡不振”。而东欧各国则由于不接受这种“改革”，依旧采取“东正教”的“精神”，从而也就没有这种适应资本主义的人文精神。西欧发达，东欧不发达，部分道理就在这里。

其所以有了这种“精神变革”，就有了以后的一系列欧洲精神，就在于这种变革，极大地适应并推动了欧洲正在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和社会过程。

我以为，要想理解欧洲的足球，一定不要忘记这些基本的“背景”知识，否则，球迷就只能是球迷，一胜利就瞎乐，一失败就瞎恨，而不懂得如何从“社会历史学”中理解这种体育的精髓。

中国的社会关系变革，较之欧洲则要晚出很多。前几年，中国有一篇文章（即《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就问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变化。这一问题本身就表明中国的“封建关系”过于长久。只是到了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压迫，才迫使人们认识到了自己的“社会关系”明显落后于西方列强。于是，中国才一步步跟着他们有了变化，先是沦落为“半殖民在半封建”的社会，然后在孙中山的努力下，开始向民族资本主义方面努力。但他的努力并不能一帆风顺，而是遇到了种种问题，并遭到严重失败。再过半个多世纪，才基本上确定了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和相应的社会关系。

有了这种较为稳定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关系之后，我们的问题也显得较为突出，即我们并不是世界上最“先进”而“强大”的国家，我们的国民产值，我们的个人收入，我们的工业基础，我们的办事效率，我们的“资本”比例等等都还很落后，都无法与同时代的欧美相比。我们的农民仍旧是国家的主体，我们的农民式的社会关系仍是主要的社会关系。甚至已经到了彻底告别封建社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们不少人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还是原封不动的农民主义。

再加上我们长期的一种“计划经济”和与之相应的“极权体制”，每一个人几乎都丧失了个性自由，每想问题，每去做事，都得统一在一个思想，一个尺度之中。这样的格局，不用说不能发展出最先进的足球来，就是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严重影响。而中国的体育，尤其是足球，所依托的社会环境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平台”（计算机语言，相当于“基础”）。

邓小平的“改革”，所以意义巨大，就在于“打破”这种

弊端深重的社会格局，自然，随之也要改掉那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各种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

六

中国足球的问题，如果仍从“社会关系”这一角度来讨论的话，那么，“农民”式的社会关系比例太重，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社会现实和问题所在。一来我们的农民队伍太大，从而使整个国家的性质也必然跟着成了“农业大国”；二来由于农民成分太大，从而必须很大比例上保留两千多年以来的那种传统的农民社会关系，以适应绝大多数人之生存发展；三来即使社会已经较为进步，但由于太大的历史惯性，我们每一个社会公民不由自主地都流露出各种农民素质。其中第三点，是最可怕最不好医治的“农民问题”。它犹如经济学上讲的“看不见的手”，在背后发挥着极其重大的作用，甚至最要命的作用。

“农民”有什么不好？他没有什么不好。在以满足和适应农民这一社会主体的社会发展为目标的历史阶段中，农民，可以说是最好的人民。

但是，当社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特别是进入“工商社会”时期，农民就必然暴露出严重问题。

农民的传统问题有：容易满足，较为自私，耍小聪明，滑头倾向，不讲公德，不讲文明（甚至不讲卫生），不太团结（因为社会不曾分工，无需团结），懒散无为，眼光短浅，打小算盘，没有公约，不讲信用，不守合同，以己为本……

中国之社会进步缓慢，重要原因中无论如何不能不受这些“农民”因素之影响。在中国有一个著名论断就是“小农

意识”，此四字最能概括农民的品质。

中国农民问题如此之突出，我们自己的民族领袖孙中山早已看出其背后的社会关系以及由此给社会带来的诸多毛病，他概括中国的农民社会关系是“一盘散沙”；不仅如此，连远在欧洲的伟大学者和工人运动领袖的马克思，老早也看到了中国的这种毛病，他说中国的社会关系犹如“麻袋里的马铃薯”（看似团结，一打开麻袋口就散向四处）。

最近，有一种较新的研究指出，孙中山和毛泽东之所以在他们的领导中，要进行必要的“强权领导”，就是因为他们看出了问题的实质，不予以“强权”，则社会关系无法“整合”。也就是说，没有强权干预，农民式的人际关系，无法在工商运作中有助于中国社会之“现代化”。

问题就在这里。我们不少的农民虽然早已进了城市，我们的城市人口比例虽然不多，但其绝对值早已可和美国的总人口相比。而我们这支城市人口，虽然身在城市，但其脑袋中似乎至今没有城市“文明”的意识。不讲公德，不讲卫生，不讲礼貌等等农业问题，至今十分突出。就在我写这篇文稿之际，我们的电视却正在呼唤人们要树立“交通意识”。在北京，则政府呼吁大家“四要四不要”，要让城市公民遵守“城市文明”，不要“横穿马路”，“不要拥挤”，“不要说脏话”等等。就差点说“不要太农民”啦。

如此这般，何其落后！

的确是落后。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我们中国的足球，之所以落后，就是因此而落后。中国尚严重缺乏一种能适合足球发展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中国尚无足球的真正“土壤”。而大多数足球理论“家”们，却从不这样思考问题，只

在那里高放“技术”论调，猛抓住诸如“四三三”、“四五一”，“跑动不积极”，“全场意识差”，“临门一脚不行”，“心理素质不过关”等等眼前问题，喋喋不休，指点江山。仿佛搞懂了这些“技战术”，中国的足球真能得到提高一般。如此这般，实在是近乎于“瞎掰”也。

而至于中国农业社会与欧洲工商社会在“生产关系”方面之孰优孰劣，我这里愿引我们的文化老前辈吴稚晖先生的话，来增加我之理论分析的重量。他说：“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在是一老实农民，没有多大空想。他们是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晋唐以前，乃是一个乡老、局董配合成功的社会。晋唐以来，唐僧同悟空带来了‘红头阿三’的空气，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们的空话，改造了局董的规条，所以，现在读起十三经来，虽孔圣人、孟贤人直接晤对，还是温温和和，教人自然。惟把朝奉先生等语录学案一看，便顿时入了黑洞洞的教堂大屋，毛骨竦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所以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低浅。”这是他对中国农民社会的评价。我们再来看他如何对待西欧：“现在要讲一个算帐的民族（西洋人），什么仁义道德，孝弟忠信，吃饭睡觉，无一不较上三族的人，较有作法，较有热心，讲他们的总和，道德叫做高明”，又说，“欧洲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再进一步做到工业革命，造成科学世界的物质文明方才有今日的世界。”

话语虽然亢奋，且带有伤感与激情，但我们不能将吴老先生之语全盘当成“崇洋眉外”吧，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鲁迅、钱玄同甚至毛泽东等人对他之格外尊敬。他说中国“农民”之“道德低浅”和欧洲算帐民族之“道德高明”，大概也不全是什么胡说八道吧。细细想想，慢慢琢磨，

我以为还是能品出点什么“内在的”东西。如果将中国“足球”与之联系起来，不同样可以有一些问题悟出！

七

有人会说，你如此这般将足球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讨论，是否太有点言过其实？其他项目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等同样从国外引进的体育项目，不也在这种“传统”的社会关系中，由落后上升为世界先进？

我估计某些“家”和爱动脑子的“球迷”，会给我提出这样的问题。

如果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仍然也会“振振有词”。

我之所以在前面大讲特讲“足球是复杂运动”，为的就是将足球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乒乓球、羽毛球、体操等项目，虽然也是国外的洋运动，但其内部所包含的“运动形式”的复杂度，则大大低于足球，甚至低于篮球。那样的项目，因其较为单纯、简单，干起来也就自然简单不少。我们很难说，我们的体育政府是个“偏心眼”，只重视小球不重视大球，只重视“隔网对抗”项目，而忽视了直接对抗项目。事实上，绝非如此。否则，就不会有贺龙之所谓“三大球不翻身，我死不瞑目”。说句良心话，中国的体育政府，对“大球”之感情，比对“小球”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的体育政府及其体育官员，在足球身上都快急出了病，怎么能不对之重视?！相反，不仅非常重视，而且重视到了“百倍”的高度。

在此问题上，我可断言：除了足球之外的一切体育项目，因其“复杂度”的不高，都可通过各种“偶然”方式来达到

其光辉的顶点，只有足球没有这种福气，非通过其与社会关系之“必然”规定才能“飞黄腾达”。我之所以花费那么大的篇幅来讨论足球与社会关系的问题，目的就是想确定出两者间的这种“对应”。

确立了这种“对应”，大家再讨论足球，才会在脑子里多一些问题的“维度”，同时也才有可能少一些激情下的偏颇，更少一些农民式的“眼前”技战术。

在我的足球理论中，足球就这么一种东西。它虽不大，圆圆一个家伙，千不该万不该，制定“游戏”规则时，定成了一边出十个人这样庞大的队伍阵营。“十”个人，这在所有体育比赛中，可谓最大之“队伍”也。它这种“最大”，也“最”是接近自然的社会构成，它的运作，也“最”是接近社会的运作，它的关系，当然也就“最”是接近了“社会关系”。

与之相比，篮球上场者是五人，排球多一个也不过是六人，这在体育比赛中已经是人马够多的“集体”项目，但较之足球，其复杂度却最少也差了一多半。所有的体操项目，都是个人项目，或者说，“集体”分数是由若干“个人”的简单相加，叠合而成，乒乓球、羽毛球也基本上是“个人”项目，真正的集体配合时，也只有“两个”人，名之曰“双打”。自然而然，这样的项目，“社会关系”简单到了接近“个人”水平，它们都无法与足球的“十人”相比。所以，个人式的农民及其心理，来从事这些“复杂度”低的项目，自然要比从事足球运动容易得多。

这才是问题之关键。难道我们能回避这样的问题？

八

也许还会有人向我提出问题，即你说欧洲是最先拥有着较为先进的社会关系，进而有了自己先进的足球，那么，南美的社会生产关系并不先进，甚至在国民经济方面还不如中国，可他们的足球为什么比中国就要高出很多，甚至比欧洲还要好看？

面对这样的问题，我自然还是“振振有词”。

我们有些人就是爱用“平面”的眼光来看问题，纵向的眼光从不愿多用一点。南美的足球水平的确很高，但这种足球运动绝非南美“土生土长”的运动，而是由欧洲带过来的一种运动。这是一。关键的地方，还在于什么是南美？南美的概念是什么？

在足球这一有限且有趣的意义上讲，南美绝非是一个简单地理概念，它首先是一个民族与文化的概念。最起码讨论足球时，必须这样。南美几乎是个“移民”大洲，它的移民不是来自亚洲（一万年以前的那些移民可能是来自亚洲，但与本文已无任何关系），而是来自欧洲，而且不是来自一般的欧洲（如中欧内地，更没有封建色彩重一些的东欧），而是来自大海中的葡萄牙和西班牙。

学过点历史并懂得经济史的人，一定会明白，这两个“牙”才是人类真正的“第一代”老牌资本主义。他们在**15**世纪，就已有了成熟的“资本”关系，就开始了第一次勇敢的寻找新大陆，就已开始开拓了世界市场。

正是发现了新大陆，并由于新大陆的开发和管理之紧迫需要，才有了大量的欧洲移民，即两“牙”移民。两“牙”移

民之不够，才又从非洲大量移进了黑人。黑人在智慧上可能不高，但在体育运动的天才上，却又独领风骚。从而无意间，为南美足球增添了万想不到的“活力”。从南美洲通用两“牙”语言这一事实来看，即可看出问题的性质：他们是欧洲的社会关系。

在讨论足球问题时，我们也应该明白，南美是首先有了“资本”式的社会关系，然后才有足球；而不是中国这种有了足球还没有相应的“关系”。

南美虽然在当前的国民经济方面，的确有其落后的方面，但其个性之“自由自在”和其民众心理中的“欧洲文化”，则不是我们亚洲各国那种“传统”的农业社会所可相比。南美优秀运动员，可以自由自在跑到欧洲的各种足球俱乐部进行“拍卖”，这绝不是什么“改革”的结果，而是“天成”的东西。正是有着这种“交通”和便利，南美和欧洲又才“互通有无”，“相得益彰”，“水涨船高”。

当然，也应看到，正是南美各国国民经济的相对落后，即使有其较为“先进”的足球社会关系，但毕竟因其经济“落后”，而无法使其民众的社会关系得到进一步提高，从而也对足球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即南美足球细腻、好看、花哨，但不如欧洲足球猛烈威武和实用。从这一点上也可看出，由于社会关系之不再进步（似乎还停留在15世纪时期的那种原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南美足球开始有了某些“固步自封”（暂忽略南美与欧洲的交往）。

在这个意义上讨论足球，就不好再用社会学方法，而应该多从民族学或文化学角度“切入”。

……

九

既然是这样，中国的足球肯定有一个号称“土壤”的问题。

也就是说，作为“舶来品”的足球，在中国必然有一个“安家落户”的问题。足球适合于中国人来踢吗？中国人一定能踢好足球吗？为什么虽然所有城市里的中国人都喜欢看足球甚至踢足球，甚至我们的体育政府不惜代价高度重视中国的足球，但我们的足球就是不能按照预定的目标而明显“进步”？

一种体育，必定是一种文化。足球就是一种奇特的文化。

农业社会中的农民，最讲究一个实际问题，即“栽什么种子，结什么果”。谁都知道盐碱地里栽不出好庄稼，谁也知道水分太大的地里种不出好西瓜，谁也知道，旱地里难以栽培出非水而不可的好水稻。

“种子”与“土壤”的问题，道明了一种必然的逻辑关系，即什么样的种子，必然需要什么样的土壤。同样，中国人想踢好足球，虽其本身具有某种“革命”的性质（参看我以前的各种文章，足球和喜欢看足球的各种行为，都在对抗着古代的各种封建势力，瓦解着各种莫名其妙的古怪礼教），而且有着“与世界接轨”的“现代”意味，但是，人们在努力的同时，还必须冷静考虑种子与土壤的“配套”问题。

现在的足球，并非我们唐代的那种足球，也不是宋朝的那种足球，而是地地道道的英国足球或欧洲足球。这种运动从产生的那天起，就是“资本”的，就是“算帐”的，就是“法律”的，就是“规则”的。所有这些，则是我们这个国度

里所相对缺乏的东西。我们的中国，重视的是“内在”修养，不希望什么“法律”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间。中国人每每遇到“法律问题”，总以为是丢脸的事情。中国人宁可息事宁人，也不愿意去打什么法律官司。这就是中国人的心态和民族的特性。这样，一个道德式的农业国家，面对一种非道德的“法律”问题，自然需要“转轨”。

中国人，在其漫长的农业社会的训练中，从没有学会“在规则允许的情况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相反，在欧洲，“自由”的定义，无论是孟德斯究还是马克思都曾做过标准的定义，即“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从事自己想干的任何事情。”

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律与民权传统的国家，是一个依靠道德约束自我克制的国家，是一个处处“看眼色”办事的国家。每个人的行为并没有一个“自由”的法律依据，相反，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也不管这种事情对己有利还是无利，都是以“忍”为上。“张公百忍”就是最好的典范。

足球不是这样。它与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有着完全的统一，即足球如何去踢，足球如何踢好，完全取决于每一个运动员甚至运动队多大程度上吃透了规则，并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规则，实现了自己的“自由”。这里面不需要任何中国式的“忍耐”和“迁就”。

然而，即使就在我们今天所谓追赶“现代”的时期，我们的足球运动还明显带有农业社会的某些痕迹。最头疼的就是中国的足球联赛，总有令人心烦的问题，这种问题，就是裁判“受贿”和“裁判不公”的问题。中国短短几年来的足球联赛，其所以连连出现如此众多的“弄虚作假”，并引起观众的强烈不满，问题的实质并不在足球运动员踢得好坏，而

在于执法者常常出现“误差”。也就是说，足球比赛之外，尚有背后的比赛，尚有“看不见的”的另一种交易。

这既是对足球的亵渎，也是对体育的玷污。体育比赛，其所以尚有某些魅力，关键就在其比赛公正。这种公正比赛，就是林语堂朱光潜和费孝通等人呼唤并赞美的“fair play”和“sportsmanship”。这两种体育“精神”，在欧洲不仅是体育道德，而且是作人的基本标准。它们的基本含义就是“公平竞争”和“光明磊落”（或堂堂正正的“运动员风度”）。

而我们的足球，在这方面却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不能为中国足球提供“土壤”的问题。所以，再好的种子，只要是丧失了基本的土壤，断乎不能顺利成长。中国的裁判，其所以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我们的农业社会中，遗留下来的“营私舞弊”，“走后门”，“拉关系”，“人情风”，“讲义气”，“哥们情”等半农民半江湖行为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有关问题，可参考美国费正清所著的各种著作，特别是《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专门讲述了中国古代官僚办事时的互相推诿和相当程度的贿赂现象）。

这样的环境，足球这粒种子，断然不能自然而然，顺顺当当，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只能是在夹缝中，左右为难，举步为艰，步履蹒跚。

中国足球之**40**年艰苦岁月和近几年来风风雨雨，难道还不能说明某些问题！

如此这般，哪一个问题又是一个单纯的“足球”问题？

都不是。或多或少都是些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

足球就这么奇特，它在中国就要和社会及其民族发生如此“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和生死瓜葛。

……

足球的问题还很多很多，吾之思考与表述，只是庞大问题中的“一髅一毛”。足球是复杂的，它的问题自然也是复杂的。

让我们用一颗复杂的心，来对待那颗圆圆的球。

只有这样，似乎才会真正理解什么是足球，什么是中国足球。

1997年10月

岂有此理

——另一种足球话题

中国　　足球，再一次不能出线。

时间：公元**1997**年。

40年的努力，几代人的希望，十多亿人的企盼，全部流产。

于是乎，上下惊愕，左右墨面，捶胸顿足，泪水涓无。

于是乎，足球文人，满腔激愤，出语尖酸；球迷悲痛，骂声连连，难抒不满；足球同行，躬身自检，寻找病根，以图东山。

于是乎，一个既不算足球文人，又不算球迷，更不算足球同行的我，写下了今天的这篇文章。

足球，尤如高楼大厦，她得崛起，靠不得文章。

然而，足球本身就是文章，她需要大问题大写，小问题小论。

我的话，从这里说起，一个有关“心理”的话题：

一

情绪发达者，最不应该去爱足球。

因为，这些“情商”（我这里借用目前的时髦说法）系数高而又极爱足球的人，一旦足球给他输了，他就会大发脾气，说出各种难听刺耳的话。

这类的普通“观众”或高级“看客”，本来只是些普通百姓，比较标准的称呼就是那些“球迷”。“球迷”们说说难听话，发发牢骚，似乎还能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他们掏了高额门票，他们就是中国足球的“纳税人”。大赛之后，他说什么，谁也管不着。

面对如此局面，的确是无可奈何，谁也不能将之如何。聪明如中国足协的体育干部，也就只能吃点哑巴亏，装聋做哑，一言不发。因为任何语言，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你说话的对象都是“迷子”，说什么他也不信。

自从有一些文化人加入到“迷子”行列以来，局面可谓急转直下。这是一些摇唇鼓舌之辈，他们认字多，反应快，能写文，会骂人，比一般球迷的水平自然要高出许多。这些人是记者，是作家，甚至还是“社会科学”家。这些人似乎就在等着你中国足球的“好看”，踢好了尚可，万一给他踢不好，难听话肯定不绝于耳，让你不听不行，非听不可。什么“该死的足球”，什么“谁提足球我跟谁急”，“足球是个王八蛋”，“足球，我操你妈”……中国文字史中，最难听的话，都让这些“文化”人用了个够。中国足球，真乃大不幸也，就差点被这些厉害如“刀笔吏”者，掘墓鞭尸，暴晒三日，遗臭万年，令那些踢球者的祖宗三代，阴间里也羞得无地自容，不得安宁。

照这些文化“迷子”的心思，中国足球就好比是他们豢养的赛马甚或斗鸡，参赛就是给主子争脸。赢了，什么都好

说，“万寿无疆”也能高喊出口；输了，则不行，口诛笔伐，乱箭穿心，狗血喷头，什么难听就说什么，什么恶心就让你忍受什么。

文化人式的足球“迷子”，心中很是清楚，不如此这般大动干戈，就不会“赢得”其他“迷子”们的“心”。多数球迷，由于文化不像他们如此之高，既没有学历，又没有职称，只有会喊口号的“拳拳爱球之心”。于是，他们也就更需要“精神领袖”。没有文化人用理论武装他们，他们就会沦落为“乌合之众”。更何况，当今年代干什么都不容易，写文章搞创造搞研究，都比不上骂足球，痛快淋漓，自由自在。骂完那“该死的足球”，还能赢得诸如“爱国”、“爱民”和“爱球”的美声。更何况，如此这般，还会有不薄之稿费源源不断，流入袖囊，润笔润豪，润心润口，以为奖赏。

自从足球“迷子”的队伍中添列了这些“文化”人，实在是把搞足球的一帮“干部”和“教头”吓得个够呛。他们本来就不好讲些什么，他们本来就讲不好什么，现在被这“巧舌如簧”的“文化”人一“唬”，就更是张口结舌，口条木讷，一脸肃杀。

二

我作为半个“文化人”，听过如此恶言恶语，心中感受，自难言状。骂人之尖酸，质问之严厉，不能说人家没有几分道理；但其尖酸与严厉，又实在是过于出格。

每当如此，我作为国家体委之一名干部，自然就会想到马克思和鲁迅，关键时刻就是要“立场分明”，“爱憎分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为此而常想呐喊：“文化人”，不要光

耍嘴皮，让你带个足球队，你比戚务生高明不了多少！

然而，中国足球，也太有些“不争气”，每每国内去踢联赛，每每在主场与那些大牌欧洲俱乐部比赛，都“盛气凌人”，赢得都格外“痛快”；可一遇到“出线”比赛，则回回显得艰难无比，甚至干脆就不给你出线。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少也有**20**年光景，其成就之大，有目共睹；然则，我华夏儿女所玩闹的那个小小足球，与之相比，却倍显窝囊。西班牙没去成，墨西哥没去成，意大利没去成，美利坚也没有去成，就连这明年之法兰西，最后还是摇摇晃晃，没有去成。

一系列的“没成”，当然会激怒众多“迷子”，当然更会激怒这些得理不让人的“文化”大人。他们不仅骂人，而且还要质问，甚至还要开个座谈会，将你足球讨伐一番。

心理素质再好的人，面对如此“压迫”和“惨境”，也会沉不住气，再不能说的人，再不会说的人，也想出来为自己做点勉强的“辩护”。

辩护，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更何况堂堂足球先生？

然而，怎么辩？这却是个大问题。

我本人就亲眼见过亲耳听过几种这方面的“辩护”。

总而言之，其所以失败，泛泛而谈，是“用人不当”，是“临门一脚不行”，是“基本功欠缺”，是“体力不支”等等。最尖端也最让“文化人”没脾气的则是另一种“辩护”，那就是队员的“心理素质不过硬”。有此辩护之后，报纸电台甚至电视，紧跟着也就有了这种附庸式的“申辩”。更有甚者，有关中国足球能否快速提高的“心理学课题”已经开张上马。仿佛此一辩护，终于找到了问题的实质，既发现了问题，又堵住了喋喋不休如“文化”人那死不绕人的口舌。

我自从听了这样的“辩护”，至今还不曾见到有什么“文化人”提出相反问题，再对中国足球甚至某某教头诘难。可见，文化人也有其严重“虚点”，也有其知识“不扎实”的地方。文化人搞些“实学”，可能真还有些本事，但一旦跑到“虚学”领域，反倒也会“心虚”肝颤。看来，动不动就要讨伐足球的文化人中，也有一些“纸老虎”。

三

我以为，面对中国足球队员之“心理素质不好”，“文化人”这回就没有显示出自己足够的“敏锐”，也未能抓住这个“辩护”之空虚。“心理”的问题，是个比文化讨论略显“玄虚”，但又比辩护家言论稍微“实在”的东西。

我这里，特想义无反顾，站出来亮相。将此“心理”问题，提将出来，就属我之“别有用心”，企图搞他个一石二鸟，一箭双雕。一来启发一下文化人，让大家深入理论，少一些脾气，多一点理智；二来适当告诫一些“足球先生”，如此心理问题，并没有抓住“核心”，只是找了个“托词”，有蒙混过关之虞。

简而言之，我的问题是：中国足球的症结，真的是在“心理素质不过硬”吗？真有这种“独立的”“心理素质”吗？

找原因找到了“心理”问题上，很有点类似某位“思想性见长”的作家所说的“多维复数空间”里的味道，着实让人找不着东南西北。而那些死命宣染这种“心理”问题的记者、评论家和足球文学家，我估计是对心理学了解得太少，甚至有些朋友都不知道何者为“心”何者为“理”。

中国足球，其所以如此步履蹒跚，难道真是中国足球

"孩子们"的"心理素质不过硬"吗？如果这真是个问题的话，那么另一个很大的问题必然引出，即人类果真存在一种"独立"的"心理素质"吗？

在当今，人们特别是体育科研人员，"特别高度"重视"心理素质"的时候，我倒愿意提醒大家，不要"跟风"。"跟风"厉害，很容易跟出问题，以致于最后说了瞎话。

心理是什么？这实在不好一句话以"蔽之"，非得看那厚厚的心理教科书不可，可是看完了那厚厚的大书，似乎在这里再也写不下文章，因为那里面的说法太多，太笼统，太正确，以致正确到了"大而无当"。

心理现象，虽不好一语蔽之，但我为了写作和交流之方便，还必须勉为其难，试做一次"一言蔽之"。以愚之见，心理就是调控有机体生理活动的神经活动。就像一拨当兵的，总得有个当官的来管他们而不可，否则就会出乱，就会没有指挥，就会如同"僵尸一堆"，决没有什么战斗力。有了当官的，再加上相应的通讯系统，才能正常而有效地调动这些大小爷们，或杀或拚，或攻或守。由此比喻可见，心理现象的确是一种比生理现象要高出一些的东西。否则，中国古人不会将之叫作"精"和"神"。一个"神"字，已将此心理"神秘"点破。

心理之如此神秘，它究竟如何产生？这也是个难题。大概说来，是由于进化之需要而必然出现的现象。至于进化到什么阶段，就能出现心理现象，大概是到了非常复杂的有机体非有个统一指挥而不足以适应环境之地步才会出现。

而心理现象的正常运行，自然需要支撑它的"平台"和"道斯"（计算机术语，即运行软件的"背景性基础"）。这种

“平台”和“道斯”，相对于人类来说，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神经系统”虽然是决定“心理活动”的最终条件，但它自身的存在和活动，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自然”现象，也就是说，它有自身的“生理”问题。最起码心理现象存在着生理学的基本根据。

明白了这个道理，知道了当兵的和当官的之间的那种“指挥”与“被指挥”关系，自然也就知道了心理与生理之间是一种“依存”关系。有此判断之后，我们也就明白，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独立的”心理现象。

四

如果真的将“心理素质不过硬”理解成了中国足球水平低缓徘徊抑或进步不大的“主要的”（或“重要的”）原因，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决定论”的关系判断，即解决了心理问题，提高了心理素质，我们的足球自然而然就会得到“主要的”（及“重要的”）提高。而我们现在的各种说话中，一直就不乏这种“心理”论调。如此心理“决定论”，在我看来，基本上属于谬论，它带领人们走入的，恰恰可能是个大“误区”。心理现象不能独立于它所必须依存的生理学基础。这个道理，很像马克思讲的“上层建筑”不能脱离“经济基础”一样。“上层建筑”不管你叫唤什么，不论你耍什么花花肠子，只要脱离了“经济基础”，保准会出问题。体育运动也是这样，虽然运动员的精神素质格外重要，但强调到了“独立”甚至“游离”的水平，就会有问题出现。这种问题，很像是当年“义和团”的“神勇”，将“杀敌勇敢”和“破敌之术”的那种“刀枪不入”寄托给了某种神秘的“天启”；也像现在有些

迷信气功的人，将自己的疾病与幸福都寄托给了神乎乎的“气”和“神”。

心理现象，并非只有人类所有，较高级动物如脊椎动物者，就或多或少都有心理现象。面对如此“普遍”现象，在这里硬讲这些繁琐道理，读者大人一定百生其烦，不忍卒读。举些例子，可能会比说教更能“参破”道理。

有某“体育社会学”教授好说，体育比赛就是“礼仪战斗”。既然如此，那咱们讨论的足球比赛，自然也就如同超级战争。战争的胜负，是否与战士的心理素质高低有关？有关。但是否战士的心理素质能够独立决定战争的胜负？非然。伊拉克在科威特人面前，可以耍耍威风，显示出一种“不可一世”的劲头。但自从来了些美国人，天上地上，导弹火箭，都像长着眼睛，指哪儿打哪儿，伊拉克老爷的威风就再也难以挺住，其“心理”素质也再不如以往那么“过硬”。

狗见了猫兔之类不如自己的动物，总是趾高气昂，不屑一顾，露出了一派“高傲”的“神态”；狗见了生人，但又不摸其之脾气时，它总要试叫几声，探探虚实，而此刻又逢自己的主人到场，则嘴脸骤变，定会来它个“狗仗人势”，狂吠不已，以显示自己之如何勇猛和忠厚，这时的狗脸定是一副精气神十足的样子，仿佛心理素质比谁都要“过硬”；而当狗见了老虎之类，则就另一副模样，再不敢狂吠，即使主人在侧，也不敢挺身，只感觉全身要瘫，四肢发软，没一点“精神”，只听它口中发出“叽叽”的怪声，像是非死不可的样子。

老虎见了任何动物，都没有发怵的时侯。而小绵羊小鹿，见了任何动物，听到任何动静，都会紧张，睁大两眼竖起双耳四处张望，而当见了比自己厉害的动物，更是只有撒丫子

乱跑。猫见了豹子和狼，可能也会腿肚子发软，哧溜一声，上树逃跑，但它见了老鼠从没有心口发慌，相反，倒是老鼠见了猫，六神无主，无计可施，甚至连跑的勇气都不再有。

国庆前夕，我与《强国梦》、《兵败汉城》两书作者，我的乡谊老友赵瑜及《中国青年报》著名记者沙琳等人在语言学院的大操场旁聊侃足球，一不小心，就举了这个例子，逗得赵瑜兄哈哈大笑，连连补充："一个心理素质最好的老鼠，遇到了一个心理素质最差的猫，也会发怵，而不是相反。"

……

五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心理"反差？是什么东西在支撑着动物及人类的心理发生着如此重大的戏剧性变化？"心理素质"为什么就那么不甚可靠，不同的条件就要变一副"嘴脸"？

道理很简单。支撑心理素质的东西只有一个，这就是"实力"。

美国人如此张狂，在于他财大气粗；老虎所以从不"发怵"，在于它"威力无比"，不是别人吃掉它，而总是它把别人吃掉；狗的嘴脸，其所以那样易变，就在它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见上遇下，都让它各显其"实力"，心理感觉也就完全不同。狗，夹在动物中间，注定是个两面派的角色，时而张狂，时而发蔫。

因此，我们说："实力"是决定人类及其所有动物界心理状态的最终力量。

"武松打虎"，固然与武二郎之"胆大"直接相关，但如

果这老哥没有与虎打架之"实力"，断乎是老虎吃掉他而不是相反。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如果这是一个真理的判断，我以为前半句占有着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真理，后半句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的真理。一个拥有了真正实力的人，才会真正"胆大"。而一个没有实力的人，天天叫喊"打死"某某某，还没打上两拳，就被别人制服者，不是神经病，也是狂想症。

西班牙的"堂·吉坷德"，就属于这种神经病式的"狂想症"。本事不大，却到处发号施令，让人忍俊不禁。

同样是人类，同样是爱好足球，同样是参加比赛，却有天大之差别。这种差别的最终根据，仍在实力，而非其他。举例来说，人人都说中国足球队是遇强不强，遇弱不弱；而德国队则是遇强不弱，遇弱不强。这虽都属有些"反常"，但"反常"的性质却完全不同。中国队属于"狗"的那种情况，而德国队则属于"老虎"的那种性质。中国队猛赢弱队及其显露神勇，像是猫遇上了耗子，而当输给了强国（甚至水平接近的国家），又像是狗遇到狼（且不提遇到老虎时的惨境）；德国人遇到弱队常常差些翻船，真像是老虎打盹，让兔子狠咬了一口，而当它遇到巴西和意大利，则从不示弱，仿佛老虎精力过剩，从不疲倦，两眼铮铮。

话到这里，不禁要问：到底我们中国足球队的心理素质如何提高？

有鉴于如上各种例子，我以为，还是发展自己的实力为好，更妥当，更脚踏实地，更有战略意义。心理素质的提高是随着这些"实力"的提高而自然提高的。单独提高"心理

素质”以“快速提高中华足球”者，愿望可佳，但办法不灵。

心理素质的威力再大，但决大不出它的“实力”范围。

像毛主席那样心理素质绝对优秀者，20年代与国民党的抗争，只能选择“游击”的方式，而等到了40年代的后期，面对同一个国民党，却要主动与之进行“决战”。毛泽东何以有这种“游击”与“决战”两种不同的“战略部署”，就是他必须根据自己当时的“实力”而进行“必然的选择”。

战争是这样，足球又何不是如此！

球迷、文人和学者，在此大是大非问题上，少发脾气，多出主意，多与队员合作，多与教头合作，兴许真还会找到新的出路。噫唏！

1997年10月一稿

1997年11月二稿

足球的责任

——一半是足球一半是人生

一

足球是什么？

足球只是一种游戏，只是这种游戏的参加者，较之其他项目要多一些，看起来也更有趣味一些。仅此而已。

游戏，如果不进行比赛，永远也显不出什么魅力。只有进入比赛，游戏才会充满价值。足球的魅力，正是来自于她那特别的比赛。然而，要比赛就会有胜负。胜者愉悦，败者难受。难受者一想到她是游戏，隔一会儿与大家哈哈一笑，完事拉倒。

这就是游戏。这就是一切游戏的基本特征。

游戏永远是业余时间中的一种消遣，她永远不是什么正业。即使有所谓责任，那也只是“玩”的责任。正是没有什么责任，游戏才永远可亲可爱。

但如果给游戏赋予某种责任，游戏就开始变得沉重。沉重的游戏玩起来，就相当艰难，玩者艰难，看者也艰难。艰难加艰难，也就越玩越没意思。最后，这种因为赋予责任的游戏，也就开始完全变形。

这就好比，本来是业余时间的麻将，即使里面有些小赌小博，那也只是为了调剂精神。但如果一个家庭将麻将赋予了“发家致富”的责任，则这种玩闹的麻将，就开始变得特别，玩起来就再也不是轻松活泼，而是如同战争那般，只能赢而不能输。或者说，赋予“发家致富”责任的“麻将”，其胜负都与该家庭的荣誉、地位发生直接关系。这样的荣誉和地位再很高，也不过是个赌徒的荣誉和地位，又有什么价值！美国的地位绝不是因为它的NBA篮球，德国的强大绝不因为它的足球。

在我看来，游戏的强大与否，只证明某个民族的“剩余精力”的多少。就像老虎豹子吃饱了，总要疯玩一会儿，打打闹闹，以显示自己的精力充沛；而老鼠兔子，即使吃得很饱，它也没有精力来玩，它得处处提防各种不测。

游戏只是精力充沛的一种表现，游戏的胜负并不能完全证明物种的优劣。

如果真有这种逻辑的话，日本人的足球从来也没得过什么世界杯冠军，难道日本人就成了十足的饭桶不成？英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学会中国的烹饪技术，难道英国人就是些连饭也不会吃的笨蛋？

二

因此，游戏一旦赋予不该赋的责任，她就开始难堪。

同理，足球赋予其太多的责任，她就不像个足球。因为她不再是什么游戏。

然而，足球在中国却被赋予太多的责任。以致这种游戏，在中国就显得格外沉重。你如果去问一个球迷足球是否游戏，

他马上就会对你飘来白眼。好像你这问话本身就是问题。足球怎么能是游戏？

中国虽是农业大国，属于不富裕国家。但即使这样，我们的国家还是有了自己众多的球迷。这些球迷之所以爱看足球，特别是爱看本民族的足球，并不完全为了游戏的娱乐，甚至不是为了发泄自己体内的激情和毒素，而是为了那种奇特的责任。

一个没有责任的民族和个人，固然不幸。但不该有的责任如果突然强大的厉害，则其民族和个人就会变得像只困兽。

1997年的中国足球，再一次不能冲出亚洲，未能从亚洲十强中拿到“进军”（看多厉害的字眼）法兰西的资格证。这一事实，的确很是不幸。就连我这个算不得球迷的人，也觉得有几分的悲凉。但如果因此而要追究中国足球（足球队员、教练、干部、政府）的什么严重的社会责任，则我觉得身上更是寒冷。仿佛将有大病发生一般。

然而，事实上人们就是要追究这种责任。责任就是你为什么要给我输球？你为什么就不能冲出亚洲进军法兰西？你为什么在“足改”以后还要输球？你为什么连续20年冲不出亚洲？你为什么在全国把你当成“大哥大”却不能有个大哥的表现？

如果我们还承认足球是一种游戏，那么，在我看来，她承受不起这样过于强大的责任。当然如果我们中国人硬要把足球当成一种“政治”，理解成一种社会行为，那么她的确应负不小的责任。更何况我们有着类似于政府职能那样的足协组织，更何况我们在希望不大的情况下，还曾包机飞往沙特，更何况平时中国足球的运动员挣的钱比别人要多一些等等。

球迷一看你给他输了，他的那点理智只能去追究这种责任。

于是乎，比赛结束，当场开起了新闻发布会，开起了类似于检讨的各种责任追究会。与此同时，我也看到了大连乃至全国的球迷有些丧失理智，我甚至看到中国的足球小伙子被球迷们围得上不了汽车，我看到了警察们，成千上百，结成了“人网”，以维护那极其脆弱的安定。

看到这种场面，我这个平时并不太同情足球的人，突然间十万分的同情足球，同情中国足球的一切同仁。尤其同情那些球踢得并不理想的十多个孩子。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觉得这些踢球的孩子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兄弟。然而，我们最亲的同胞和兄弟，却遭受着同胞们的义愤和煎熬。“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曹植在世，面对此景，一定还要大声发问。

由此一事，也让我想到中国年轻人的恋爱。男女相悦，耳鬓斯磨，一千个许诺，一万个殷勤，只要你我能好，什么都好说，爱鸟及屋，七大姨八大姑，只要沾亲带故，见谁爱谁，义无反顾，谁也挡不住。而当你敢不干，则我必将你视作“敌人”，当场和你没完，或将你痛打一顿（男），或用硫酸将你面目毁灭（女）。爱不成则恨，很能概括不少中国人的情绪色彩。

中国人在恋爱上如此，在足球上亦复如此。两极性转换，太像狗脸，不爱则恨，恨你咬牙，恨你切齿，恨你欲砸你家玻璃，恨你欲灭你家老小，恨你欲停发你的工资，恨你欲将你饿死拉倒。

三

踢球的孩子，面对如此球迷，只能将球踢得更好。这就是他的责任。踢好了就会赢得狂爱；踢不好，则会领教各种“非人之待遇”。于是，踢好球，多进球，快出线，天然成了中国踢球娃娃的“责任”。有了这种责任，固然可喜，因为他的肌肉骨骼，时时想着背后的球迷，想着“国家”的“命运”。但事有相反，也正是这种“责任”，却将这些孩子压成了“软蛋”。孩子们生怕踢不好球而遭受那种可怕的“待遇”。

说来也巧，越是怕球踢不好，就越是踢得格外差劲儿，以致每每遇到大赛，准像是腿肚子患了痢疾，处处拉稀，大失水准。越失水准，自然是踢不好球，出不了线，最后必然饱尝各种“迷子”的“咬牙切齿”和“怒目金刚”。

十几年来，中国足球队员的心理素质，总是那般之差，我本人认为，一半以上是由于球迷过于厉害给吓坏了神经。在中国，胆小的人，固然不能踢球，而胆大的人好像也不能踢球，因为他踢不上几天，也会被某种巨大之“社会心理现象”吓成了鼠类，胆小得再也没有儿时乃至少年时的勇猛和潇洒。

我之言论，无论怎样偏颇，但以上所论总还算是些“社会问题”！

既然是问题，我们就不能回避。回避问题，就算不得好汉。

中国足球本不应该负有的责任，突然间压在他们肩上。在我看来，或多或少，有些过激。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

在中国，足球太有些政治化了。这样做，有可能彻底摧

毁这种游戏。

如果人们能对中国的各种社会事业，勇于如此自我检讨，勇于让大家检举各种问题，那么国家的兴盛也许早就完成。

游戏永远服从“少数”原则。就是说，只要参加比赛，胜者少数，而败者多数。参赛者越多，这种概率的分布越大。决定游戏的胜负，有两种力量，一是游戏本身所无处不在的各种“偶然”，一是推动大家疯狂追逐游戏利益的对等“概率”。

参加游戏的人，没有一个事先必然知道自己能赢或输，只是约略感觉自己有赢或输的可能。至于可能多大，必然要到场上接受检验。如果游戏的比赛，失去了这些个偶然和概率，全变成了一种“必然”，则游戏也就再也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游戏如此，人生也如此。如果我们的人生，也是一种“必然”的人生，那倒反而让人觉得没有了“活着”的意思。一个人生下来就知道他将来干什么，活多大，哪天死，仿佛人生如同计算机程序那样，设计得井井有条，谁又能忍受这种“必然”？人生的某种“盲目”，常常是我们生活乐趣的源泉。这种“盲目”就是所谓“偶然”或“概率”。就像足球比赛，谁都有赢的可能，谁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这才使比赛充满魅力。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如果真想让游戏的比赛变成真正的“必然”，那他就必须具备一种消灭偶然，或将偶然转化成必然的能力。而如果真有这样的游戏参加者，可想而知，比赛也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人愿意跟他游戏。

一种游戏，尚未开始，就已经知道比赛的结局。这也太有些没有意思。这就好像是所谓的“必然人生”。当然，一个人在游戏中总是胜利，也会遭人嫉妒，并惹出杀机；但如果一个人参加游戏老是不赢，则也让人觉得太有些不幸。中国

足球的问题，就是太有些不幸。几十年，各种不幸总是降临到我们的头上。一次次冲击，一次次不成。于是乎，本属“偶然”的球迷，甚至舆论，突然间以为这是“必然”，总觉得中国足球是让某种魔怪拖住了身。

正是这样，大家才要追究一个足球游戏的强大责任。

追究责任没有什么不好，谁让你是一种“社会行为”。

但我总觉得，如果过分对一种游戏追究责任，那么，中国足球的“心理”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相反，倒是会变得越来越差，难以自救。就像一个“麻将运动员”(姑且称之)，由于时刻肩负着“发家致富”的高大责任，他就再也没有“麻将”的娱乐，而是处处陷于“焦虑”状态。这样的人，不捣鬼便完成不了自己的使命，永远也不会赢得麻将的胜利，更谈不上所谓“发家致富”。

现在的中国，其所以好些“麻将运动员”有些不正常，就是肩负着“发家致富”这种不切实际的坏使命。于是，娱乐的麻将成了赌博，甚至成了小媳妇老太太吃了喝了围一桌的“经济运动”。

结果如何？麻将糟蹋了，人也完蛋了。以致人们一提麻将，就觉得麻烦。它甚至成了中国的社会治安问题。中国的麻将已成了坏东西，我以为，中国的足球千万别再完了蛋。

而这，就不能赋予足球以太多之不切实际之“责任”。太大的责任，会压得足球喘不出气，更会让所有搞足球的小伙子身患神经症。

至于会患何种神经症，尚需另文来论。

1997年11月

“焦虑”与“自虐”

——中国足球“心理”透析

一、“文学”之威慑

中国人对自己的足球抱以太大的希望。

于是乎，就有了中国足球的目前这种局面。

足球，本来是舶来品，中国人来搞这种洋玩艺，本来就具有一些赌气的性质。一来想说足球这种东西，我们的老祖宗就有，弄不好外国人搞的足球就是我们宋代人所谓“蹴鞠”的变种；二来你洋人能将此球踢好，我华夏“土”人（这里特制中国的农业社会性质）也能将之踢好。

总之，中国人叫真足球，概有“不甘落后”的意思。

于是乎，一种游戏，在中国就逐渐变成了非游戏的文化。它成了政府干预的国家行为。40年的努力，千万人的呼唤，十多年的冲击，越来越使这种游戏变成了一种民族“赌气”的运动。

越是冲不出去，就越是太想冲出去。结果足球的“国家味道”也就越来越重。以致到今天，终于出现了“谁提足球，我跟谁急”的奇特局面。美国人至今对足球不太感兴趣，我

不知是否美国人也在哪里发神经，处处高喊："谁不对足球感兴趣，我就坚决跟你急"？

中国人多地大，历史悠久，汉唐辉煌过，清末挨过打，曾经落后过，现在又不服。如此这般，国家都要现代化，你小小足球岂敢也不"现代化"？中国在联合国里都能呼风唤雨，你这小小足球怎就不能"踢出一片好天地"？

中国是个诗词歌赋的国家，民族长期受着一种"文化无意识"的影响，或多或少，都有些诗人的气质和文学家的联想。只要不是傻瓜，就知道什么"以小见大"，"诗以言志"，"以物喻理"、"拟人化手法"以及"兴比赋"的妙道。更何况中国还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浪漫和夸张？

中国搞足球，或多或少，也受了这种文学的影响。小题大作，以小见大，使足球不再是足球。人们将足球理解成了"国家强，足球盛"的文学语码。

一个民族不会文学，固然是天大的悲剧，就好比中国没有屈原、司马相如和李白的那种悲凉；但如果一个民族，其文学诗性过高，想象过于丰富，则也是天大的悲剧。处处联想，到处比赋，时时"拟人"，每每"振兴"，定让你干什么毁什么。

中国足球，其所以如此步履为艰，除人种体力不算理想的生物学因素外，除中国人长期含蓄惯了而不太适应张扬的民族心理因素外，就与这种"文学"情结过于发达密切相关。

二、足球"焦虑症"

几代中国足球小伙儿，生生是被几十年的文学口号吓成

了“软蛋”。

于是，在中国终于形成了一种“足球”怪圈。你越是高喊“振兴”，足球就越是无法“振兴”；你足球越是无法“振兴”，球迷和文化人就越是给你扯着嗓子高喊“振兴”。从此，只要你沾上足球，就永远摆脱不了这种“难堪”。我总感觉，心理素质不好的人，只要你踢了足球，无论如何也会被这文学声浪吓个半死。

中国足球，只要不是打“出线”球，总能打得让人满意。一旦遇上“出线”，准保打砸，打得让你口眼歪斜倒了胃口。如此这般，难道我们的中国小伙儿，就那么“不爱国”，不“振兴”？每每遇到“出线”就自己先“放水”，淹死自己而后快，毁了自己，美了别人？

完全不是。问题恰恰是中国足球小伙儿和所有教练先生，都被这“足球”文章吓得够呛，每遇“出线”，腿肚子就开始抽筋儿，脑袋瓜开始发僵。

“文学家”（泛指所有球迷，尤指一些创造各种足球“振兴”口号的文化人）给足球赋予的使命过于强大，强大到了足球家们太想把球踢好，不踢好“无以报君恩”，“无脸回江东”，弄不好就得学一回项羽自刎。

结果不幸。球迷得了“自虐症”，足球运动员也得了再也治不好的“焦虑症”。

中国足球小伙儿，自从得上这个病，每每焦虑，就再也踢不好“出线”球。太想踢好，就过分着急，过分着急，就必定焦虑。一焦虑，腿不听使唤，球不听调度，既无阵形，又无章法，稀里哗啦，忽上忽下，时好时坏，活像是得了疟疾，打起了摆子，摇摇晃晃，大失水准。于是，就出现了所谓

“病态足球”。

不遇“出线”怎么都好，一遇“出线”立马犯晕。

越是这样，球迷就越是不依不饶，就越是给你“加油”，就越要让你“振兴”，就越要让你“出线”，就越要让你“足球兴，国运兴”。你越是不出线，他就越是五迷三蹈，两眼发直，小喇叭一喊，大文章一写，非让你听见不行，非让你“出线”不可。并再一次给你提出新的目标，让你何时何地必须出线。总而言之，你不“振兴”一天，他就不高兴一天。你一天不“出线”，他就一天不舒服。这种不舒服已经到了受虐的地步。

三、球迷“自虐症”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只要你不再发疯地狂爱足球，“受虐”这种心理自然也就慢慢好转。可我们这些足球“迷子”一旦离开了足球，就又找不到感觉。昨天因为球没踢好，他还恨恨道：“老子再也不看你踢球”。可是没过**24**小时，狗脾气一犯，第二天的另一场比赛，他又来到场地，高喊“加油”和“出线”。

观球者的心理总是这样，最起码这十多年总是这样，就活像是一种典型的“自虐待狂”。自己给自己供奉了一个神像，但神像老是不保佑自己。于是乎常想将之砸毁，可砸毁之际，又怕遭到鬼神妖魔报应，心里难以安宁，于是就又跪在地上赶紧磕头。就这样，一种很有民族特色的球迷“怪圈”，一种球迷文化的奇特心理，就这样在中国形成。

足球小伙儿知你球迷害着如此严重的“自虐症”，心中自然很难受。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自己的“焦虑症”也就

更加突出。越是这样，就越是想到了项羽，老怕“无颜过江东”。

“东边那个美人，西边黄河流”，这本来才是足球的潇洒。

然而，我们既没有美人的顺畅，也没有黄河的酣畅。

我们的足球反倒是，东边球迷“自虐”，西边球员“焦虑”。

我以我略知变态心理的常识而道，一个人只要得上“焦虑症”，他必然会有一系列的其他毛病发生。无论个体还是集团，概莫如此。凡是责任心过强，特别是被赋予各种过于强大的责任之后，是人就会焦虑。一旦焦虑，他则夜不能寐，寐则不香。自然而然，就又患上了“失眠症”。如不是其他原因，患失眠症者，都是因为想做好事，又怕做不成好事，心眼里发生了巨大矛盾。于是，自己开始强迫自己入睡，结果是死活也难以入睡。类似于催眠术的各种气功，在医治足球病症方面，第一次显得格外无能。小伙们彻夜不眠；第二天起来，浑身无力。身患焦虑症和失眠症的人，总有一些“健康”特征，一是体力差，二是精神低。同时还多疑、恐惧，每做一事，事前就开始寻找各种理由，以应付成功或不成功的各种“责任”。因为焦虑症者的一举一动，已不完全是个人行为，个个夸大了行为的“社会”性质与“政治”任务。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就有了中国足球的各种表现。比赛时只要进了球，马上就会发生焦虑性“成功联想”，他会立刻想到这一进球会完成任务，甚至会联想到这一进球会使大家真正“出线”。想来想去，反倒又使自己忘乎所以，不知所措，让对方抓住机会，猛攻乱打；而当被对方撕破了防线，则又会发生焦虑性“失败联想”，联想到此一失球，就会再一次不能“出线”，完

成不了祖国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从而脸上无光。想到这里，又开始紧张，又开始“不知所措”。

中国足球，其所以每遇大赛，就发生各种“心理问题”，盖与这种奇怪的心理怪圈直接相关。我们的足球孩子，常常是带着“焦虑症”而去拚杀。其心理状态自然难有其好。我总以为，中国的足球水平，并不太低。最起码在亚洲如此。但为什么水平总是不能发挥太好？这完全是因那不正常的心理困绕而“患得患失”。

你越是强调“恐韩症”，中国人面对韩国，还真是有些“恐惧”。

恐惧来自“传染”。人的心理，具有太大的“传染性”。

本无所谓什么“恐韩症”，却硬被几个足球评论家，说得那么恐惧，结果人人传染上了这种“恐韩症”。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初生之牛犊，其所以不怕虎，并不是因为虎不厉害，而是这小小的牛犊没有接受任何“恐惧”的暗示。暗示就是“传染”。

四、“鸟儿”的故事

小孩子，本无什么恐惧。但大人喋喋不休，长期熏陶，小孩子慢慢也就有了“恐惧”。小孩子总是不知天高地厚，因为他并不知道什么叫个“天高地厚”。驾不住经验丰富的“大人们”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各种人生诡诈，各种人生不测，各种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恐惧的故事，孩子们早早也就知道了“恐惧”。中国的孩子懂事早，概因中国的孩子恐惧得早。

中国的足球，就是因为喊了太多的“恐惧”，而使踢球的孩子，失去了“牛犊”之“不怕”，成了一群树上的“小鸟”。

养过孩子的父母，总爱给孩子出一种启发智力的问题。于是，一个奇特的智力题也就天天月月年年乃至代代给孩子讲了起来。

“树上有五个鸟，猎人开枪打下了一只鸟。请问树上还有几只鸟？”妈妈问。

“还有四只。”孩子不加思索答。

“答错了，鸟受了惊吓，都会飞掉。应该是一只也没有。”妈妈纠正。

“……”孩子懵懂，懂不得这个深奥的道理。

这是一个有关“鸟儿”的故事。也是一个急转弯的考题，当然是一个很好的“智力题”，甚至是涉及辩证法的高级“智慧题”。

鸟儿，为什么而会出现这种“**5－1＝0**”的辩证法现象？

以我之答案，是恐惧的心理发生了“传染”。

有心理学家早就注意，单个鸟儿在树上，它并不害怕，即使你向它开枪，只要没直接将它命中，它并没有什么恐惧，甚至你连打几枪，它也不跑。原因就是它意识不到什么恐惧。而当很多鸟（比如智力测验题中的那五个鸟吧）扎在一堆时，情况就相当复杂和微妙。当猎人向鸟儿开了一枪，只要有一个鸟儿受了惊吓发生恐惧，别的鸟就会受到传染。这时，只要有一个鸟飞跑，所有的鸟都会跟着飞跑。一只鸟的恐惧，终于带动了所有鸟的恐惧。恐惧在鸟群中发生了强烈的“传染”。

鸟如此，兽也如此。大草原上的马、羊和羚等食草动物，之所以常常成群狂奔，就是因为其中一只受了恐惧，从而带动着整个兽群乱跑乱奔。恐惧，最容易被无边际地放大，一

旦放大到“信以为真”的地步，就发生了连锁反应，一个个六神无主，风吹草动，人云亦云，人动己动。自己再也没有了理智。动物都怕死，恐惧是死亡的信号。为了活命，只好去躲避所谓恐惧。

鸟兽如此，人又何免！

中国的足球运动，其所以存在这种不甚健康的心理现象。与各种胡乱恐惧的传播直接相关。

中国的孩子本可以踢出较好的足球（哪怕是亚洲意义），却被各种“说风就是雨”的“说法”，害得像鸟儿一样，传染着各种恐惧。

在这恐惧的传播中，其中好些“文学”的说话，报纸的说法，评论的说法，电视的说法，夸张的说话，浪漫的说话，不着边际的“爱国”说法，“振兴”的说法，都会让足球孩儿得上恐惧症、焦虑症和失眠症。

有病不怕，治好就好。

有病不怕，去掉病因就能彻底变好。

1997年11月

“半吊”与足球

——足球“社会问题”新论

一、我的表态

我对绝大多数球迷抱以敬意，并对中国的球迷现象做过历史学的“命运”讨论。但说句实话，我对文化程度高一点的球迷，则另有看法，甚至不敢恭维。

足球离不开球迷，否则其惨状简直难以想象。就像一个男人，如果离开了女人，其生存的意义仿佛都是虚幻。男人喜欢征服世界，而当他将胜利的果实拿回，第一个献给的对象，却不是老父老母，甚至不是兄弟姐妹，而是他心中的那个“亲爱”。足球小伙儿，如果离开了看台上的球迷，就像永远失去了“亲爱”。

普通球迷，之所以可爱，就在其情感表达的方式，较为得体，顶多就是骂人摔砸，发泄完拉倒，多数人则是默然含泪，继续企盼，永远等待。而文化人球迷则与此不同，他在事前事后，都为你踢球者准备好了一个口袋。赢了是因为用了他的计，输了则怪你没文化。总之，口袋是非让你钻进去而不可。

文化人球迷的最大问题，就在于他们在报纸上电视里谈

了几下子足球，突然间感觉良好，个个成了“行家”，成了智商比教练员高，技战术比运动员强的内行里手。中国队**1997**年再度出线未果，就更显得中国足协没有聘用这些“行家”充当“技术委员会委员”是个天大的错误。

如此球迷中，有作家，有理论家，有记者，有学者，有学生；有中年人，有青年人，但鲜有老年人；有瘦的，有胖的，也有不胖不瘦的；有长相英俊者，有长相威武者，却基本上没有丑陋的；最后是有谈锋甚健之男人，且更有巧舌如簧之女人。

如此高素质之文化球迷，总体特点是“人文学科”者多，“自然科学”者少。“人文学科”者，向以“善辩”、“巧辩”甚至“诡辩”而著称。

巧舌如簧，以致天花乱坠者，无论如何也算是个足球社会学现象。最起码是目前不可小视的大问题。

对于中国足球，如果我还有什么问题或建议的话，我则建议足球的教练、干部和领队等“一线”人员，务必研究足球之“社会学”问题，而不要天天泡在“技战术”里面发豆芽，磨豆浆；也不要泛泛而论“心理问题”，以玄治玄。只关心技战术问题，就会陷入被动，被无数个社会问题拖住尾巴，干什么都要“瞻前”（出线问题）和“顾后”（球迷问题、舆论问题）。面对各种“左右为难”之局面，常想以一个“心理素质差”来搪塞文化人球迷，结果总会让一些聪明的家伙抓住把柄，说你在有意回避问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世界上哪有什么独立而单纯的“心理”问题！最起码中国足球界不存在这种“脑生理”问题。不然的话，中国的足球及其干部、队员和领队，个个成了死心眼，被人卖了还要给人数钱花。

所以，我以为，足球的干部、教练，没有理由不懂得一些比“足球”更大一点的问题，有了这种本钱，则可避免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一身狼狈，从而驾轻就熟，避重就轻，一路顺风，无往不胜。

足球干部与足球教练，首先要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我觉得怎么也离不开研究一下球迷问题。特别不能回避文化人球迷问题。球迷是足球的命根子，但也是中国各种问题的策源地。

如果教练员有能力来知晓球迷的各种花花肠子，并划分文化人球迷与非文化人球迷的基本差别，也就更有精力来从事自己的技战术研究和战略部署。球迷现象再热闹，球迷朋友再真情，但相对于足球运动之本身，恕我直言，永远是个“外在现象”，而不会是“内在本质”。但目前的问题却是，现象困绕着本质，从而使你干足球的各类人马，只好是“雾里看花”，越看越花。

明白了球迷，也就掌握了足球。这是我的基本忠告。

中国足球之所以必须发展，一半以上的动力，来自将近**20**年的社会压力。压力的构成，一半是球迷，一半就是舆论。他们鼓励足球，期盼足球，责难足球并攻击足球。如此多种力量合并起来就是压力，进而也就是动力。中国的足球不发展不行，否则鼓励家、期盼家、责难家和攻击家，就会食之无味，就会夜不能寐，就会辗转反侧，就会夜半尿床，就会上班迟到，就会出门忘家，就会走路摔倒，总而言之，就像得上相思病，害上“梅花痨”，什么医生也治不好。干足球者，眼看着兄弟姐妹一天天面黄饥瘦，无食欲，无性欲，无工作欲，无发财欲，于心怎忍？怎能不扯起大腿奋力踢球，以图

知报！不好好踢球，这种情谊，这种缠绵，这种盼望，这种责难，所形成的这种压力，定把你轧成个肉饼，折磨个半死。

不了解这个“国情”，我以为中国的足球内行永远也干不成事，永远会被人家牵着鼻子，左顾右盼，以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全黑不是人。

前此以往，球迷还只是手舞足蹈，痴情缠绵，让你踢球者踢不好球问心有愧，不好意思，难面父老；而今眼下，自从球迷里有了文化人，自从足球成了文化人的半个饭碗，足球之“外在现象”开始翻天覆地，沧桑巨变，文化人话球，有说有笑，有评有论，持之有理，言之有物，比那些只会高喊“我爱你”者，显然是更上层楼，更胜一筹。文化人就是文化人，他能左右逢源，满嘴词汇，大笔一摇，快文即出，条条框框，处处有理。如此这般，有重大“文化”将你笼罩，你这踢球者，自然是六神无主，摸不着东南西北，从而战略丢失，风度全无，你是踢好不成，踢不好也不成。因为你干足球者，“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肚无墨水，胸无词句，手无文章，案无韬略，你在人家的十字路上，进退维谷，天天徘徊，夜夜彷徨。

文化人论球，尖酸刻薄，仿佛不吐怨恨，骨梗于喉，难以解气；你没踢好球，定是辜负了高额门票；甚至人家看球是你生拉硬拽，“抓壮丁”一般，拖上了看台。

只要是球迷，或多或少都是这个样子，都有这样的倾向，文化人球迷再能言善辩，也超不出这个范围。巧舌者“蛊惑”，拙舌者“木讷”。古时之“蛊惑”，皆因巫覡，或女或男，口惊四方，文动八面。

我感慨足球，我更感慨各种足球文章。天下文章，出语

非凡，惊动八方。

二、球迷的特征

足球之发展非要重视球迷之“态度”而不可？我对此问题，始终怀疑。

不管是什么球迷，就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情浓于理，若血浓于水。爱也罢，恨也罢，如火上浇油，从不含糊。于此之外，球迷还有两个特征，一来很像“内行”，说什么像什么，只要你有个闪失小有失误甚至没有错误，都会让他抓住把柄，或幽你一默，或哂你一笑，并最后认定是你没听他的高见；二来是无论你是成是败，都必须符合他（目前更有厉害的“她”）的意志。不合其意，你输了不是个好人，赢了也算不得英雄。

我以为，抓住这三个所谓特征，就抓住了球迷的一切。当然也就抓住了文化人球迷的绝大多数问题。

最近，鄙人有幸参加若干“足球问题”的大小会议。在一次“中国足球何方去”的研讨会上，算是遇到“球迷”问题。那是在中国队“十强”出线未果后的第二天。

出线未果，对于球迷来说，相当于“灭顶之灾”。这种“灾难”自然会让球迷想到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连续五次六次不能“出线”？照他们的逻辑，中国的足球，应该像老农种地“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更比一年好。不能像病秧子过年，年年没有进展；更不能像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球迷的痛苦，应该理解。因为球迷总是抱着“必然”的逻辑。

“必然”的逻辑，必然导致“必然”的热情，进而，必然

的“热情”，又会导致“必胜”的信念。球迷永远是“必胜”的乐天派。否则，他何以花上重金，撇下老小，扔下工作，到足球场上扯起嗓门，为你加油？

“必然”生“迷”，“迷”更生“必然”。好好一个男人女人，看了两场足球就成了球迷，那他一定是吃了某种不拐弯的药，从而肠子变直，脑子变直，心肺变直，从而心中只有必然而无偶然，只有直线而无曲线。嗟夫，我为此感叹，世界多一个球迷，世界就多一份简单，因为世界上又多了一种奇特，只有直肠而无结肠。

球迷的可爱在这里，球迷的悲剧也在这里。

三、巾帼不让须眉

足球者何以会被球迷迷恋？

那是因为直不楞噔的球迷，将你踢球者永远当成了他的意志“代言人”。

球队的一举一动，仿佛都是为他活着，都是为了实现他的“意志”。如果兑现，欢天喜地，万一兑现不了，则悲天悯人，甚至怨天尤人。

就在这个“何去”的会议上，我听到几位球迷的高谈阔论。其中两位女球迷的肺腑之言，实在让我感叹。说句良心话，如果没有两位女性球迷的句句真情，也许还没有我的这篇小文。两位女球迷，恰属于我所说的“文化人球迷”。

一位女球迷说，当中国队将要与卡塔尔队复赛时，她在飞机上。一位语调及情调如牧师者的同事与她说，如果她能喝下一杯白酒，说不定中国队就能胜利。球迷的她并不会喝酒，但为了中国队能赢，还是果敢喝下了辣酒。她以此举，感

动上苍，祈求能赢。此情此景，很像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荆轲要去刺秦王；也像是燕赵勇士，歃血成盟。如此这般，真可谓：“慷慨倚长剑，高歌一送君”。感慨之余，我不得不为此而油诗一首，以表敬意：歃血飞机向中原，我以我酒荐轩辕，请你老儿快开眼，看我足球怎出线！

然而，酒喝了，情动了，球却没出线。

于是乎，这位刚烈如男子的女球迷，开始了另一番历史检讨。

她说她早就看出了戚务生如何如何不行，从长相到谈吐，从用人到布阵，从技术到战术，从思维到感情，从言谈到举止，从走路到风度……总而言之是什么也都不行。正因为这些不行，她联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人家卡塔尔在非常“不行”的情况下，果断易人，换了教练，于是就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机，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关键时刻易帅换将？她认为，一旦换戚，中国必赢。

酒大概是不能白喝。喝了酒就要讨回个公道，换了戚务生，她的那杯老酒才会起作用，进而讨公道。我头次听到如此慷慨陈词，竟半天说不出一个字来。因为这种球迷的逻辑，难以用逻辑与她同等讨论。尽管这是文化人球迷，亦复如此。

另一位年纪稍轻但口舌仍不饶人的女球迷，同样表现了“巾帼”风采。

她的论点，与前者稍有不同，未在戚务生如何长相不行，思维不行方面大做文章，而是就中国与卡塔尔的“阵地战”中大发高见。她以为最不该的就是中国队先赢一球时，进行战术调整，更不应该此时换人，将范志毅从前腰上换到后腰。如此举动，完全是犯了兵家大忌，云云。

阵形在这位女子心中，如同家珍可数，一五一十，倒背如流，清清楚楚，决不含糊。我当时就想，如果还有机会来办什么“大专辩论会”，请戚务生甚至所有国脚队员与此奇女当场辩论，我估计戚家军当场就会人仰马翻，全部完蛋。因为女球迷口舌流利，语词丰富，辩才十足，很像是袁阔成、单田方、田连元、刘兰芳、马三立、侯宝林、马季、冯巩、牛群出场，巧舌如簧，口若悬河，由此而使上下左右，古今中外，顿失滔滔，一片昏暗。她如纵横家苏秦、张仪出阵，妙语连珠，左右逢源，活的说死，死者说活，白里透黑，黑中有红，天上地下，纵横捭阖，石头开花，木头怀孕，飞机坠地，火车出轨，汽车追尾，马失前蹄，猴失机灵，虎失威风。总而言之，经这小小舌头与嘴唇，搅和上眉飞色舞，定侃得昏天黑日，宇宙混沌，难分轩轾，从而让所有干足球的干部队员教练员技术员科研人员，满面无光，满脸难堪，全身焦虑，半身瘫痪，目瞪口呆，口眼歪斜，拙舌笨嘴，一输再输，一塌糊涂，无地自容，最后是五岳无光，九岭塌陷，海枯石烂，长江不长，黄河更黄，鱼渴而竭，鸟疲而亡，火山爆发，地震不断，于是乎干足球的所有人马也只好三呼万岁，叩首称臣，一无怨言，二无怨气，三无怨恨。以致到最最后，国脚们连自己姓甚名何也全然不知，一片空白，就地被擒，等待发落。

这就是球迷的厉害，这就是女球迷的辩才。这虽然只是两位普通而普通之女球迷，足可让人领略其风光与奇伟。

在中国，如果有人干上足球，他最怕谁？队员回答，他不怕教练，也不怕领队，甚至不怕足协，不怕开除，不怕不发奖金，不怕离婚，不怕杀头，却最怕球迷。如果你给他输

了，球迷会嚎啕大哭，犹如孟姜女哭长城，砖瓦飘摇，不得安宁；而当你给他赢了，他又会哈哈大笑，活像是“牛皋大笑金兀主”，让你觉得脊背发凉，全身感冒，冷汗中来；还笑得让你觉得像是电视公告中的“老头乐”，遇到了皮炎康，“怎么也乐不起来了”。

这就是球迷的魅力，也是其威力。

足球专家不解决这个问题，断乎难有明智的选择，活像是尾巴上拖了个“油瓶子”，脚有羁绊，步履为艰。

四、后来者居上

笔走于此，我却读到了最近一期的《足球》(1997·11·17)。上面也有一篇女球迷谈足球。文章的作者是位作家，名叫迟子建，文叫“怎一个‘戚’字了得”。

文章的开头就是一通寻找“病因”：“中国足球‘病’得不轻，是否已经病入膏肓，要等名医会诊”，诊来诊去，敏锐如此作家者，仍旧是抓住了这位老戚而不放：“当我看到一个憔悴不堪、举止木讷、战战兢兢、双目无神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有了毛病了，而中国队在十强战中的表现正是如此。”“我看中国队最主要的症结出在主教练身上。看到戚务生满目憔悴，无可奈何的凄凉神情，我真是觉得他太可怜了。他坐在了一个他本不该坐的位置上，如同莽夫袁世凯非要坐在皇座上不可，只能落个悲惨结局……”

应该承认，女作家也是作家。是作家就有文化，有文采，有口功。看这迟子建作家，就很非凡，已经如我指出，提前进入了内行的圈中，抓住了“中国足球队最主要的症结”，并知道中国队“病得不轻”，全在这个戚务生和他的憔悴不堪。

以我之文学眼光看，该文虽有一些“芜杂”、“托踏”等文学毛病，但其调侃与嘲讽还是独领风骚。女人同样厉害。

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有文化的女球迷非要和这戚务生过不去。中国队固然有些窝囊，但为什么那么多帅小伙儿的问题，干吗非要由这中老年伙计戚务生来负责？

前面两位女记者式的球迷说了半天戚务生不行，这位女作家式的球迷也在指责这位戚务生。而且口径之统一，真让我怀疑是否她们相互通气，就像考试期间，做了舞弊，或由什么专业老师作了考前辅导？

鲁迅善讽，但他曾说，自己从不拿别人出生地和相貌这等“自然”问题，进行讽刺。如今可好，讽刺仍在，却无鲁迅，讽刺居然刺到了鼻子和脸。有了点文化的人，硬是抓住一个中老年汉子的“自身问题”，热讽冷嘲，什么傻大个，什么眼袋大，什么眼无神，什么太憔悴……如果不是女人的羞涩，大概连“阳萎”二字也敢甩它出来。

女球迷如此，男球迷估计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然而，事有例外。十强赛后，我所参加的各种研讨会上，慷慨男士，虽然也对戚务生存在这样那样的愤懑不满，也指出早该撤帅换将，但因理智还算健全，未将屎盆全扣在戚务生头上，未像女球迷这样，出口非凡，眼力很尖，专找下三路突防。

有男人在，终有戚务生之幸运在。

有女人在，难免戚务生之不幸在。

如此这等，幸与不幸，男女之分，森然何等。

五、我的辩护

我和戚务生素昧平生，从无过结，不曾认识。我的言论自然没有“拍马”之嫌。然而，我虽不“拍马”，但要来辩护。

足球如战争，成者诸侯，败者贼。赢了怎么说都可以，即使赢者尚需谦虚，那也只是强调胜利面前别昏头，号称“居安思危”也；而一旦输了，则情况大变，屎盆子定敢给你扣上头。

我总觉得，在对戚务生问题上，球迷尤其那些文化人球迷，或多或少有些墙倒众人推。似乎所有的失败，都由他之指挥不当所造成。教练的作用，第一次在球迷和评论家这里，得到了高抬，而且抬高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

我在一系列有关足球的文章中指出，足球比赛犹如数学矩阵，一旦进入方程，就不是哪个人可以将之控制。矩阵有矩阵的逻辑，它自身的力量远远大于局外人的控制，你想让矩阵中的数据发生变化，都无可能。如此这般，倒让我想起某些类似问题。从我读研究生始，就知道有些研究生，为使论文符合己意，常在统计运算上大做文章，当运算结果与想象不符时，则开始“局外努力”，号称“舍命求相关”，一定要让这些“该死的数据”（请原谅我借用了某位足球理论家所谓“该死的足球”一说）符合己意，于是乎，居然弄虚做假，原始数据，面目全非。

老天爷，足球与此是同一个道理。教练再厉害，也只是场下厉害。比赛一旦开始，双方二十多人形成的那个足球矩阵，由二十多个敌我人员“变量”构成的“巨系统运动”，则是任何人也难以将之“全面”控制。本不能控制，却要“全

面”控制，那只能是如同蒋介石指挥战争，打一仗败一仗。因为蒋对战场上的什么事他都要管，结果不管还好，越管越乱，越乱越糟，以致必败无疑。

同样，戚务生是帅，他负责制定战术与战略的原则，而不可能事无巨细，什么事都管。他哪有如此神力，面面俱到，都能控制！

换人有什么不好？在领先情况下，进行成果保护有什么不好？这是我的疑问。它虽保守，但较为稳当。欧洲的丹麦、比利时甚至瑞典不常常使用这种战术？这种战术与战略不也同样立得奇功？

戚务生的换人变阵，我就觉得很好。问题是这些部署没能赢得胜利。假如要是赢了呢？球迷又该说什么？大家能不像“翻身得解放”那样，去歌颂戚务生之指挥如神，料事如神?！我以为领先情况下，将范志毅后撤，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中国没有太多的范志毅，无法“众志成诚”，抵御外寇，自家那点贫弱之家底儿，无法织成撕不破的网。中国的足球，缺的不是教练，而是球星。中国的大地上，如果遍地都是马拉多纳和贝利，有没有教练我看都无所谓。教练是踢球成功的外因，队员才是最终成功的内因。教练本事再大，不通过场上的孩子转化，断乎不能起到丝毫作用。爱因斯坦再神，但他遇到我这等愚昧而不能掌握现代物理知识者，气死他也不能将我“指挥成功”。

道理本来就这么简单，教练却被可爱的球迷抓住不放，猛攻硬打，左论右道，好像文化人最冷静，最内行，他们的话最为正确，教练员全是窝囊蛋。一时间，全国上下，舆论成风，遂成定论，得出个典型的唯心主义结论：一切都在戚务

生。

冷静如郑也夫先生者，硬是推测戚务生中卡之战，领先时分换上彭伟国有些“迷信”念头在作祟(见《南方周末》1997·11·7有关文章)，如此这般，这也太高抬了戚务生。目前的戚务生，还神不到严新、张宝胜等半仙大仙乃至神仙地步。他目前还是人，他之阵形安排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靠得还是自己的理性而非所谓“神性”。如此这般，安来什么“迷信”者也!

我总觉得，在复杂问题面前，硬在个案问题上寻求“个个击破”，并要以此弄出个“水落石出”，全是枉然。各种分析，听起来固然头头是道，但只要能找出相反的例证，就说明还有问题。

战术与战略是战争的“主观”因素，而不是获胜的全部因素。阵形的布置、战略的安排，无论怎样合理，但如果不考虑对手的具体情况，还是白搭。对方不是傻子，人家也在制定战术与战略。可爱且可悲的就是，中国之球迷老是将对手当成了傻子。对方之变，自己之变，交融在一起，这才构成了一场战争。自己之变，如何在对手之变中相对保持“优势”，这实在是个太复杂的问题。反正这个问题，不是教练员一个人可以解决。只要这个老当家的基本构想没有毛病，能对症下药，他就极端难得，真正负了责任。

借此，我给球迷提个问题，看大家如何解决。

如果我们将诸葛亮搬入赛场，结局又会怎样？我想料事如神的诸葛先生，大概也和戚务生一样，会被各路女球迷骂他个狗血喷头而后快。

过分强调并夸大教练的作用，很像是“登徒子好色

赋”——只攻一点，不及其余。球迷真能“当局而不迷”？我很怀疑。不然，又何有“迷”之一谓？只要自己还承认自己是球迷，他就总会五迷三蹈，迷在当局。迷者，永远不清也。

六、球迷新解

球迷的嘴好，球迷的情浓，这是永远不争之事实。

球迷者，其嘴如机，舌巧如珠，概因其情真意切，不吐不快。

然而，恕我直言，只要身上还有个“迷”字，就永远脱离不了“外行”的本性。无论是球迷，还是戏迷，也无论是财迷，还是政治迷和领袖迷，盖莫如此。

球迷，其所以是球迷，那是因为他根本就不会踢球，或会踢球的水平很低。会踢球的程度越低，他就迷得越发厉害。而当他的球艺高到了职业球员的水平，尽管他今生都爱足球，但他那时就绝不再是什么球迷。我把这种状况戏称为“反函数”现象（这里绝非数学意义上函数，我只是借用一下）。因为球技高到一定程度，许多真实的体会和感受，绝不会让他五迷三蹈，他会冷静地思考每一个细节。

相反，不会踢球的人，总是揪住问题的皮毛大做文章，说起来声泪俱下，巧妙至极，很像个内行，但明眼人一听，全是花拳秀腿，几近胡话，没有一句中听。这就是球迷之“迷雾”和“烟雾”。

天下所有的“迷”都是如此。比如戏迷，对戏剧好像很有一番感情，号称票友是也，他场场必到，回回捧场，但他自己并不会唱戏，即使会哼哼几句，那也根本不能入流，戏迷对戏剧的评价看似内行，着实外行。同理，英雄迷只是看

到了英雄的业绩，而忽略了英雄的偶然；政治迷迷信得只是权力，而没有看到权力背后的倾轧和复杂；领袖迷也是只看到了领袖的风采而看不到领袖的苦恼；科学迷只看到科学的神奇，而看不见科学的局限；艺术迷看到的只是艺术的美丽，而对艺术之乏力、软弱和空洞却视而不见；歌迷更是自己不会唱歌，只看到了歌星之红火；财迷更是手中无钱，好不容易有了三俩，就守住当了宝贝，以至于最后对钱顶礼膜拜，“拜物教”一般。……

天下所有迷，都有这个特征，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似内行，着实外行。信徒的言行，之所以叫做“迷信”，那是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庙里的神像是人造的假货。

“迷”及“迷信”的另一特点就是，越是远离崇拜物，越是不了解内情，就越是起劲的崇敬以致崇拜。山村野民，对皇帝的崇拜，就比宫廷太监厉害许多。因为宫廷太监无论如何还算半个政治内行，对皇帝老儿的所作所为一目了然。

由此看出，越是外行，就越是容易发生“崇敬”、“憧憬”乃至“崇拜”，到最后就变成了十足的“迷子”。足球，其所以还有那么多的球迷，就是因为这些人太羡慕人家踢球而又不会踢球，以致不得不加以崇拜。为了崇拜成功，而又不得不将自己打扮成“圈内”行家，或评点技术，或议论战略，或批评教练，或当即指出不该换人，或命令前腰应该包抄，或叫喊后卫不能死守等等。仿佛教练是傻冒，队员也是傻冒，千万人皆醉，唯有他独醒。文化人虽有文化，但只要做了球迷，也就开始了这般。越是文化人球迷，就越是很像个内行。

高谈阔论之后，你给球迷一个皮球让他踢上两下，真是

不好意思，全然连个定位球他都踢不出个象样。文化球迷们，则连我说的那种“农业社会”中的“静态足球”都踢不规范。

各种文化现象之“迷”，都是各种专业的外行。如果说他对这种专业还有什么水平，充其量算是“半吊”。就像戏迷哼哼，哼来哼去，外行人听着像，内行人听着全不像。

以我之从事体育运动若干年，尚有某些体育比赛感受的资格，各种“体育迷”实在是见得太多，以致今天不得不指出，“迷”者乃迷信也。

迷者，总是身不能已，心向往之，万分喜爱，百倍敬仰，情大于理，理服从情。于是各种“迷”的态度，只有两个，那就是“爱憎分明”。

你为他赢了，符合了他的崇拜意志，他就爱得你脚上长疮，头上流汤；输了则恨你好树不成材，好铁没成钢，屎盆尿盆，蜂拥齐上，让你遗臭万年。

我以为，球迷的感情，我们一定要百倍珍惜，但球迷的技战术意见，基本上可以不听。文化人球迷的“专家”意见，就更是可以忽略不计。以迷者之不会踢球，没有“本体感觉”这一事实而言，断乎肯定，“迷信家”难有象样的高论。

去掉迷雾，方见晴空。足球内行，一定不要被外在的某些“社会现象”所困顿。如此这般，良苦用心，实在是想为足球内行们，献上一点拙计。计当何用，路在何方，应该说不言而喻。

1997年**12**月

足球应该得"十分"

——我为体育改革献一计

无论中国人对待足球，心情如何复杂，足球都已深入人心。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无论体育政府部门如何盘算自己的利害，足球是一个胜过一切项目的"最大运动"，这也是没有疑问的事实。

问题恰恰是，人们天天嚷嚷足球，天天振兴足球，却又不从根子上寻找中国足球的病因。即使去找一些病因，那顶多也是隔靴挠痒，浮皮潦草，大而无当，小而不及，说说而已，总是找不到病根上去。有时，那问题找得让人可笑，甚至不如不找为好。

中国足球的病因，说起来简直太多太多。国家体制有什么问题，它就有什么问题；民族有什么不足，它就有什么不足；文化中存在什么缺陷，它就明显存在什么缺陷……

我于以上各种问题，今天不加多论。何况现在的足球，已不简单是一个"体育界"的小事；更何况现在的足球"论"家，多不乏人，"品味"不低。尽管"家"们论球，不免坐而论道之小嫌，但毕竟架势很大，说法很多。

这种情况下，我只能谈点其他。

我只谈一个大家都不应该忽略的问题。

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中国足球，想要“快快”有些进步，估计是困难重重。这个问题不是别的，就是足球在中国体育比赛时的“得分”问题。

一、从一种“战略”说起

自古“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体育更是这样，不懂体育的“迷”，总是一见赛场上的热闹，就兴奋就心动，动辄想当体育明星，即使当不了明星，也要坚决“崇拜”他一回。而懂体育者，或一辈子以体育为饭碗者，则从不敢这样发疯般去“迷”，而是必须悄悄想着赛场后面更为复杂的其他问题。

无论在体育界内，还是在体育界外，我总还算是“懂些”体育。我因此而常常思考一些体育问题。其中，今天的这个足球“得分”问题，就是我长期考虑甚至我五年前在贵州等地讲学时，发表看法的话题。

而想说透这个话题，则不得不从一种“战略”说起。

在中国的体育界，有两种“战略”。一则为“奥运争光战略”，一则为“全民健身战略”。后来这两个“战略”更改了名称，叫做“计划”（“计划”与“战略”除了文字有别外，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这两个“战略”中，内行人谁都知道最重要的就是“奥运战略”。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庞大一个国家体委的存在，也不会有地方省市的各级体委的存在。国家有“奥运”战略，地方自然就有了“全运”战略。某种意义上讲，地方体委的“全运”战略比之国家体委的“奥运”战略，还要厉害，更能凸显其“领导价值”。换句话说，地方政府如何考核当地体委

的业绩，常常是以“全运”战略之成绩好坏来判定。虽然这几年全国上下都强调了“全民健身”，但真正的硬指标考核还是在“全运”，因为只有这个“战略”可以实现竞技运动的成绩。

这是一种责任，当然也是一种压力。有了这种压力，才使得地方各级体委的工作，必然像打仗一样，考虑“谋略”。上什么项目，弃什么累赘，必须拿到多少奖牌，以完成什么样的任务等等，总是任何一位地方体育长官考虑的头等大事。

二、成本太高，砍杀“足球”

不算健忘的人，都应该记得，在一个不算长的时期以前，中国的各省市，都曾有过自己的“足球队”。甚至多数省市都有两到三个足球队，即一队、二队和为之输送人才的重点体校队。

这种格局曾经持续过好长时间，而当进入80年代中后期，各省市就开始纷纷砍杀大球项目。各省市所有的体育项目，基本上都是奖牌多的项目，诸如田径、游泳、武术、体操、乒乓球等等。大球所以遭砍杀，原因很简单，它太耗钱财。

三四十个人组成一个足球队，到头来并不能在每四年一次的“全运会”上拿到什么牌子，我干吗要养这种东西?！这就是“战略”决策后的“认识”。

有此小九九之后，中国的大球，就算开始真正遭殃。因为你省市一级不重视这种项目，个人再有兴趣，又怎能自己“跑”到国家队里？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足球，就开始像鱼池之水，一天天见少。其中的鱼儿自然也因此而一天天或病或

瘦起来。

球迷，每每看到中国足球不能有所作为，就开始发火骂人，可就是不好好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每每赞美过球迷之后，总要批评球迷，其所以批评，就因为球迷总是不能向象棋大师学习，会做“长考”。不会“长考”的人，就会短视，就要瞎着急，就会游谈无根，就会“情商”过人，就会脾气大发。

在我看来，中国足球的最好水平，是苏永舜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带领的那支队伍，里面有容志行、古广明、迟尚斌（兄弟）……等等真正的好“脚”。而且当时的冲击亚洲，并不是由于水平不高而未果，则是命运不济，被人放水，耍弄了自己。绝不像现在完全由于水平明显低于对手而步履蹒跚。苏式队伍所以水平“最高”，重要一点就是“文革”的闲散岁月，为中国的足球积累了这批精英。容志行、古广明和迟尚斌学习踢球和正式踢球，都是在那个“闲散”岁月。如果有谁不信，他们都还活着，可以直接去问。

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必要时间和人才的堆积，就不能有充分的足球发展。

然而，中国足球，何以越发展越“落后”呢？

这与我们谈到的那种“全运”战略直接相关。

中国虽然有太多的人在热爱足球，甚至盲目的狂爱足球，但又有几个人能好好踢上足球？即使有若干孩子喜欢踢球，又有谁能将之选到应该去的地方，并将之“继续提高”，乃至培养成真正的“国脚”？

我常常在北京的过街地道里过往，常常能看到一拨小男孩儿在里面踢球，他们踢得如此酣畅，如此卖劲，如此投入，

我不得不想，他们真是错生在了中国。如果他们生在了巴西，说不定又是一颗璀灿的明星，当不上“黑贝利”和“白贝利”，最少也能当上个“黄贝利”。可惜这些孩子生在了一个“没有足球场地”继而“没有足球”的国度，他们也就永远不能成为“贝利”，甚至不能成为亚洲的足球先生。

人家要的是全运上的牌子，你足球并不能换来牌子，于是只能将你小子割舍，你也只能在那过街地道里瞎踢瞎乐。

将足球等大成本项目砍掉，最终的结果就是现在这种局面。急死你球迷，别想立马看到冲出亚洲的好戏。

三、寻求新路，但仍有问题

进入90年代，国家体委大概深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于是进行了“足改”。体育界常常这样讲，中国的体育改革，首先来自“足改”。

让足球进入商业机制，算是对以上所述情况的一种着力“修正”。

有了中国人自己的“球市”之后，中国的足球才算稍稍有了一些希望。差点被“全运”战略挤死的这一“最大项目”，真像是围棋比赛，只在“最后一口气”的情况下而慢慢苏醒，僵尸复活。

所以，我以为，尽管目前足改后的中国足球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总比以前的那种“坐以待毙”，“奄奄一息”，要好出许多，它总算是对那种“杀鸡取蛋”式的“谋略”，予以沉重的“反正”。她毕竟为了解救足球，而做了努力。更何况这一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成绩！

但是也应该看到，现在的球市，是以“经济”论高低。有

钱的省市可以养得起足球，没钱的省市自然就成了足球叫花子，只能看球而不能踢球。

即使是“经济”好的省份，也存在问题。人民将足球交给“老板”，老板自然要考虑足球会给他带来多少价值。如果投入 **200** 万，能换来 **3000** 万，他则必干无疑，而如果他投入 **100** 万，换来的却还是 **100** 万，甚至低于这个水准，他第二年准保不再养你这个“只花钱，没收获”的足球败类。

我于 **1994** 年夏天，曾在鼓浪屿旁，与厦门市的一位体委负责人，聊过当地的足球问题，他之对“老板”的那种经济盘算，实在是伤神无奈。经济特区如厦门者，不过尔尔，更何况那些经济上不如厦门的内地省市？

在目前中国，将足球全面“商业”化的一个小小不足，就是足球的命运全掌握在“老板”的手中。老板高兴了，足球可能还有些后劲，老板不高兴了，足球就开始发烧感冒带拉稀，全身没有任何气力。

这种情况下，如何全面推动足球改革，并尽快满足人们对足球之“强烈期望”，我以为，还需另找出路。

四、不妨让它得“十分”

既然商业足球有些“受控于人”，受制于“老板”之脾气好坏，那么，我以为在“全运会”上另做文章，则可以大大推进这颗足球。

现在的全运会，不知是继承了那家的规矩，计分的方式，有很多不合理之处。田径有百十来块牌子，游泳也有六七十块牌子，三五个人的体操也有十多块牌子，乒乓球也有差不多十块牌子。唯独成本极高的足球，太不公平，累你个半死，

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也只是一块牌子。

从计算金牌奖牌并多拿金牌奖牌这个角度，我自然同情那些勇敢将足球等高成本项目砍掉的各省市体委，因为他不这么干，手中的那点钱发挥不出威力，拿不回牌子，不好交代。我将这种现象，曾戏称为“舍命保牌子”。足球这孩子，在中国的命就是不好，遇到心狠的家长，只好像个“后娘养的”。

但如果把全运会的规矩做一些改革，则足球就不再是“后娘养的”，立马会变成“亲娘养的”。这一变革，就是将足球的计分，由现在的一块金牌，变成**10**块金牌。第二名拿**10**块银牌，以此类推，第三名拿**10**块铜牌。

为什么不多不少，非让足球得十分？

因为足球是复杂运动（在哲学上包含的“运动形式”最多），参加的人最多，投入的钱最多。这样一来，即使足球得**10**分，平均下来，也只相当于田径一人得一金，甚至还不如田径游泳的“匹夫之勇”。

有这样的计分改革，我相信，不久的将来，神州大地，就会有更多的“孩子”狂踢足球。到那时你就是挡也挡不住中国足球水平的整体提高。因为你不干，各级体委还着急着拉你下水，快踢足球。足球，踢得人多了，就踢得好了，这是唯一的真理。

也许会有人问，如此计分改革，世界没有先例，又算哪家“规矩”？

如有人问，我则会答：规矩在于人定，为了神州足球，立此规矩，又有何仿?!

自古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则说，高分之下，必

促足球。

只要还有“全运会”，为什么就不能稍稍偏袒一下足球？在中国这样一个“足球弱国”里，给这个孩子加点营养，又有什么不好？

真他妈的！

1998年**1**月

第一次"大度"

——"巨能"奖赏戚务生30万有感

一、戚务生赋得永久沉默

中国足球出线未果，戚务生因此而倍遭攻击。

攻击者，最具威力者，除了球迷，大概就是舆论。

舆论中既有各路记者大人，也有足球评论人士，甚至还有"大感足球兴趣"的文学作家。如此这般，只要翻翻 **1997** 年 **11** 月份的报纸，谁也不能否认。

然而，中国人有健忘的毛病，今天不提昨日的事。昨日骂了人，今天也就应该将之忘记。似乎这样才能赶上新的时髦。

我不是健忘症患者。于是在戚务生成为"历史话题"之后，在"新一代国家教练"尚未选出之际，却因另一事端而专门写下有关"昨天"话题的这篇文章。

中国人之一种毛病，就是爱冲动，非理性，不思索，爱激动。从中国人观足球这一小事，即可看清这种毛病。十多年来，四五位教练，都因"未果"而由香变臭。先是苏永舜，后是曾雪麟，再后则有徐根宝。几员大帅落马之后，中国人胃口要变，于是就又想起了洋人。当洋人施拉普纳进京时，你

看当时的中国舆论，几乎千篇一律，都认为中国足球，仅此一举。如果不成，没有他法。我当时虽然曾写文章指出，施拉普纳在中国不会有太大出息，因为我中华民族，目前尚不具备踢出世界一流足球的某些可能。然而，人微言轻，我的话当然不会引起“舆论”的注意，相反，倒是大家都在那里一个劲儿地进行舆论“炒作”，非让这位洋人大有作为而不可。

施拉普纳这位可爱的洋人，毕竟是“头脑简单”，对中国文明几乎是满眼黑。他没有学过中国历史，不懂得中国的“巧妙”，栽了跟头都不知原因何在。

这洋人费力未能讨好，最后又让国粹球迷骂了个痛快。

这种情况下，将洋人换下，才又“一致推选”出了“土著”教练戚务生。

几年间，戚务生几过家门而不入，二尺九的腰围缩小到二尺四，满脸英俊累成了满目憔悴，他及弟子十多号人马，二百多天（已为世界之最）全封闭训练，吃尽苦头而无怨言。结果还是出线不成。不成，已是最痛苦的痛苦。然而，比这更加痛苦则是中国球迷的弥天大骂和大腕记者的漫天讨伐。

国骂也好，嘲讽也吧，殊不知中国人踢足球，这本身已是一种“冒险的尝试”。

戚务生，只好在潮涌的舆论中沉默，似乎也得永久沉默。

在中国，谁搞足球，谁就意味着找死。

他就会变成“刀笔吏”之文章鬼。

他就会变成“球迷”们唾沫下的冤死鬼。

二、“巨能”善待戚务生

中国的人群中，有疯子，也有正常人。

戚务生吃了哑巴亏。社会情绪虽然"墙倒众人推"，但毕竟也有"逆潮流而上"者。"北京巨能公司"，就一反常态，不缄其口，以自己的行动，善待着戚务生这位"最痛苦的败军之将"。

刚过完新年，1998年1月19日。在北京梅地亚新闻中心，"巨能公司"及其副总裁召开新闻发布会，要对"中国主教练戚务生颁款30万人民币以重奖"。

舆论界却大为不解，以为这是花招，差点以为这是神经病的壮举。

而在我看来，这是个"反调"，是对社会情绪的刻意"反动"。这种"反动"的意义，就在于让社会多一分理性，多一点温存，多一点分析，多一点合作，从而少一些发作，少一点牢骚，少一点丧失历史尺度的偏执与激情。

据报导，如此重要之"反动"活动，戚务生却没有出席。如此这般，我总觉得戚务生不是不爱钱，而是有苦难言，他需永保沉默。

戚务生领不领这笔钱是一个问题。我今天要讲的则是另一个问题。

我的问题就是中国社会中需要这种"理解"。为戚务生颁奖的副总裁李成凤，并不懂足球，但他的足球言论，则比好些专家更有"善意"。他说："我们愿意通过这一行动，唤起对一位中国足球作过贡献的人的理解和宽容。这位败军之将，在历任国家队主教练中，无疑承受的压力和误解最大，是首当其冲的社会情绪宣泄的对象。巨能公司谨以区区30万元之数挽回一点公平，体现一点抚慰。"

我以为，这是对社会上"足球情商"之弥漫，予以适当

抵抗。

三、一种“态度”的启示

“巨能公司”者何，我不清楚。

有钱愿意“送”给中国足球，除了“善举”之外，就是一种责任与态度。

大是大非面前，有钱人除了有钱相送，也就别无他法。钱就是他们的态度。

对“败将”不弃，应该说这才是好的品质。我由此一点，倒是想到古代中国军事上的不少问题。这种问题就是，历代王朝对“败军”和“败将”一概“摒弃”。

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像李广这样战功卓著之“飞将”，曾因势单力薄，而被匈奴活捉，匈奴知李广是汉代名将，于是便没有将之杀掉，而是善待有加，倒是李广身为汉将，不降匈奴，便开始装死，装死间劫匈奴兵马而飞，逃回了汉营。

照理说，李广不降匈奴，在如此恶劣险境中逃脱而归，回来后大汉皇帝文武大臣怎么也应该像现在的美国人对待自己的俘兵那样善待有加。想不到，我大汉帝国，依据其“汉法”，李广的下场竟是“当死”。只因尚有军功，最后才“赎为庶人”，且落个“无赏”。庶人者，百姓也，无赏者，没有口粮供奉也。

李广者，所以得了这么个下场，大概就是因为被人“擒”过。被“擒”，按今天的话讲，可能就是“败”过。“擒”也好，“败”亦罢，大概都是“屈辱”。中国的大汉帝国，

别看它那么雄浑，却是个十足的“小心眼”，竟不能容忍李广这种“被擒”之“屈辱”。于是“汉法”中老早就有了“贬赎”李广等败将的条例。

中国人自称为“汉人”，大概是因为汉帝国强盛之缘故。而汉代之不能容忍“失败”甚至决不容忍李广这种“屈辱”，却为以后中国人的一种坏心理奠定了基础。

目前中国虽然没有了王朝，没有了帝王皇帝，但小老百姓却倒像当年的皇上，个个“小心眼”，容不得各种失败，甚至容不得体育与足球中的小小失败。

这种坏心理品质至今都在起着非凡之作用。

当今世界，实在是“美好”得出奇，理性的力量升高，终使战争减少。战争减少，虽然是人类和平之大愿，但毕竟因此也少了许多“元帅”、“将军”和“英雄”的诞生。或者说，不少喜好斗勇犯武之雄性公民，因为战争之减少，而失去了“用武之地”，于是，战争之狂热，只能拿诸如足球篮球等“游戏战争”来代替。本来是游戏，玩玩即是，发泄一下身中“攻击”欲的毒素即可。说绝了，聪明如目前若干“理论家”、“评论家”般的学问家，可以从这些“游戏”的侧面做一些“国民性”方面的研究，也就到顶了。

然而，中国人毕竟是“汉人”，好毛病与坏毛病共存。不容“败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对苏永舜、曾雪麟、徐根宝、戚务生甚至洋人施拉普纳一律不能容忍。

这大概就是从大汉帝国那里学来的一种“难以容忍”的品质吧。

而今李广在世，让他带个足球队，大概还要遭到各类“儿孙”的“贬斥”。

中国人不能容忍战争中的“被擒”，甚至现在不能容忍游戏中的“出线未果”。

这无论如何是一种“小心眼”。只要你读读几个“开明”作家的“恶声恶语”，就能明白什么是中国人的“小心眼”。

北京“巨能公司”的老板，大概也不懂什么历史，也未必知道“李广被擒”之后的“遭贬”。但他们今天的“奖赏败将”，则让我高兴。因为这是中国人的第一次的“大度”。中国人中，最缺乏的不是“小心眼”，而是“大度”。

既然是如此大度，我就有感而发。

1998 年 **2** 月

危险的信号

——霍顿教鞭下的故事

一

戚务生时代，早已结束。中国足球的命运再一次寄托给了洋人。

如此这般，犹如中国的“社会发展”，是固守国粹，还是开放国门，最后却不得不开放国门，并“师夷之长技以治夷”。

英国是现代足球的诞生地，但又是欺负中国的最甚者，是霸占中国香港的大罪魁。中国人不计前嫌，在其“出线未成”之后，重新将教鞭移交给具有民族心理冲突但技术水平明显高人一筹的英国佬。这本身就有足够回味的内容。

中国人聘请外国人执教足球，霍顿并非首席。

施拉普纳与霍顿，一位是德国人，一位是英国人，俩人无论长相还是气质，都有不小的差别。但今天的霍顿却与昨天的戚务生，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逻辑相似，甚至相似到了非有文章大做而不可的地步。

施拉普纳赴东来华，刚刚踏入国门，各路记者就开始着“炒闹”，以致那时的球迷就像现在的气功迷们一样，甚觉教

星即将下凡。

然而，事与愿违，中国队不能出线。这样，中国人又才怀疑起了洋人。这种情况下，才又将教鞭转让给了土著国粹戚务生。

戚务生执教之后，如同今天，也是进行了一场"热身"比赛，且成绩非凡，惹得记者舆论们大加"炒闹"。大家觉得中国足球之命运还是同胞执掌更可靠。

戚务生，就这样，在命运怪戾，风云莫测之际，登上了"民族运动"的足球祭坛。然而，这是一个不幸的汉子，他先是大英雄，后是老百姓，最后是一败涂地的黑狗熊。戚务生在他的足球历史坐标中，画出的就是这样一条衰落的曲线。

二

今天的霍顿，再一次登上了中国"民族运动"的足球祭坛。而且他现在又一副"英雄"的模样，抛洒着各种由他来说的漂亮词语，抛洒着各种记者可以随意发挥的评价和预测。

奇怪的是，刚刚组建三个星期的中国足球队，突然间参加了一种叫做"东亚四强"的"比赛"。而且，在这种比赛中，中国队竟然又是一番不凡的表现。据某"特派记者"之报道，"中国队赢得了一场能够证明自己价值的比赛"（见《中国体育报》98. 03. 09）。比赛成绩在四个队中排"第二"。

成绩好，自然要进行一番兴高采烈的采访。这是永远的惯例。这次比赛自不能免。采访的结果，自然更让人觉得心满意足，仿佛中国队绝非败将。

在同天的报纸上，"特派记者"采到了这样一些"外国"评价：

日本队主教练冈田武史说："我对中国的印象从来没有改变，他们个人技术好，速度快，而且体能也很好，现在在战术上很注意协防，是一支非常好的球队。"

韩国队主教练车范根则说："我现在还不想对中国队做出评价。"但"（韩国队）和中国队比赛，使韩国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们需要改进提高的地方还很多。"

香港队主教练彭利莱说："中国队和韩国队、日本队一样，是亚洲的强队，球员在个人身体素质方面非常突出，有高度也有力量，但在技术方面还有待改进，中国队正处在发展之中。"

外国甚至香港特区做如上评价说。

而我们中国人自己如何看待这种"成绩"？

"特派记者"自然是"急贫下中农所急"。请看如下报道：

中国队领队李传琪说："在这次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队的整体攻防有所提高，队员们认可了霍顿的训练意图，也发挥了水平。"

教练迟尚斌道："这次比赛我们打得不错。虽然赛前训练时间不长，队员对霍顿也不了解，但大家团结统一，三场比赛中尤其是防守非常好。这次比赛也让亚足联和亚洲足球界重新了解中国队，我们自己更应该从这次比赛中获得信心和勇气。"

教练金志扬说："比赛结果体现了霍顿的训练效果，中国队每个人的职责、位置和全队的阵形都得到了明确。而且中国队在自信心、凝聚力和攻防能力这些方面都有了提高。"

三

瞧瞧，中国队哪像是没有冲出亚洲的足球队！综上报道，完全像是巴西阿根廷水平，简直是要什么有什么，各个方面不是提高就是有效。

由于比赛精彩，且有如此巨大“进步”，“特派记者”立马在报纸上总结出了获胜的三条“法宝”：即“强调整体，保持阵形”、“用技术重塑中场”、“定位球是得分手段”。最后一点“不足”，仅仅是“进攻尚显单调”。

看看，中国队成就大于不足。如此佳绩竟是在“进攻尚显单调”中获得，如果不是因为“进攻单调”，还说不定会取得什么更好的成就。由此我们推断，中国队的确是水平很高，只是遇到普通如“冲击世界杯比赛”时，大概是不想发挥，于是也就成绩不佳；而一旦遇到高级而特别的“东亚四强比赛”，则才精神百倍，信心十足，从而发挥个淋漓至尽。

“特派记者”对此骄人成绩，配了一个很好的题目，叫做“初识庐山真面目”，副标题是“从东亚四强赛看新一届中国队”。

“新一届中国队”之“庐山真面目”到底如何？

其实，人马全是“老”的，队伍还是过去的，甚至真正的教练还是中国的（因为毕竟有迟尚斌和金志扬两人在霍顿之侧）。

如此看来，这支队伍并不是什么“新一届”，只是他们的头上换了一个不同的手执头号教鞭者。

庐山的确太大太玄，太让人难以捉摸。一个人花费几十年观察、捉摸的功夫，也难有个象样的描述。长期的失败，多

次的失望，以及友好比赛、商业比赛等次要比赛中的一系列成绩和胜利，交织一起，确如雾中之景，一语难尽。否则，哪还会让这位可爱的记者，又一次“初识庐山真面目”?!

在我看来，“庐山面目”识识可以，但“庐山真面目”到了记者这里就可得以“初识”，则有些别种的况味。

你看看报道文章中的各种说法，赞美加矛盾，简直分不清彼此。外国人如日本人韩国人甚至我们的香港同胞，都在说“中国队真优秀”，中国的教练更是看到了自己队员的“提高”和“长进”。迟尚斌觉得中国小伙儿还对霍顿不了解，而金志扬则说孩子们已经“认可”了这位洋人。日本与韩国一个劲猛吹中国，中国人在自觉“提高”的同时，却倒是摸不着东南西北，发生着评价上的逻辑矛盾。

我觉得这种“东亚四强”比赛，本身就有些值得玩味的地方。

四

“四强”一谓，虎虎有生机，仿佛天底下没有什么更强，也就这么四个了不得的足球大国，但前面冠以“东亚”两字，着实又让人觉得被涮了一回。日本和韩国在世界足球的大舞台上，从来都是被踢得个屁滚尿流，这回也被打扮成了“强人”，中国队虽没出线，也因为东亚实在无人，从而摇身也变成了“强人”。滑稽而可爱的是，连广东队都赢不了的香港队，也因此而成了“当然”之“强队”。

这种“东亚四强”，真有些自欺欺人的意思。如此说法和做法，也很像现在的浮夸干部，为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自己先来他一回创造和发挥，瞎胡搞出许多莫须有的数字和报

表，却要变成可向社会公布的"最权威数字"。最后，因为这些数字"做"得好，更是常常得奖或官升一级甚至好几个台阶。

中国足球队，自己拿着"东亚四强"检查自己，并"初识庐山"的、"真面目"，进而而有了迟尚斌式的"信心"。如此这般，我们的外行绝不能将之理解为中国队低能，而应理解成智商太高。

中国人的"最优秀品质"，在我看来，就是健忘。昨天还是痛哭流涕，躬身自检，自我对照，己不如人，亚洲二流，"初级阶段"云云。刚刚过了一两个月，突然间就是阴霾散去，再无"阴影"，一片蓝天，红日高照，信心十足，技术过人，中场厉害，攻防不错，而且由于"真"的厉害，倒在比赛中"进攻尚显单调"。老虎与羊玩，玩着玩着，就开始发腻，于是也就单调了起来。

在我看来，"进攻"之"单调"，完全来自于"心态"之"单调"。而单调的心态，断乎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施拉普纳吃了个大亏，霍顿必定也要吃这个大亏。只是这个洋人傻冒，没有丝毫的中国智慧，到时候吃了亏还不知道原因所在，现在他还傻乎乎在那里发表着类似于将陷自己于麻袋的高调言论。因为他让中国队在"东亚四强"比赛中，"初步"找到了"强人"的感觉。

由于中国队现在又有了"强人"的"信心"，不久，就又会走路摇晃，摆出一副阔人的模样，像"真强人"一般。如果再打上几次"商业"比赛，尤其是赢了"商业"比赛的外国名牌劲旅，则这种"强人"形象更要大增。

但过不上三年，只要再遇到真正的强人，我们这种鼓吹

起来的“强人”就要发“尿”，就像花拳秀腿遇上了持枪者，就像长矛大刀武林好手遇上了坦克兵，就像牛车班遇到了汽车连，就像是土财主遇到了真富豪，就像是万元户碰上了银行家。

我觉得中国足球队的“庐山真面目”恰在这里，且总在这里，而绝非“特派记者”的那种巧妙说法，更非外国人如韩国教练、日本教练各种美听动人的说法。照我看来，日本人和韩国人的言词，与其说是夸中国，不如说是害中国，让你在“美感”中自杀。而我们某些业内人士，如同超级球迷一般，就爱听这种“美言”，听过之后，倍感舒服，忘乎所以，到头来却败得莫名其妙。

现在的中国人，常常忘了自己的优秀祖先。最起码不少有文化的“足球家”，未曾研究过《史记》中的“纵横家”。我劝大家，多读几遍《史记》，多了解“纵横家”的话外之音。如此一番，脑子里才会多几根弦，才会听出“人家”的讲话是真心话，还是真正的暗藏“杀机”。

中国人挺爱犯“老大帝国”的毛病。毛病的核心就是自大，而且是没有道理的自大，是自欺欺人的自大。

我总觉得“东亚四强”的比赛荣耀，或多或少有些“自大”的味道。

其实，这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1998年3月

附录 1

如何进行体育研究

体育科学是人类认识体育现象的知识总和，是体育运动的重要精神形态。今天，凡牵涉训练与科研相结合、体育实践的动力机制、竞技运动中的生产力等等重要问题，无不与体育科学有直接关系。本文即想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一般进程和事物“基本运动形式”的规律来探讨一下体育科学的基本特性及其发展问题，以消除某些长期令人不解的困惑。

一、人类认识自然的基本过程与体育科学的晚熟性特征

体育运动是一种特殊而古老的自然现象。认识这种特殊现象的体育科学，必然受人类认识总体自然现象的基本规律的支配。

从科学的起源和各个学科的发展来看，总是有先有后，有的先成熟，有的则难成熟。比如，大量统计材料表明，天文学和物理学较之生物学总是先走一步，并取得较大进展；生物学比心理学更为发达；心理学比社会学又成熟一些。正因如此，法国的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了“科学的等级”的概念，把世界区分为“无机物理界”和“有机物理界”。本世纪中叶，美国进步哲学家 L·A·怀特又作了进一

步分类，并指出各具体学科如何循着孔德的“科学等级”而进展（见表）。[①]

科学等级	物理科学	生物科学	社会科学
典型学科	天文学 物理学 化学	解剖学 生理学 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 社会学 文化学
进化方向	——→		

这个概括是正确的。从人类知识进化的基本框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科学的成长总是先简单后复杂，先无机后有机。体育科学作为专门解释人体运动规律的知识系统，天然注定了其晚熟性，因为它必须在生物科学逐步成熟之后才可能发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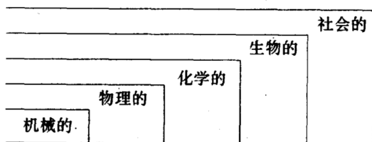
这就是体育运动的古老性和体育科学的晚熟性的困惑背景。

二、恩格斯的“基本运动形式”与体育科学

恩格斯关于“运动形式”的哲学阐述，十分有助于我们

① 怀特《文化科学》第53页，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揭示体育科学的晚熟特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直到思维"，"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他将这种由简到繁的"基本运动形式"又分为五个等级，即"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在这种等级结构中，每一种高级运动形式总是包含着前一种低级的运动形式（见图)。



恩格斯又说："我们看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物体的力学，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紧跟着它，几乎和它同时而且有些地方还先于它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有在这些关于统治着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的不同的知识部门达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有效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进程，对这些运动进程的阐明，是随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而前进的。因此，当力学早已能够用那些非生物界也有效的规律来适当地说明动物中因肌肉收缩而引起的骨骼的杠杆作用时，其他生

命现象的物理化学的论证，几乎还处于发展的最初阶段。”①

体育科学的学科进展情况正是这样：以解释人体运动的解剖学和杠杆力学最先成熟，并在田径、体操等位移现象最明显的项目中得到较好应用；在此基础上，以解释人体运动时能量转化和机能变化的生理学和生物化学随之发生；在生理学基础上有了心理学的发展和应用。然而，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体育科学的这些“发达成熟”仍十分稚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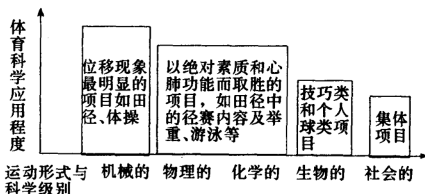
三、体育科学及其应用程度

作为人的特殊运动，体育运动属运动形式中的高级形态，是“人体运动”与“人的运动”的复合。因此，体育科学在涉及运动员较复杂的技能练习（如个人球类项目）时，其有效解释程度便不十分完满，因为一切技能的本质多为心理少为生理，而人的心理活动远比肌肉运动和生理现象复杂。在解释集体球类项目的“配合行为”等“社会”现象时，也由于受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巨大制约而颇显艰难。即使在田径、体操运动方面应用程度较高的生物力学，在研究中也是尽可能把运动员的运动理解为“刚体运动”，或抽象成便于寻找轨迹的“棍图”，并有意省略掉运动过程中运动员的神经运动和生理能量的关系。

运动员这一“人”具有极大的复杂性。目前，每门体育学科的应用范围都十分有限，研究的只是运动员行为的某一层面，还未能出现一种能将运动员各种运动形式加以统一说明的理论。若将体育科学与运动项目进行对应排列，用恩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

斯的运动形式理论简述体育科研的应用程度，那么，越是单纯的位移运动（如田径）越能获得某种解释，越是复杂的技能运动（如球类）便越难得到解释（见坐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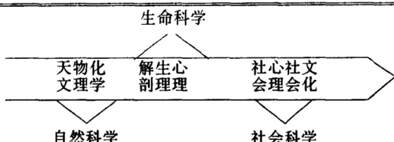


（坐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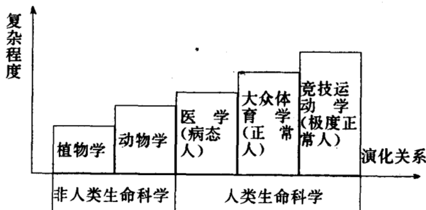
从坐标关系中可知，越是涉及运动员心理活动和社会学机制的项目，科研成果的应用程度便越小。这主要是受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水准较低的局限。

四、生命科学中的体育科学

从考查上述最简单的位移运动到最复杂的思维运动所涉及的不同学科和层次即可看出，体育科学恰恰是处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生命科学（见图）。



生命科学是连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中间环节，包含着无比丰富的研究内容，但至今开发严重不足。体育科学作为生命科学的一个分枝，又有其突出的特殊性。它既不同于研究简单生命形态的植物学，也不同于较高层次的动物学，还不同于研究生命机能衰竭的病理学甚至医学，而是专门研究以人为唯一物种的极度机能正常状态下的生命运动规律。在整个生命科学的结构中，体育科学依其复杂度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见坐标二）。



（坐标二）

正因为如此，体育科学便比大多数生命科学要晚成熟得多。晚成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其运动形式的过度复杂和前此所有学科的积累不够。

五、体育科学发展刍议

体育科学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发轫很迟，至今仍不属成熟的科学，即便如此，它的指导作用和某种“生产能力”现象却早已显露出来，要想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使之转化成积极的物化力量并推动实践，则必须考虑体育科学本身的发展。

我认为，目前体育科学研究中有三个不足：一是未能真正认识研究对象运动员（人体与人两个方面）的极度复杂性；二是对体育科学中各个分支学科未做“运动形式”的分层；三是未把各个体育项目依运动特征和竞赛特点与各相关学科进行“运动形式”的对应比较。如果能在这三个方面着力研究，并取得某些认识论上的成果，体育科学的发展就会进入更加理性的阶段。

虽然这种研究仍属于科学学范畴，但它极有助于促进科研与实践的进一步结合。运动项目的分类不仅可分为体能类和技能类，而且可根据研究需要分为简单运动和复杂运动，亦可分为“单纯位移类”（如田径、体操等）和“社会运动类”（如集体球类项目），还可对几种类别依学科演进关系分成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和社会等。

一切分类都是为了便于对事物的认识和操作。体育科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科学而有效的项目分类和机能分类基础上。只有这样，体育科学才能获得发展的逻辑依据，即使是

一时难以成熟的一些学科，也会找出何以滞后的原因。

体育科学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是“科技兴体”的必要条件，是运动实践获取动力的根源。不重视体育科学的建设和发展，运动实践永远也告别不了“经验操作”的水平，不会由必然王国跃入自由王国。

（原载《中国体育报》1992年4月29日）

附录2：

如何看待足球在整个运动项目中的位置

忽略各运动项目的特殊性及项目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笼统地讲“科技兴体”或“科研与训练相结合”，都很难有的放矢。本文试图对目前的运动项目进行重新分类，并联系项目的“运动形式”及学科的演化，就有关科研与训练结合的问题谈点意见。

一、项目类型及其特点

以往的项目分类多以竞技能力的主导因素或数学上的聚类分析进行。特别是前者，将奥运会或亚运会中较为稳定的二十多个项目大致分成了“体能类”和“技能类”项目，又划分出速度力量性、耐力性、表现性和对抗性等四个亚类。[①] 这种分类法对认识不同项目运动员竞技能力的形成确有积极意义。

但是这样的分类也有不足之处，即不能总体把握所有项

① 见田麦久主编《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第38页，人民体育出版社，1988年，北京。

目在类型上的逻辑关系，也不便找出各个项目与科研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为解决这个问题，我试以项目中包含的不同“运动形式”及其产生背景重做分类。

用恩格斯关于事物运动形式的思想进行分类，可将目前盛行的几十个项目分成“简单运动”、“复杂运动”和介于中间的“过渡性运动”(见表1)。

类　型	简单运动	过渡性运动	复杂运动
具　体 内　容	田径、游泳、 举重、等	体操、摔跤、 个人性球类等	集体性 球类等

这种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就是一个由较低运动层次向较高层次发展演变的过程。按这种不同运动层次逐级发展的方式进行分类，就给各运动项目如何与体育科研相结合指出了方向；越是简单的运动项目越易于与科研结合，且所需学科的知识和技术力量较高级运动项目就少和小。

这种分类法揭示出运动项目如下一些特征（见表2）。

类型 特点	简单运动	过渡性运动	复杂运动
1. 物理学特点	比赛以位移的速度远度及克服地心引力的大小为标准	比赛以位移的复杂度和个人技能状况为标准	比赛中位移是手段命中才是目标
2. 技战术特点	有技术而少战术	技战术兼而有之	既强调技术更突出战术
3. 历史学特点	产生于公元前远古时期	产生于中世纪末期	产生于近代工业革命
4. 人文特点	典型的个人运动	既是个人运动又兼有集体意识	典型的集体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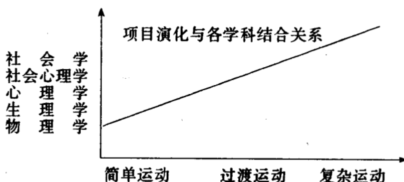
上述特征概括了人类体育运动的发展。这种演化与恩格斯的由“机械的”“运动形式”到“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运动形式”的演化理论高度吻合。而这种吻合恰能提醒我们注意项目演化与学科演化的逻辑关系，为我们真正找到了训练实践与体育科研相结合的最佳途径。

二、不同项目与不同学科

分类的意义在于找出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加分类便

不可能认识事物，更谈不上改造事物。不研究运动项目的类型逻辑，不找出项目之间的递进关系，便不可能了解不同项目所对应的不同学科，也不好谈如何实现“科技兴体”。我们以往的一个不足就是不确定项目类型，没有针对性地施用各学科知识，结果是费力不少效果未彰。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球类研究常常使用低于球类项目运动形式的各学科(如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知识，以致操作性极差。

使用新的分类法便能看出由简到繁的项目演化，也能表明相应学科的逐级递进。这样便有了训练实践中的项目特点和体育科研之间典型的对应关系（见坐标)。



可见，越是高级复杂的项目需要的学科知识越多，越是简单的项目需要的学科知识相应越少。以集体性球类项目为例，如果不采用与之对应的各种学科知识（尤其是社会知识)，那么不管你动用多少其他学科的知识也难见效果。

既然不同项目由于运动形式不同所涉及的学科层次不尽相等，那么不同学科相对于运动实践来说又有着什么样的功能？

从体育科研中几种典型学科的解释功能和实践功能看，随着运动层次的递增，学科功能也在不断加强，涵盖的运动项目也就越复杂（见表3）。

与各类项目对应的典型学科	解释功能	实践功能
物理学	动作是否合理	动作如何合理
生理学	运动员的机体变化和能量关系	如何保持最佳机能状态如何供能
心理学	技能的形成原理	如何动力定型稳定发挥
社会心理学	集体技能形成的原理	如何建立最佳集体技能状态
社会学	多元角色的配合原理与关系	如何促进多员角色之间的相互配合与稳定关系

三、运动训练与体育科研相结合

训练与科研相结合是个十分庞大、非常复杂的问题。它的实现取决于许多条件，如科研人员良好的素质，运动训练

的紧迫需求，以及良好的管理环境等等。但更直接更重要的则是两事物相结合的内部条件，即训练与科研之间能否结合和如何结合的环节。而两者的真正结合又必须建立在逻辑基础之上，即项目的逻辑演化和学科的逻辑发展之间的高度吻合。

训练与科研的结合有这样一种基本逻辑法则：

简单运动项目，主要依靠物理学和生理学即可。物理学（尤其是生物力学）主要解决运动员动作是否合理的问题，生理学主要解决运动员如何最大限度获取能量的问题（选材等环节也由这一问题派生）

过渡性运动项目，在物理学和生理学的基础上，必须依靠心理学，甚至某些社会心理学，以解释或解决运动员高度复杂的技能的形成和长期保持问题。

复杂运动项目，在物理学、生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上，还必须增加社会学军事学组织学等学科内容，以全面揭示和干预集体性运动中的复杂"社会斗争现象"。

总之，训练与科研相结合必须首先从项目分类开始，并找到适当的学科依据。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有效地实现两者之间的真正结合。

上面所说的分类只是从运动训练与体育科研相结合这个意义上进行的，实际上无论运动项目还是体育科学研究都不是这样简单。我只是依典型逻辑关系来揭示它们的演化线索，以供运动训练和科学研究参考，其中省略了一些不算典型的环节。

（原载《中国体育报》1992年5月27日）

后　记

我的足球文论，竟然也能集为一体，出一本书。这对我来说，并不能引起太大的兴奋，因为成书的“壮举”稍嫌早些。从字数到整体完善程度，都离我的想象还有一些距离。

然而，好好想一想，我写足球，已经五个多年头过去。虽然总体字数不多，但那个圆圆的足球，也让我耗费了不少的心血。我的这些篇什，不像好些足球大作，属一时半会儿写就的几十万字的“流水作品”，还算是认真一类的东西。正因为属于马虎时代的认真玩艺，我也就同意将之编为一体，成书出版。

我写足球，纯属添乱。因为我的本行并非足球。我干的是抽象的体育理论，是尽可能脱离实际的概念研究。我之所以会去讨论足球，大概是某种东西深深将我刺激，非使我下笔不可。于是，我就乱七八糟地写了这么一大堆足球玩艺儿。

我得承认，在我的视角下，我不是技术论者，甚至不是战术论者，我是典型的文化与思想的主张者。技术的问题，应该由教练和运动员来解决，非我能很好解决。我倒因此而大大怀疑，那些平时并不踢球，而且至今不会踢球的“足球文人”，所写的各种“足球技术”文章。我不信一个不懂足球技术，一个没有足球本体感觉的人，竟然也能知道技术的好坏。我对这样的文章和文人，一直持以怀疑和低调态度。技术如此，战术也是如此。这两类问题，绝不是任何外行可以轻易

发表意见的。

因为技战术问题完全是个“内行”发言的问题。中国人曾经在一个年代里，搞过“外行领导内行”的怪事，足足让中国的社会历史倒退了10年甚至更长时间。如此这般，就好比一个根本不懂数学的人，看着孩子的数学功课没有考好，或听说中国的数学不如德国甚至不如印度时，却硬要冒充大头，品头论足，发表自己的数学“高见”。这当然是自欺欺人，自然是害人非浅。

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只要写足球文章，大家总要在那里大谈一番足球的技战术理论和观点。而且据说，好些人因此而写得有了汽车，有了别墅，成了“大腕”，成了专业足球“写家”。问题是，如此“高妙”之理论和文章，为什么不能将中国足球好好武装一回，将之彻底翻身一把！难道真是中国足球到了不可救药之地步？

事实可能还不是这样。这其中，一方面可能是中国足球的“干家”们，“文章”嗅觉有些迟钝，从“写家”那里未能闻到什么宝贵气味；但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文章“写家”们的说法，基本上不着边际。

除了“写家”之外，球迷们也有这个特点。中国的足球小伙儿只要踢不好球，就要发表“技术意见”，说得是有鼻子有眼，甚至说得几点几分，前锋后卫的位置如何失误不确，某时某刻主教练遗误了下达作战指示的机会，从而酿下了祸害，云云。

“看客”，真比“局内人”清？我同样怀疑。

话虽说“当局者混，旁观者清”。但我就不信，一拨观战的局外普通棋迷，能比胡荣华这个当局者的水平更高，更大

脑清楚，更充满“妙道”。

所以，面对喋喋不休的球迷议论和发疯式的“抗议”，我一直不以为然。

我面对球迷，除了承认其激情外，基本上不承认其判断。球迷是以“迷”而著称的，他拥有着太多的“感性”，而缺乏更多的“理性”。他们的说法（比如指责十强赛上中国队与卡塔尔关键一役之失败，是因为“戚务生不能乘胜追击，胜利时刻不该将范志毅撤回防守”等等），我觉得这种说法与复杂的足球变化来比，尚有天大的差别。就好比某些“业余天文爱好者”总爱说，某某小行星（含太空垃圾等）将要冲撞地球一般，说得很玄，计算得有板有眼，就像真要发生一样。但在真正的天文学家看来，不仅差之“千里”（其实何止是“千里”？），而且显得滑稽。足球的任何言论，相对于足球场上的复杂情景，都是“非因果联系”的，都是“盲人摸象”的，都是“片言只语”的。至今，尚无一种“理论”和“说法”真正是足球的“因果判断”（其实永远没有这种可能，因为足球的“数学矩阵”过于复杂，绝不可能用文章这种语言形式进行描述）。否则，足球问题解决起来那也太简单了一些。我的问题就是，如果戚务生将范志毅撤回后，果真赢了（完全有可能），大家又该说什么？大概除了由衷地唱唱赞歌外，别无其他。

于是，我总觉得：“胜者王侯，败者贼”，可能才更是战争和体育评判的标准。

赢了，一切文章，都会唱起赞歌；输了，一切笔墨，都会把你的脸涂抹得漆黑。

正是有这样的疑问，正是我不相信多数人的“文章”，我

才决定写下我的各种“非技术”的言论。心想，在大家大谈特谈各种技战术变化而又未能解决具体问题之际，我何不谈一点与实际“毫无联系”的东西?!“文化”与“思想”的东西，不同样是中国足球同仁们所大大缺乏的内容，不恰恰是孩子们早早需要启蒙的东西?

有趣的是，我的奇谈怪论，真还引起了朋友的注意。最起码《足球世界》的编辑同仁们，没有将我的“空头理论”弃之一旁，而是给我开了许多回“剑走偏锋”专栏。

文章一发，一看这专栏名称，就知道咱这文章属于奇谈怪论。倒也热闹。骂我的有人，喜我的也有人。

文章能有人骂和爱，总比什么动静也没有要好一些。

江苏一个金融系统的“超级球迷”，看了我的文章，就给我拨通了电话，交谈了半天，之后又给我寄来了一个厚厚的牛皮纸包，里面是他花费多年心血而写成的足球文论。该文论像是诗人的话句，像是尼采的冲动，还像是一种特别的电视剧本，文稿的一开始，就是一段“敬告读者”，即如果本文对中国足球改革有用，一经采纳其中意见，或将之改编成电视剧，谁就得先支付他不得低于100万元的稿酬。球迷就是球迷，说出的话，颇有分量，惊天动地。

北京一位超级女球迷，看了我的《谤“球迷”》（发表时改为“球迷爷爷，得罪您了”）之后，咬牙切齿，不以为然，欲对我进行一番“理论讨伐”。

“沉重的游戏”一文，发表之后，同样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一位安徽的中学生，在写给编辑部的半信半文中，既说“李先生”的文章，充满了理性，又同时说文章有些“颓废”，看不出中国人的希望，所以不能让人“振奋”。

而某些讥讽足球“文化大腕”的文章，据说竟也惹得“家”们，愤愤然对我咬牙切齿。

我的足球文章，就是这么一堆东西。有人恨，也有人爱。

在去年结束的“十强赛”期间，我则“虽千万人逆之，吾往矣”，没有跟着舆论去批评戚务生，而是尽可能地同情了他和可爱又可恨的足球小伙儿们。如此这般，完全与新潮作家特别是某几个在戚务生身上嗅不出男人性感而大为不乐的女作家的说法完全相反。据说这也大大得罪了“人家”。

我之所以同情了戚务生，是因为我听了好些“家”们的意见（如戚本人脸色难看没神，发傻，满脸憔悴，关键时刻没有主见，不会换人，中国足协没有撤换主教练等等），觉得于理不通。我的相反意见则是，如果将这些会写文章的“写家”换上场，去充当戚务生的角色，并以他们文章中的意见指挥场上的队员，情况只能更糟而不会更好。

说来也怪，就在本书快要付梓时，中国来了个霍顿。

霍顿本人的感觉甚好。记者们又来了心血，“远东四强赛”上，大家猛吹这位洋人，洋人也吹捧着自己（他在接受《新体育》记者采访时曾说，中国足球运动员的技术尚可，只是太缺乏战术素质，他的使命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需要一定的时间云云，可察看98年第4期《新体育》内的有关文章）。我总觉得这其中有些不祥的味道，于是就写了“危险的信号”一文。

大概这样的文章，又会让某些人不甚高兴。

本来还想结合日本人向西方学习“现代化”时的“彻底态度”写一点有关中国足球的东西，本来也想结合中国历史上的“汉唐兵制”写一点民族心理的东西，本来还想接着赵

瑜《兵败汉城》中涉及到的“小心眼”问题，再谈点“舆论心理”的东西，可惜又可惜，我没有充裕的时间（我干了另外一些笔墨官司），书交给了出版社，我也没能将这些东西写出。

这些有趣的话题，只能以后慢慢来写了。

……

足球，虽非我之本行，但我喜之久矣。

记得文革间，10来岁当体校运动员时，从乒乓球房出来，若干人马就要在操场上踢来踢去。后来上了大学，更是起早贪黑，跟同宿舍的一个“足球家”天天锻炼脚法，正是这样，最后一年的专选，我则舍弃了本行乒乓球，干上了足球。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竟是有关足球运动员身高、体重及体能等方面的遗传学问题讨论。

后来上了研究生，更是天天跟弟兄们到北京体院（现叫体育大学）的后操场上“寻欢作乐”。蓝色的天，白色的云，绿色的草，十来个后生，每天下午，光着膀子，流着大汗，满身泥土，满屁股草渍，连人带球踢得是“天昏地暗”。我常常将那些老爱射门但又射不进门的家伙称之为“脚上戴着避孕套”，而将那些凌门一脚将门踹开的伙计称之为“有喜了”。

踢球的队伍中，我的技术并不算好，但缺了我，则会减少若干喜性和活跃。这是事实。把那些流窜在美国或读书或工作的家伙们叫来，他们一定会为我作证。

现在回想起来，都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兴奋。

那是一个足球与青春相伴的岁月。

那是一个让肌肉得以饱涨的年代。

而今，我虽不能踢球，那腿上的那点感觉还算有过。为

此，我认为我有本钱来写足球文章。尽管我的文章，有意回避了有关技战术的各种问题，但比那些根本就没有神经与肌肉体会的“文章家”们的足球“说法”，应该说更有点足球味道。

我通过“研究”成语“初生牛犊不怕死”若干年后，终于发现：天底下，只有傻子最勇敢。因为他无知，所以他什么都敢做都敢说。就像目前特别时髦而吃香的各种气功大师们，现代科学知识几乎是零，但却敢睁眼说瞎话，说人类定会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毁灭完蛋。

在这个智力与胆量问题上，我可能属于“半傻”，每每要说“疯话”的时刻，半个脑子总还能想到害怕，并恐惧说得离谱。

为怕“妖言祸众”，我这里有意做自我解剖，供出自己的“半傻嘴脸”，让大家批判和嘲讽。

虽然如此，我这“半傻”之人，还是想向那些关心我之足球文章的编辑和读者致以衷心的谢意。其中，《足球世界》编辑部的所有朋友，特别是董华君曾为我的文章花费了不少心血，这次出书，编辑部又为我提供了珍贵的足球照片；《中国体育科技》的老编辑魏协森，是我多年来足球意见的支持者；还有我那不足十岁的女儿，她更是第一读者和听众，每每我将文章写成，总要先给她念，念得她哈哈大笑，我则以为文章写得通畅，便可以决定将稿子拿出交给董华兄去发表。

为使本书拥有基本的厚度，我在书末选了两个附录，这是我在六七年前发表在报纸上的两篇旧文，里面虽然几乎没有提到足球二字，但我根据孔德、恩格斯和怀特等世界级哲学家所编织的那个“世界的”和“认识的”逻辑网络，足可

帮助大家知道体育现象怎样研究，了解足球在整个体育项目中应该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球迷们如果能咬着牙读一读这两篇纯粹的“研究文章”，兴许会觉得有些意思。

法国世界杯开赛之际，我以此书作为礼物，献给所有朋友，包括爱听我神侃足球而哈哈大笑不止且将要过十岁生日的女儿豆豆。

愿大家看球看得痛快，也愿大家看球时多思考些相关或无关的问题。

1998 年 4 月 19 日

从沈阳归来次日

再　记

就在本书开机印刷之前一天，《深圳特区报》记者韩虹打来长途，约我把京城名人抓住，让他们各侃法兰西世界杯一段，以飨读者。赵瑜与我在电话里聊球，本想小聊即完，想不到一聊竟然长达半盘录音带。除应付特区报之需要外，我觉得聊天内容聊到了中国足球的节骨眼。于是我将录音稍做整理，将近一万字的长文正好可以收进本书。

赵瑜兄是吾之乡党，老体育干家，谈起足球，入木三分，直指要害。应该说这篇对话，是近年来最具特色的一篇，于是，我将之放在书前，以免老眼昏花者遗漏不看或看时已身心疲惫，读不出味道。

98法国世界杯结束之际，《足球俱乐部》又打来电话，邀我写一篇观球之后的“理性文章”，于是我用半个小时在电脑上完成了一篇“解读足球”。这里也一并收入此书，此文虽短，但属“文化解密”。专家喜之怒之，那我就再也管不着了。

李力研　1998年6月17日

再　记